

洞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 思想判断

文汇学人——编

INSIGHT
THE IDEAS ABOUT OUR TIMES

世界
·
中国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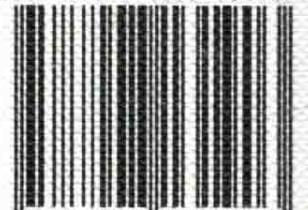
Horizon



INSIGHTS THE IDEAS ABOUT OUR TIMES

上架建议：思想

ISBN 978-7-208-13190-3



9 787208 131903 >

定价：65.00元(全两册)

洞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 思想判断

文汇学人——编

INSIGHTS
THE IDEAS ABOUT OUR TIMES



编者前言

他们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 是我们时代思想判断的一部分

2010年12月19日，微寒。上午，弗朗西斯·福山在复旦大学做完“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前景”的主题报告之后，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林曦博士陪同，准备驱车前往上海市区参观。当时的《文汇报》理论部记者田晓玲第一时间等候在那里。作为上海人，她主动承担了陪同福山游览上海的工作。游览豫园、逛新天地、观黄浦江……大半天下来，故意不涉学术话题，只想为福山的下一次到来和可能的独家专访“暖场”。在外滩与福山告别时，《文汇报》记者指着远处的文新大厦对他说：“希望您下次来到上海，到《文汇报》坐坐……”

“到《文汇报》坐坐”，没想到来得那么快。差不多半年后的2011年6月17日下午，福山坐在了文新大厦二楼的报告厅“文汇讲堂”的嘉宾席上，与上海学者张维为做了一次有关“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并且在次日即将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前，在外滩的华尔道夫酒店接受了《文汇报》记者一个多小时的独家专

访。这篇题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的长篇专访，于“9·11”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9月5日，整版刊发在“文汇学人”版面上——它也差不多是这位眼光敏锐的国际政治学者就“9·11”十周年的话题所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

约定并独家访谈成功福山，只是长时段的“文汇学人访谈录”中的一个工作片段。创办100多期以来，“文汇学人”筚路蓝缕，瞄准国内外顶尖学者展开学术访谈，内容涉及“文汇学人”认为应当有所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其中包括：金冲及、杨天石谈辛亥革命100年，乌尔里希·贝克谈“风险社会”，巴尔舍夫斯基谈中国人世10周年，戴维·梅森谈“占领华尔街”，吉迪恩·拉赫曼谈“愤怒之年”，大卫·哈维谈欧洲危机，迈克尔·桑德尔谈“市场与社会”，皮萨里德斯谈全球劳动力市场，达龙·阿西莫格鲁谈包容性创新，林毅夫谈“新结构经济学”，傅高义谈“邓小平时代”，杰里米·里夫金谈“第三次工业革命”，舍恩伯格谈“大数据时代”……100多期，七八十万字的访谈，“文汇学人”无非想表达这样一种素朴的愿望：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总有其超过常人之处，很多时候，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总是有所助益的。“文汇学人”记录下他们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也许能够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一些派得上用场的资料。结集在这里的文字，就是从“文汇学人”这100多期的访谈录中精选而成，庶几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之一部分。

当年为这份访谈录作出贡献的团队成员包括：田晓玲、李纯一、任思蕴、祁涛、杨逸淇、季桂保。结集成书，也是为他们的工工作留下一份印记。

目 录

不患贫而患不安

伊安·约翰松	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3
涛慕思·博格	全球规则制定应当倾听穷人的声音	14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25
威廉·恩道尔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资源分配不均	35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经济发展不能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	46
青木昌彦	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	57
钱永祥	社会急速变动使价值和规范无法成型	67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77
吉迪恩·拉赫曼	有一种全球情绪叫“愤怒”?	87
戴维·梅森	“占领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的神经	97
雅克·阿塔利	欧盟未来取决于利益攸关方有否共识	108

站在世界再造的起点

乌尔里希·贝克	“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	121
凯文·凯利	面对技术的包围,人类应当有所选择	130
戴维·罗森布鲁姆	公共部门需要更高的道德伦理素养	140
达龙·阿西莫格鲁	“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150

杰里米·里夫金	通讯和能源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	160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大数据时代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	171
沃尔特·米德	美国正在社会再造的起点上	182
小约翰·柯布	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191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201
莎朗·佐京	小型集市、传统街市更有人情味	212

无极化世界里的中国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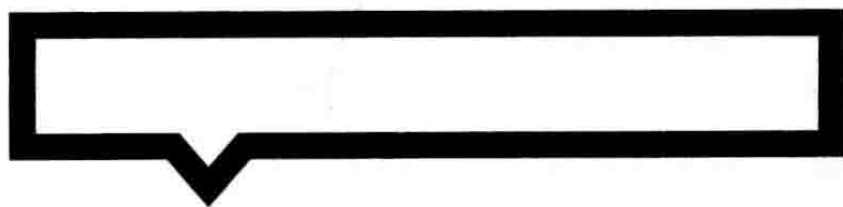
俞可平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225
乔舒亚·库珀·雷默	国家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234
杜赞奇	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	243
黄仁伟	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无极化”	253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	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264
傅高义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274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中国,“早熟的超级力量”及其国际角色	284
林毅夫	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295
胡永泰	追赶之后才可能有制度创新	307
张军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动车组”时代	317
蔡昉	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327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

世界·中国

不 患 贫 而 患 不 安



伊安·约翰松

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采访 | 季桂保



伊安·约翰松

Ian Johnson

罗马俱乐部秘书长。先后在威尔士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并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6年，担任过世行能源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家，1998年起担任世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2000年起担任国际农业研究(CGIAR)咨询部主席。在加入世行之前，约翰松是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并有5年时间在孟加拉国为联合国和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2010年，他开始出任罗马俱乐部的秘书长。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学度过的人，一般不大会错过《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本书。声誉卓著的“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出版它的第一辑时，《增长的极限》中译本就是其中最早出版的两本图书之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在中国刚刚起步；《增长的极限》一书对人类增长方式提出的反思、对人类无节制消耗自然资源发出的警醒，在“发展”逐渐开始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如同方枘圆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从全球范围看，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已经使得当今的人们对可持续与全球均衡发展有了足够的共识，但是，在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时，人类尤其是西方社会还沉浸在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之中。

有人说,《增长的极限》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书。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难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前好几年,就已经有了《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之类的图书提出了类似的警醒。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增长的极限》一书与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共同拉开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于是,才有了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也才有了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

作为全球著名的智库之一,罗马俱乐部在2012年《增长的极限》迎来40周年之际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尽管穿梭于全球各地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罗马俱乐部的现任秘书长伊安·约翰松还是认真阅读了记者提出的各个问题,并且通过书面方式一一予以详尽的回答。

认为增长本身存在问题,是《增长的极限》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推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是它成立4年后推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当年成立这一学术团体以及推出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1968年4月,来自全球外交、工业、学术界和市民社会的专业人士组建了罗马俱乐部,旨在探讨当时国际事务中盛行的短视思维所导致的困境,尤其关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出现的对资源的无节制消费行为。

1970年,罗马俱乐部借助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着手分析研究全球经济的总体演进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更早的时候是由杰伊·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创立的。

发表于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团队做出,其成员包括丹尼斯·米都斯、唐纳拉·米都斯、于尔根·兰德斯和威廉·伯恩斯三世。这项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它借助计算机设计了一个LTG(增长的极限)模型,当整个系统随时间变化时,它能跟踪各项变量及其相互作用。

这些研究者对未来世界设定了各种不同方案。该报告提出警告说:人类面临太多的问题,必须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以维持自身的生活质量。报告特别指出:如果1900年到1972年间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下去,人类将在2000年到2100年间的某个时刻突破地球可以承受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提出了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重大危机,并因此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当时全球尤其是西方经济正处在“二战”后黄金增长周期的顶峰。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是否同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实际弥漫着的浓厚乐观情绪极不协调?

以为《增长的极限》是要倡导“零增长”,往往是一种误解。使用“预言”一词则是另一种误解。《增长的极限》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预言”,而只是描述了照原有趋势走下去可能会出现何种局面,并且为人类利用资源提供了“可调适的设想”。它为人类未来探寻出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但从来没有做出预言说未来会怎样。

诚然,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布之际,世界正处在“二战”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期,当时,乐观主义以及技术进步的信念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核能正热、汽车满地,1968年人类还征服了月球,世界的未来一片光明。《增长的极限》提出的观点则与这种总体的情绪相悖,自然使人们感到吃惊了。

同其他所有新理论、新观点一样,这项研究引发了争议和批评,但也受到广泛关注,发行了几百万册。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当时乐观情绪盛行,这项研究还是使人们意识到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疑虑:我们能否永无止境地增长?在有限的星球上能否无限制地消耗资源?类似问题在40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重要。眼下的世界面临着系统性危机。人类正在同严重的贫困、失业、环境压力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做斗争。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原有的增长范式并没有为人类应对这些挑战寻找到正确答案。

我们知道,《增长的极限》发表次年,就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全球自然灾害也频繁出现。如果没有这些事件,《增长的极限》是否不至于像它现在那样畅销全球呢?

毋庸置疑,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类似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农药工厂爆炸之类的环境灾害,推动了《增长的极限》的传播。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是在目睹了媒体上的灾难画面,或者是在个人的经历中付出某种巨大代价之后,才会去关注《增长的极限》所传播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还不是促成《增长的极限》在1970年代畅销的主要原因。其他著作,包括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已经提醒人们关注资源消耗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这些著作已经涉及这样的看法：消费主义与无节制增长亦步亦趋，会给人类未来带来问题。此外，1968年的社会运动也促成整个社会质疑当时的社会结构，并对之前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加以更细致地重估。

《增长的极限》在当时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敢于打破现代的一大禁忌，认为增长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罗马俱乐部勇于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体系之可行性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讨论，由此也招致了很多批评。

《增长的极限》发表之后，受到的批评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朱利安·西蒙撰写《没有极限的增长》，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认为：“如果他们在计算时考虑了技术发展的因素，那么就根本不会得出地球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的言论”；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更是宣称：“当人类自由地追寻梦想时，根本没有增长的极限，因为人的智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

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地以为技术创新最终必然能解决人类现实和未来的一切问题。认为科学技术将会以几何级的速度无止境发展，这样的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技术创新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观点既不靠谱也很危险，因为未来的发展进程很可能出现技术创新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要想以今人难以想像的方式改进当下和未来的问题，就必须有前瞻性的思维和研发投入。这也要求不再沿袭常规的商业路径，停止对后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

负责任地加以破坏。

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体现增长质量

众所周知，《增长的极限》报告是由MIT的4位年轻科学家撰写的。他们专业的科学背景使他们提出了非常具有预测力的分析模型。但是也有批评者指出，正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专业背景所限，因此，这份报告无法真正揭示出造成危机后果的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这样的批评是否有道理？

我们并不把这看做是一种批评，因为那份报告只是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来设计方案的，其尽可能地追求客观中立，与任何政治的、宗教的或经济的意识形态没有关涉。

《增长的极限》提出：“现今对于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占用早已超出了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与北美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么在目前技术水平下我们就需要3个地球来满足总的物质需求……为了可持续地适应未来40年人口和经济产出的预期增长，我们就需要另外6到12个星球。”问题在于，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零增长理论”是否有悖于发展的公平正义呢？

我们并没有倡导“零增长”。我们认为，增长的质量更为重要，要避免无节制的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人人都有获得理想生活标准的权利，人人都可以追求幸福。不过，无节制的增长不会给人类的愿景带来答案。增长和发展纠缠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自身的发展机会，但它们必须意识到，增长的质量对它们而言同样重要。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能

同时体现增长的质量。依据当下的发展模式的话,发生车祸有人受伤,也同样能提高GDP,伤员住院、汽车修理、修复路面受损,所有这些都能够促进GDP增长。但是,社会因此而变得更富裕了吗?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吗?

在《增长的极限》发表两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于1974年推出了《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指出人类面临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危机等是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这些危机都是人为的。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依然没有减轻,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11年的日本地震和海啸。人类真的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应对自然灾害了么?

气候变化扩大了这些事件的范围,强化了它们的影响力。自然灾害的发生表明,人类自以为在技术进步的社会可以阻挡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样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大自然要远比人们想像的强大。因此,我们应当在减少碳排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尽可能地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这些事件表明,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排方面达成共识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小国和经济体量不大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1972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和全球粮食产量的真实数据,与罗马俱乐部1972年依据WORLD3模型标准运行预测到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即全球人口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全球谷物从1972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我们想知道的是,当年的这份报告是否也有一些看走眼的预测呢?

如上所述,《增长的极限》并不是要做出预测,而是要针对未来提出多种可能性的方案。我们的分析模型在1992年做过更新,该书出版30年后又做了一次更新,并于2004年再版。由于能不断更新,我们的分析模型就没有必要大修大补了。从1972年的研究水准来看,MIT研究团队的这份报告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全人类可以从东方传统思维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增长的极限》发表30年后,《增长的极限》出版了它的第三版《增长的极限:30年全球经典》,认为地球的生态状况更加恶化了,生态系统给人类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再不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上的革命,21世纪就注定要成为灾难甚至灭绝的世纪。技术和市场能否为人类带来扭转这一趋势的新希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是预言,而是使人更为悲观的可能情形。

诚然,技术进步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资源、减缓对自然资本的掠夺带来了新的希望。罗马俱乐部成员之一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撰写的报告《五倍级》(*Factor Five*)揭示了业已存在的具体解决方案,认为技术创新和政策改进有可能使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五倍。

“稳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可以有效替代当下的经济模式,同时也会带来就业新机会。但是很不幸,绝大多数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还没有为变革做好准备,它们阻碍了推广上述新经济理念的新政策的实施。绝大多数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依然舒舒服服地因循守旧,从而为未来埋下了隐患。我们最终必须承认,变革才是当务之急,尤其当变革的因素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当机立断进

行变革。否则，我们如果再等上又一个40年，一切都晚矣，到那时，人类将面临难以逾越的挑战。

2012年是《增长的极限》第一版出版40周年，该份报告是否会再次更新，也许会提出更充足的数据来验证“过冲”的现实？

1972年，《增长的极限》就已经指出，要创造条件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理想的世界，为人类带来稳定、可持续和全球均衡的发展。在2012年的纪念过程中，罗马俱乐部有机会回顾过去40年所做的分析、新的进展与现实，从而为未来的40年提供全新的视野。

当下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人类能否在地球的限度内维持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于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罗马俱乐部的“2052年框架”旨在以过去40年的探索性工作为基础，解答“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人类究竟应当如何作为，才能使我们的星球在特定的限度内走上新的稳定发展道路”。

此外，《增长的极限》合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2012年出版了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新报告，题为《2052》。该书结合全球范围内的预测手段、兰德斯本人在可持续性研究领域的经验，以及30多位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预见，为我们展示最有可能呈现的未来图景。该书并不是要引发人们的恐慌，而是要使我们为变革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进入新千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警告：科技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你们还会就此推出类似《增长的极限》那样为全球关注的报告么？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它并非一切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坚信，人类当下面临的问题全都纠缠在一起，有待系统地加以解决。唯有系统考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因此，我们眼下做的研究，就是要分析关键问题、确定疑难、采取行动并构建体制，以使我们在未来40年能够沿着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轨迹前行。

与此同时，要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关心绝对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并且在重建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当下，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循环经济则是其中的一个醒目纲领。根据您的理解，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是否可以从东方传统思维中获取一些思想源泉？

我们认为，东方传统价值观尤其是道家的观点对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甚至能拓展有关增长的讨论。道家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不应把大自然当做物来加以把握，而应当把自然看做是合作的伙伴。这为我们的全新经济思维提供了基础，并且成为我们实际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早期道家观点，人性顺应自然，就会产生秩序与和谐。可以相信，类似观点能够为改善人类生活的一整套政策提供坚实基础。因此，我们深信，全人类可以从东方传统思维中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近些年的学术活动似乎不像当年那么受人关注了。如果让你们来中国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你们会怎么做？

毋庸置疑，中国将在2052年的世界扮演主导角色，因此也会碰到世界其他地方所曾碰到过的相同挑战。由于中国变得日益重要，其未来、愿景和思维对理解全球未来而言就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非常乐意与中国的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直接打交道，以便把他们的关切与价值观纳入我们的研究之中。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所勾勒出的更美好世界适宜于地球上的每个人，无论他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涛慕思·博格

全球规则制定应当倾听穷人的声音

采访 | 李纯一



涛慕思·博格

Thomas Pogge

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1953年生于德国汉堡，198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3—2008年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2008年起任耶鲁大学哲学和国际事务雷特纳讲座教授。此外，他还担任挪威奥斯陆大学自然心灵研究中心主任，并于1996年当选为挪威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有《实现罗尔斯》《世界贫困与人权》《日常政治：在亲近穷人的言辞背后》等，现已译成中文的有《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和《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

“生活在最富裕国家里的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820年的3 : 1,1870年的7 : 1,1913年的11 : 1,提升到了1960年的30 : 1,1990年的60 : 1和1997年的74 : 1。”

当涛慕思·博格在他的“全球正义的优先性”一文中引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时，他坚信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国的制度和文 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道德义务也并不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更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的错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以强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现行全球秩序，通过认可国际借贷特权和国际资源特权之类的国际惯例、建立各种跨国经济贸易组织，在不公平地惠及强势人群利益的同时，不公平地剥夺了弱势人群本应享有的摆脱贫困和发展的机会。“而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错误

延续”。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说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这句话，深深影响了学生时代的博格。在他看来，康德是最早从世界主义角度理解法律和正义的人之一。

博格的另一个精神导师是约翰·罗尔斯。作为罗尔斯的学生，博格写过两本关于导师的书：《实现罗尔斯》(*Realizing Rawls*)和《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John Rawls: His Life and Theory of Justice*)。在追随罗尔斯15年后，博格最终在理论上与自己的导师分道扬镳。在他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封闭社会”局限于主权国家，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封闭社会”却是全球社会。他要把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关切推及全世界。

认识到全球不平等已经超过性别、种族等既往的任何一种不平等，博格开始将制度性的道德分析运用于国际秩序层面，以期推动全球正义理论的发展。作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博格不希望好的理念仅仅成为哲学博物馆里好看的陈列品，他不遗余力地通过全球层面的实践来努力促成一种全球正义观。他提出对资源消费者进行收费的全球资源红利(*Global Resources Dividend, GRD*)的构想，与同道们成立非政府组织全球健康推进计划(*IGH*)，推动各国政府和基金会参与健康影响力基金(*HIF*)，从制度层面改进不平等的资源与医疗分配体系，减少本可避免的贫困、疾病和死亡。他深信：“全球正义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需要更能被广泛接受的全球共识

我们知道，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以主权国家为模型的封闭社

会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在当下,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具有这种封闭性。所以,您提出要将正义扩展到主权国家之外,发展出一种全球正义。但是,与全球化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倾向,人们甚至在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爱和友谊等基本观念上都发生着冲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有共识可言呢?

确实,地域化和全球化进程融合在一起,并且相互强化。全球化会使民族国家失去部分权力。以欧盟为例,欧盟成员国拥有哪一部分领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比利时也有可能分成两个国家,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碍,它们仍然都是欧盟成员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因此发生显著改变。国家之间也变得更宽容,不再为更多的地方自主权而竞争。

罗尔斯的理论建立在人们广泛信仰的正义的道德机制之上。但这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普适的那种道德机制和信仰,而或多或少是美国人的信仰。如果我们整个世界都按照美国的形象来塑造,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追随罗尔斯而反对罗尔斯,将他对制度的思考运用到超越民族国家、也即整个世界的制度设计层面。

就全球正义以及对全球机制的评估而言,我们需要更狭义、内涵更少、以便能被更广泛接受的共识。这有点像两个圆的重叠部分,全球共识的重叠部分总是要比美国人的重叠共识小得多。因此,可以在全球层面使用的概念,譬如说人权,可以有更为狭小的意义,即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卫生设施,能用上清洁的水,等等。现在人类已足够富有,完全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就此达成共识,认同这些东西最重要、具有优先性。我们必须以此方式来设计全球规则,包括WTO,因为正是这些全球层面的建制最大程度地支持了人类基

本需求的实现。

为什么罗尔斯不愿意将他的理论运用到全球层面？

同许多美国人一样，罗尔斯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信仰自己的国家，认为自己的国家总能改正错误，变得越来越好。他担心其他国家和文化并不像美国那样真正致力于正义。

罗尔斯认为，在一国国内，应当遵循差别原则——即我们应当安排经济机制，让境遇最差的人们尽可能获得好的待遇，力图消除不平等；但就全球层面而言，只需要讨论正义的外交政策、援助穷人、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最低水平以上就可以了。他认为全球机制对世界事务没有什么影响。他是2002年去世的，那时WTO还是新鲜事物。他认为影响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全球层面或超国家的因素，而是一国的国内因素，如一国的文化、一国国民是否勤奋努力、一国的人口和妇女政策，等等。他说只需要克服地域的、国内的障碍，不用关注国际秩序，每个国家都可以富裕起来。

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您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会对世界主义形成挑战吗？

会带来挑战。但两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在设计超国家机制的时候，必须是世界主义者。如果你是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要参与协商世界贸易秩序的设计，那么，政府应该告诉你，你到那里要摘下中国帽子，戴上世界帽子——你是要为世界、为所有人做出最好的设计。这与爱国主义是并行不悖的。你有时候代表你的家庭，有时候代表你的城市、国家，戴上不同的帽子。

但是现在，情形并非如此。任何政府派遣代表去讨论国际金融、

贸易体制的时候，都期望他只代表本国利益。这就是问题所在。穷人没有得力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没有被听到，导致不平等的状况仍然在加剧。

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一种全球机制。现在，已经有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样，思考如何摆脱贫困，就不会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我们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必须忘掉自己是从哪一国来的。

非正义的国际秩序会伤害到国内正义

您也引述过康德的论点：只要全球正义没有实现，任何国家的国内正义都不会稳固。但是，当今国际社会，“强权即真理”的逻辑依然经常起作用。强权者依然凭借其优势地位在制定着有利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的游戏规则。面对现实，我们又如何能发展出有利于促成全球正义的公共理性呢？

康德的论点来自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我想，康德的观察非常准确。全球层面的非正义对国内正义而言是非常大的腐蚀力量，这种腐蚀显然正在发生。

一方面，如果整个国际环境认同“强权即真理”，那么，每个国家都会感到自己必须越强大越好。比方说，我们给穷人钱来消除贫困，但前提却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必须更强大。退休的人辛勤工作多年，现在却所得甚少，我们理应为他们过去的辛勤工作、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给一些钱，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会使国家更强大，因为老人们不能再作出更多贡献了，给他们更多的钱等于是与别国竞争中浪费资源。如此对待老人显然是不正义的，

但是我们就在这样做。这就是“强权即真理”的国际环境可能伤害到国内正义的例子。

另一方面，弱国总是发现本国国内的建制会被外国人破坏。弱国和穷国的政府当然也希望服务于本国人民，但是，国外力量，比如一些大公司，甚至要比本国人民更能左右你。政府因此很容易腐败。这也是非正义的国际秩序导致国内非正义的案例。

那么，如何实现跨越，从“强权即真理”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一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往往会看别国是怎么制订的。所以，当一个国家同追求强权、大量动用军事力量的国家相竞争时，它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自己也必须变得非常强大。现在的氛围就是，许多国家都极大地依赖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妨碍了世界向非军事化方向发展。

从深层来分析，这涉及国际秩序。概而言之，每个国家有三种方式来影响世界，即军事的、经济的以及道义的。挪威有很好的名声，就会有世界影响力，许多人会视他们为同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占据世界的60%，经济力量也很大，但道义力量很小。美国出于自利，在战略上很希望世界陷入危机，这样军队和武器就重要了。我们期盼的转变是军事力量成为历史，让强国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名声也越来越坏。这个转变很难，因为制造危机总比预防容易。

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避免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不平衡。我们希望美国逐步减少军备。很难说服，但可以强制他们这么做。因为经济实力不足是很难支持军备的。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政界和学界都在呼吁改变国际金融秩序。

从纾解贫困的角度看，您对改革全球金融秩序有什么建议？

虽然金融危机和贫困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的路径。这种共同路径就在于，最强的经济体如大银行、大公司，对全球规则的塑造施加了过多影响。全球规则由政府尤其是强国政府制定，在协商国际协定时，都是关着门进行的，没有透明度，也不负责任，大公司、大银行可以为所欲为对政府施加影响。这样，他们就基本上是在为自己制定规则，也就毫无约束可言。而且，大公司的CEO们更倾向于冒险，因为冒险成功能赚大钱，失败了也不过是最差的CEO，但还是CEO。因此，实际上不是大公司、而是大公司的高管在为自己制定规则，影响政客。

这显然不公平。规则由居高位者制定，越富有的人越能获得世界上的公共品，越穷的人所得越少。我们看到，国际规则对知识产权大加保护，但是，国际规则却不关注劳工标准，导致穷国竞相提供受剥削的劳动力。实际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减弱，对劳工标准的保护应该加强，这样，每个工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可支配自由时间与体面的薪水，无过劳工作之忧，有最基本的尊严。我们应该有一个底线。

为此，规则制定的方式有待民主化，穷人的声音应该被倾听，至少，人们应该讨论规则制定的不同方式是怎样影响到穷人命运的。

健康影响力基金是一个对道德加以聪明使用的体制

您近年来构想并大力推行的健康影响力基金(HIF)，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专利申请人提供一种新的收益回报机制。如果政府

采纳HIF的提议,就可省下医疗保障和对外援助的钱,药企也可从中获利。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聪明的体制。

我想,这是一个对道德加以聪明使用的体制。用柔道的原理来解释,就是以弱制强。一个大个子冲过来,你抓住他的手把他推向另一个方向,他倒下了,他是被自身力量打败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道义很重要,但是力量太小,只有吸纳其他强力,才能扭转方向。

HIF不是为了帮助药企,而是为了帮助穷人。我用这一想法吸引药企,告诉他们我有办法让他们更受欢迎,还能赚到更多的钱,并且原有的专利体制不会取消。这很重要,因为理念不仅仅要好,更要可行。

在一些医药体制本身就不完善的国家,会不会因为你们发放的药品价格低、易于获得,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滥用、误用的情况?

不会。目前的医药体制恰恰是药物滥用的体制,药企想尽办法把药卖给每个人。比如利复星这种抗生素,你说要买这种药,没人会问你要它干什么。结果,利复星在东南亚被滥用,东南亚的虫子、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

HIF则是非常不同的系统。药企自愿在HIF体制下注册新药,并以成本价销售,他们得想办法把药品卖给真正能受益的人,具有良好影响力的药品会从基金里获得巨大回报。每种药品的健康影响力将由HIF每年调查评估得出。因此,药企就有强烈的动机去瞄准真正的目标群体,并且要求他们正确服用。

您一直在说服政府及一些机构去这么做,那么,个人在消除贫

困、促进医疗资源平等分配过程中能做些什么？

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去保护穷人。政治机会因人而异，很多人很难做出政治行动。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很多人现在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世界上一个令人惊讶的现实就是，越是穷困的人越愿意帮助其他穷人，他们投入的时间和收入的百分比，要比富人大得多。当然，也有比尔·盖茨这样的例外。在我看来，越富有的人越应该做更多的事，也更应该从政治行动上来改善现状，因为他们往往占据着更有利的政治地位。

正义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石

在讨论了很多理念之后，再来为我们讲讲您的个人经历吧。您是因为什么从德国来到美国的？

我在德国汉堡大学主修社会学，读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理论，也思考正义问题。我也修了相关领域的课程，如经济学、心理学。

为什么会去美国呢？我对哲学很感兴趣，而且那时恰好有一个作一年海外交流学生的机会。1977年我来到哈佛，那时的哈佛哲学系非常好，有尼尔森·古德曼、罗尔斯、普特南、蒯因、诺齐克等名教授。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作哲学系的研究生，我日夜无休地修了6门课。

美国还有一点吸引我。美国在“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后来参与重建德国，使之成为民主体面的国家。但美国对我来说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我是经历过越南战争的一代，越战却是一场非常不正义的战争，美国最后被国际舆论而不是军事打败了。因此我去美

国,还想从内部去理解美国的政策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在做一个局内人,也许有一天可以影响美国人的思考方式,我是指道德方面。我现在确实这么做了。我的书就是特别写给美国人看的。

近日挪威发生了极右翼射杀参加工党青年团夏令营青少年的惨案。挪威工党一直拥护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一般来说,移民和多元文化问题往往会成为经济不佳的出气口,但是,挪威拥有超额财富和完善的社会福利,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引人注目,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冲突?

整个案件是个心智不正常的人干的,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有。这显然不能代表挪威的任何文化和思想。过去20年来,我去过挪威很多次,我在那儿还有经常性的教职和研究工作,指导了十几篇博士论文。相对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挪威社会中的这个少数群体更小,且相比之下他们也更宽容、更平和。

我非常认同文化多元主义,当然,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元。我很乐见一个多元的世界,其中包含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也包含了文化上并不那么多元的社会。当然,我还是希望在文化并不那么多元的社会里,外国人依然受到欢迎,而不是种族主义者大行其道。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有时更能避免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因为他们自远于文化多元主义,或者非常缓慢地拥护文化多元主义,而不是急匆匆地迈向文化多元。确实,有些欧洲国家冲得太快了,有些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国外技术工人。这在德国、丹麦、瑞士、奥地利、荷兰等国引发了右翼运动的一些恶劣反应。但是我没有在挪威看到这个问题。这个杀手确实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排外情绪表示同情,但是他在挪威绝对是个案,是边缘,不会

有任何同情者或支持者。

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格言”，比如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的“自由、公正、团结”，等等，这许多价值让您排序的话，您会把什么排在前面？

我会把正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重要价值，皆导源于正义。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人们有表达观点的自由、选择职业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流动和婚姻的自由，同时能够摆脱暴力、恐惧与贫困。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冲突各方可以平等地表达和论证各自的主张，公正的法律程序可以使纷争得到和平解决。一个公正的社会是法律当道、无所偏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有所保障，经济上的不平等十分微小，权力不会在私人生活领域被滥用；在这样的社会，每个公民都会为法律和治理的正义有所担当，并且会奋起保护弱者。诚然，在正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价值，比如博爱；尽管如此，正义仍然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石。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采访 | 田晓玲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早年求学于塞浦路斯大学和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76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至今。

如果不是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众对于这位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可能还所知不多。严格意义上讲,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埋首于工作岗位与就业者之间相互寻找的经济学研究。他喜欢沉浸在书斋里做研究,用他所喜欢的数学来解释微观的经济学现象。

他最知名的学术成果,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提出的“搜寻—匹配理论”。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该函数用于解释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从失业到就业的流动状况,他是利用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的经济学先行者之一。

获得诺奖经济学奖以后,他才开始走入公众视野。也许是他实在没有什么语出惊人的表现吧,“中国女婿”这样略带八卦意味的新闻反而传播得更广一些。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很多

让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普通劳动者短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的工作、未富先老……似乎哪一样都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福利的欧洲负债累累，美国的失业率又居高不下……

不过，与这种忧心忡忡大为不同的是，皮萨里德斯对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没有太多的焦虑感，他的判断还是来自事实和他的经济学知识；同信奉市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建议人们不要因短期的失业或低报酬感到忧虑，因为好的工作岗位最终会赶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步伐。

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

您是因为“搜寻—匹配理论”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找不到人。您的这一理论是否是以有效市场为前提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有没有对“搜寻—匹配理论”带来一定的挑战？

我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存在市场失灵这一基础之上的。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的竞争市场一样，是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比如对劳动者技能的了解并不充分，不知道谁技能更高，谁工作更努力。我们将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中，以寻求均衡的实现，而均衡是以部分失灵为基础的。

目前的危机中，出现的是金融失灵。我们的研究模型并没有将金融失灵考虑在内，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搜寻—匹配

理论”的研究中把金融失灵的情况考虑进来。

这将是您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吗？按照您的估计，金融失灵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一些学生正在研究，这显然是这一领域将来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估计，全球经济好转后，创造的工作岗位不一定会更多，原因在于企业不能确定自己可以借贷到足够资金来应付未来的开销。金融失灵的存在会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比较缓慢。同时，我估计，当经济遭遇负面冲击时，依然会出现更多的裁员，因为企业比危机前更担忧流动性的问题，它们需要资金，但又不能指望从银行借贷，必然的结果就是更快地裁员。

人们常说，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您怎么看政治等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就业带来的影响？

政治层面的影响更多来自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尤其会影响到雇主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成本，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国家会制定政策来增加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希望给工人以更多的安全感，这样的政策只是让已经受雇的人得益，因为企业因此更不愿意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了。

这也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普遍难题。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各国都在努力扩大生产，而另一方面，设立最低工资线、提高劳动者薪酬，又被普遍看做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内容。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最低工资线必须设定在合适的数目之上。最低工资往往针

对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技能劳动力，通常，他们的雇主都是非常大型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喜欢使用临时工、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的确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就业，因为企业认为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要支付这一工资额度，工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如果最低工资线设定太高，企业会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员工。所以，需要花费精力来寻找到合适的尺度以帮助那些低技能劳动者。最低工资不是越高越好。

高福利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本身并不带来危机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您怎么看失业率或者说劳动参与率这些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的指向意义？

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对政策有指导作用。怎样评价一个政策是否成功呢？是看它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还是看它为人们增加了多少收入？如果不考虑就业，只考虑金融领域的货币政策，就会带来不平等，因为它只顾及高收入金融从业人员的需求，伤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群体。

我的建议是，应当把劳动力市场同其他部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直接，可以让政策更加偏向于就业，同时配套其他政策来减少政策对其他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让房产价格上升，这时就可以采取一些微观政策，比如控制借贷、征税等，以

此来管理房地产市场。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非常引人关注，不少人把它归因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您怎么看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

我认为，真正需要作出根本改变的是欧洲的监管制度。我们知道，欧盟一开始是一个贸易联盟，国家间都实行自由贸易，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统一，但财政政策却各有差异。货币政策的殊异，或者更具体而言，利率的殊异，会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欧盟，几乎各国政府都希望只花钱不征税。但是不征税就无法支撑花费，最后借贷利率就会增高，你会发现借贷不起了，就只能征税或者让货币贬值。

欧洲的问题在于，一些小国面对的所谓统一的欧洲，一般是由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决定其利率水准的，在如此低的利率水准下借贷，又没有任何约束，结果自然就是不停地借贷。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借贷加以管理。但欧盟却从来没有类似的管理框架。这就是欧洲危机的来源。

高福利本身并不带来危机，高福利仅仅带来了更多的花费，只不过你必须通过征税来支撑这样的花费。

有人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益于勤劳肯干的工作伦理，而欧洲福利社会的溃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工作伦理的丧失，人们变得懒惰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欧洲国家已经很富裕了，人们自然需要更多的休闲、更长的假期。我觉得这很好。欧洲人和美国人很不一样，尽管美国也非常发达，但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向

往更多的休闲。

主要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同时债务水平又非常高，还款能力越来越低，这样看来，未来全球前景是否令人比较悲观？

将来还会有问题，尤其是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如果我们继续按现在的情况支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资金和财政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延缓退休年龄，人们现在更健康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退休金从何而来？如果退休金更多地来自税收而不是投资基金，那么年轻人就要付更多的税。同时，100%的医疗保险也是不可持续的，也需要高税收来支撑。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是否处于不利的情况？

我认为这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关。中国现在开始考虑养老金问题了，这一时机同当年的欧洲并不一样，欧洲当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年轻劳动力，整个社会的抚养比例还比较低。

劳动所得占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被拉大。有人甚至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您怎么看全球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

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

比如，中国的工业部门就比封闭经济时代规模更大了；全球化也使纽约和伦敦的金融部门规模更大了，它们成了全球金融中心。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变得全球化了，比如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欧洲借贷去购买美国的房产，或者为欧洲的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业务。

全球化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平等。由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业务量急剧上升，获利颇丰。伦敦金融业员工的收入比制造业高很多，因为制造业市场并不像金融业那样增长很快。这样一来，收入差距扩大了，不平等就自然产生了。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劳动者进入全球市场，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供给。您怎么看这一巨大的变化？

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在中国，全球化提供了非常多的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农村务农人口可以借此进入全球市场。对欧洲来说，的确有很多岗位因此消失了，因为他们不能在制造业领域高效生产了，但是他们可以更好地生产出其他东西。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大家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生产出了更好的东西。英国一开始也生产低成本衬衣，但是后来由于没有中国和印度生产的衬衣那么好，工厂就倒闭了，大家一开始还觉得这毁了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可以生产和设计更好的衬衣并销往中国和印度了。

我们也看到，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比例似乎越来越不相称，这是不是也是全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同最初的农业或者低技能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倚重，

所以，资本所得比劳动所得提高得更快。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发达国家大致是在1980年代开始了资本的快速增长进程，而收入所得的上涨大概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后失业率的上升使资本占比开始上升，劳动所得占比则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从绝对数字看，劳动所得仍旧远远高于资本所得。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大概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是资本产生的利润。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如果劳动所得不是三分之二，那么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劳动力市场向好，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

您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教育投入与薪酬一定成正比么？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不少高学历者难以搜寻到有匹配薪酬的工作岗位呢？

搜寻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好工作，高学历的人收入也自然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立刻就能得到高收入。必须用一段时间来等待合适岗位的出现，也可能先要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然后等待好工作的出现。这就是搜寻的过程。搜寻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高学历、但没有找到高收入工作岗位的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10年以后，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变得更加富裕了。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普通劳动力稀缺，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逐渐趋近，产生了对教育的负激励。您怎么看？

当这个市场没有给高学历的人提供好的工作，那么年轻人就会

质疑,我们是否还要接受那么多教育?但是,一旦市场好转,这些质疑的人就会后悔。长期看,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在整个环境改善以后,你就不可能从中受益。所以,年轻人最好是从长期角度来做规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状况更多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带来的,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和教育的关系。失业率高企时,我们会看到更多人去上学;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则是对教育的一个负面影响。商业周期通常比较短,人们需要做出快速应对和适应。而从更长时段的经济周期来看,经济越是发展,越会提供更多的职位给高学历人才。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高学历人才出现之后,工作岗位最终会追上他们的脚步。

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其实和总体经济结构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

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工作岗位都集中在低技能的制造业,最终,制造业也会创造出高技能的职位,比如研发等。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更多的岗位出现在商业服务发展起来以后,比如金融、房地产、会计等,这些部门会在稍晚的时候出现,欧美大概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超越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迈进。

您提到,中国将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出去,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难以如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否并不容易?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发展高端产业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更多的工业化经验,并且有赖于商业部门更充分地发展。中国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工

业在世界贸易版图中表现很好，这通常是迈向高端产业、走向专业化商业的基础。按照中国工业当下的发展速度，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支撑更高端产业的出现。

一般而言，出口行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大，中国目前仍旧有非常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当然最终通过教育，会实现产业升级。我的看法是，不能过分依赖出口来支撑就业，而是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可以来源于商业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些岗位更大程度上同内需相关。

我们知道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同个人的幸福感非常有关。作为经济学家，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向好的时候，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但是调查也发现，社会状况、家庭状况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我只是经济学家，所以只能就劳动力市场这一因素提出建议。

威廉·恩道尔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资源分配不均

采访 | 田晓玲



威廉·恩道尔

William Engdahl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著有《粮食危机》和《石油战争》等畅销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比较经济学硕士，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从事国际政治、能源和地缘政治、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农业问题、全球债务等广泛话题的分析研究。

2011年10月31日，全球迎来第70亿位居民。这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前几天在全球100多个城市共同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所宣布的。

地球上每小时都会有上万个新生命诞生。第70亿个人只是象征性的指定。之所以选择在10月31日这一天，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依据各国递交的人口统计数据，按照人口增长率，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出的。

联合国曾经以同样的方式指定了世界上的第50亿个人和第60亿个人。1987年7月11日，第50亿个人诞生在前南斯拉夫。第60亿个人则是1999年10月12日出生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男婴。

从这几个时点继续往前回溯，地球上的第10亿个人出生于1804年，第20亿个人的出现可能是在1927年，人类用了122年的时间增加了10亿人口；地球上的第30亿个人可能出生于1959年，此后不过15年的时间，第40亿个人降生了……人口

每增长 10 亿所用的时间，明显越来越短。到今天，世界总人口仅仅在 12 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又一个 10 亿人口增长的现实。据此推算，到 2025 年，世界人口将突破 80 亿，而到 21 世纪末，则可能会突破 100 亿大关。

世界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又呈现出极其不均衡的趋势，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大多已经停止或放缓，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依然快速。全球每年新增的 7 800 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中。

马尔萨斯在 1798 年提出，人口到达一定的临界点，人类将面临大饥荒等危机。由于科技进步和工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没有得到应验。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仍旧有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饥饿之中；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公布的数据，2010 年全球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估计为 9.25 亿之多。

在世界人口达到 70 亿之际，如何确保 70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地球是否还能负荷更多的人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与处理贫困、不平等、环境保护等难题？所有这些又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

对于全球人口达到 70 亿这个问题，恩道尔的看法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他看来，地球人口的增长并不是严重的问题，“饥荒的程度因为政治原因被过分夸大了”。他特别强调，仅仅让 70 亿人都填饱肚子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有营养、高质量的食物，“当我们意识到高质量的食物对我们的孩子有多么重要时，我们就会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主要政策不做出改变，人口在未来 50 年可能会衰减

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报告，世界人口达到了 70 亿。与过去

相比,人口每增长10亿的时间越来越短,地球上人口的负荷也越来越大。根据您的观察,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除了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之外,还有哪些原因?

我认为,在人口增长的整个统计中,充斥着很多的政治议程。事实上,人口增长并不是让我担忧的因素,我担忧的是在未来半个世纪,人口可能面临衰减的危险。事实上,人口的出生率下降很快,不仅在西欧,北美也是这样,那里尽管有大量来自南美的移民,但人口增长率仍旧非常低。甚至在非洲,那里曾经被看做是人口增长非常快的地区,过去30年间,人口出生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尽管全球人均寿命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这些的确都会给人口增长带来影响,但我认为数据不可能涵盖人口问题的一切。我所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的主要政策不作出改变,人口在未来50年可能会衰减。

我们在关注人口增长的时候,可以看到全球人口的分布以及人口增长的分布其实是不均匀的,更多的人口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这些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其碳排放量却非常少,对环境的伤害也就比发达国家小得多。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均衡的?

首先,我想说的是:碳排放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西方一些强势组织提出来的政治议程。这可能会吓坏你们的读者。其实早在1970年代,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欧美国家就开始试图通过控制人口的增长来控制整个世界。实际上,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人为排出的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变暖并没有很大影响,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更大程度上是由太阳能的影响带来的。我的看法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被加以政

治化了，很多人并不允许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展开严肃的科学讨论，所以，这一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严肃的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评过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论断，他们因此被称做气候变化的否认者（climate deniers）；这类言语不能算做严肃的科学讨论。

但是我们也看到，全球生态足迹网络2011年9月份的计算结果的确表明，如果人口以现有速度继续增长，到2030年就需要第二个星球才能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才能吸收人类产生的废物。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这是根据今天的情况所作出的推测，说我们继续以今天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话，地球就会超负荷。我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如果从50年这样的长时段来观察人口增长的趋势，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口增幅都在下降。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被广泛讨论。

所以，您认为我们的人口并不是太多了？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口。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通过更好地分配资源尤其是能源，来支撑人口的增长。50年或者100年前的大家庭，比如说中国的大家庭，现在已经自然而然地变小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有7个孩子在田间耕作，以此来支撑我们的生活，所以，孩子自然会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已经不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的问题了。拿出一些吓人的数字告诉人们说，我们需要另一个星球，我们

必须开始控制人口等,是西方强势群体所设定的议程,即通过控制人口来控制世界。我指的是在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控制全球人口的人。

在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担忧生育率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是您认为目前全球人口不算多的主要原因吗?

是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我在《粮食危机》一书中就提到,转基因食品和种子诸如玉米、大豆、大米等,其背后的议程是同人口控制有关的,而不是为了替人类着想、提高粮食的质量。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几十年前就提出的政治议程,他们作了很多研究,以便找到控制地球人口的方法。

所以,在您看来,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控制,而应当是鼓励人口的增长?

比如在中国,很多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了。管理人类生命的那些技术是危险的。中国今天的伟大成就也是其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人口,一切将会截然不同。欧洲也是如此。人们似乎忘记了欧洲100年前所经历的增长;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腾飞历程,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正好是欧洲人口增长非常快的历史时段。

印度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是否也是人们看好印度经济未来前景的主要原因?

印度的确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问题是印度的社会结构是分层

级的，这同美国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富有人群所占比例非常少，大多数人群则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幸好，中国还不是这种情况。

马尔萨斯于1789年在其“人口论”中所做的许多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其研究的前提假设——人口增长一定存在某个限度——的确是很难推翻的。从长期来看，地球能承受的人口究竟有没有限度？

那个限度在哪里，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清楚。如果以今天德国或是荷兰的人口密度来推算，那么这个星球可以承受比今天多得多的口。我本质上是乐观的，是马尔萨斯包括今天的新马尔萨斯派太悲观了。

饥荒的程度因为政治原因被过分夸大了

在世界人口达到70亿之际，联合国列举出了贫困与不平等、环境问题等各国应合作克服的七大课题，而其中最迫切的，是如何确保70亿人的粮食问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认为粮食问题确实是我们要加以面对的最迫切问题；全球食品行业的工业化，损害了我们食品的营养。举个例子：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我感到震惊的是，城市的每个街角几乎都是肯德基和麦当劳，还有赛百味。这些东西并不能算食物，某种程度上是包装出来的垃圾食品。你今天去美国，就会看到很多人超级肥胖，不少人年纪轻轻就死去了，这源于他们的饮食和食品行业的工业化倾向。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生产食物的时代，事实上，那样的时代也可以生产

出足够地球上所有人都需要的粮食。我们可以减少在麦当劳工作的人,让他们回到田间去工作,用自然的方式生产食物。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那些对印度和非洲的自然生产食物过程加以破坏的人,企图把转基因种子带到那里,然后促成农业的工业化。这最终将会损害食品的质量。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依然有10亿人在挨饿。根据您的研究,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

的确,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挨饿。但是,他们挨饿的原因,是人们对原材料的兴趣非常高;利比亚人之所以挨饿,是因为美国的五角大楼想要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让石油等能源摆脱当地政府的控制。所以,全球范围内之所以出现饥饿,大部分的原因在于,西方政府派军队到全球的很多地区挑起这些地区的内战,以便控制那里的石油等原材料。挨饿的人主要是由战乱所造成的,如果可以使他们自己待着,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劳作工具,停止操纵和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他们会自己找到填饱肚子方法。饥荒的程度因为政治原因被过分夸大了。

相比2007年,世界粮食价格如今已经翻了一倍,但从人们的主观感觉来看,粮价上涨似乎并没有石油价格上涨那么触目惊心。粮食问题是否一直就是在以这样一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方式恶化着呢?

粮食价格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欧美国家政府拒绝对食品投机加以监管,允许期货市场上对玉米、谷物、大豆等粮食所做的投机。粮食价格大幅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将玉米等粮食转化

为燃料,用于汽车等交通工具。所谓的生物燃料某种程度上是犯罪,那些在优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粮食却被用来当做燃料,而事实上,目前的石油储量是远远能够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生物燃料是错误的做法,也是导致2007年以来粮价翻倍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生物燃料对环境保护、减少碳排放的确有很大好处。面对两难,我们是否应当先考虑粮食问题,能否找到两全的办法?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独立的实验表明,生物燃料带来的排放对环境损害更大,远远大于汽油的排放,生物燃料的排放物对空气有害,从而伤害人们的健康。化学品在这一过程中变化了,生物燃料和汽油一起使用尤其危险。这些实验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严肃机构中进行着。问题在于,鼓励生物燃料是政治议程,2006年布什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向农业公司提供大量援助,让它们可以生产生物燃料,从而获得巨额利润。所以,生物燃料更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议程,对环境并未带来什么可证明的正面作用。

这是否也就意味着,粮价上涨并不是粮食本身的短缺所造成的,我们可以生产的粮食是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粮食危机的话,那只是买不起的危机,而不是不够吃的危机?

的确如此。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还未最大限度使用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地球上有着非常优质的土壤,非洲有最肥沃的土地,乌克兰、俄罗斯也有着非常优质的黑土地。即使欧美国家的土地受到过度种植和化学品的污染,这些土地仍旧可以养活远比现在多得多的口。

转基因食品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粮食亩产量增长已经近乎停滞,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进步会带来全球粮食的大幅增长吗?

我认为,有关非洲地区农业生产的数据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些搜集数据的人希望看到非洲的农业是没有生产效率的。在非洲很多国家,由于战事不断,那里的农业发展远远不够,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人来务农。这是该地区粮食产量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日本、美国仍旧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提高自己的粮食产量。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上,我们关注的只是食品的大规模生产、农业的工业化进程,而农业恰恰是不能进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的工业化在理论上可能听上去很美,但食品的质量却可能因此被损害了。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的正面东西上去。我在中国曾经同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作过讨论,他告诉了我他自己早年学生时代的经历,就是去农田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远离了城市却更接近了农民,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光之一,他因此学到了粮食种植的秘诀,这一切在今天却不复存在了。说这些并不意味着要使我们的生活回到50年前的贫穷状态。我们完全可以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比现在多得更多的人去从事农业?

当我们意识到高质量的食物对我们的孩子有多么重要时,我们就会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如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转基因技术的确被

普遍运用到了粮食种植过程之中。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解决人口迅猛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粮食危机的最优选择。

恰恰相反。美国等一些国家都做了相关实验证明，不论大豆还是玉米，每英亩转基因粮食产量两三年以后都会下降，而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增加。更糟糕的是野草大量出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它们被称为超级野草，具有很大破坏力，普通的化学除草剂对此不起作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野草出现而导致粮食歉收。野草就像恐怖的怪物。转基因食品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

同石油不同，粮食对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似乎并不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新粮食地缘政治”（The New Geopolitics of Food）就提到，中东和非洲发生的动乱正是因食物而起，2011年的粮食危机是一场真实存在的危机。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对于没有足够食物的人而言，的确是一场危机，因为粮食价格一直在上涨，甚至出现翻倍。莱斯特·布朗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固然重要，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东和非洲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粮食危机，而是因为外部力量想要通过挑起战乱来控制这些原材料生产国。我说的是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了追逐利润，食物生产链被加以工业化，从种子到土壤到粮食直到超市销售，每样东西都是借助利润来丈量的。

人们意识到您所说的这些问题了吗？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美国也是这样，人

们意识到食品质量的重要性。食品成为导致人们健康问题以至于疾病的原因,他们吃不到高质量的食物,也就得不到身体所需的维他命等各种营养,他们吃到的是工业化食品,这些东西看上去像食品,闻上去像食品,但不是食品。持续吃一个月麦当劳汉堡,你看看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经济发展不能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

采访 | 田晓玲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otonio dos Santos

“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巴西弗卢米伦斯联邦大学终身教授、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和发达国家经济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猛，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当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风景这边独好”的金砖国家自然被寄予厚望，这也是此次峰会备受关注的重要背景。人们相信，金砖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势必会有利于世界的整体向好。

然而，在人们将金砖五国看做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自然会给我们理解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构成障碍。

那么，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些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依附理论”，或可为此问题提供一个理解的

框架。“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或是仍旧不发达，或是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不发达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此应运而生。一开始的“古典依附论”倾向于认为，依附国家本身是无法发展的，后来，“依附发展论”发现了依附与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发现，由此走上发展之路的国家不得不面临经济结构、社会转型方面相继浮出水面的种种难题。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金砖五国未来到底会走上怎样的发展路径，也不知道诸如“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会否成为他们前行的“拦路虎”，但是，“依附理论”至少可以为我们考察这些正努力携手前行的国家以些许线索。

区域化必须在国家间更强有力的合作基础上才能形成

您的“依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后30年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现状所作的分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否出现了变化？如果是，您又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全球化让国际格局更加一体化，关联度更高，但是，一体化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体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生活，还意味着矛盾的增长，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很多人认为，我们研究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但其实这些理论在现在这个状况下体现得更加明显。

比如，第三世界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第三世界并不重要，但现实正好相反，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

时，第三世界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并且变得更加复杂：像“金砖国家”原本只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这些国家真的形成了一个组织。新自由主义也无法理解人口的力量，以及整个地区性目标所起的作用：如拉美地区的一体化会独立于政治介入，变得越来越深入。现在发达国家处于危机中。冷战以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现在美国的地位正在下滑，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唯一超级大国的时候，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现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虽然超级力量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依附体系，很大程度上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身上，从而使灾难更为深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却发展迅猛，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情形？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人们还在鼓吹自由市场和霸权主义，但迎来的却是美国霸权的结束。对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并没有做好准备。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场冒险，垄断者们试图说服世界采取自由市场的政策，但世界却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他们没有备选方案来应对。很多人认为，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让这些在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外的国家回到中心来。所以我们要继续研究，建立起基本的政治要素和行动模型。这不容易，但我相信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界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有观点认为，随着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原来以

“中心”和“边缘”为两分法的“依附”关系可能会发生某种逆转。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是改变而不是逆转。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在发生变化，当我们来分析这个以“中心国家”、“依附国家”为两分法的体系时，并不是说它会永远存在。实际上，它在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方向和逻辑将会越来越倾向于新兴经济体。资本主义体系无视了世界70%的人口，没有把他们融合进来，而我们不能把经济发展停留在一个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的体系中。

融合的意思是：比如，民主并不等同于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决策机构的一部分，而是意味着主体性的觉醒，主体们希望融合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中来。又比如，全球范围内的媒体虽然并不一定能在所有事情上给出正确的理解，但媒体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复杂。身处专制帝国中的人，会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一无所知，甚至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而资本主义力量成长起来以后，发达国家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这也是发展。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每个人都从某种程度上明白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与此相对地，另外那70%的人口很明显仍旧生活在困境中。

在这种改变的基础上，世界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未来30多年，世界发展和重塑的趋势，将会是围绕特定的一些经济体，形成更加明显的区域化格局。当然，区域化趋势是在更强有力地促成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的。

很显然，美国试图保持原有的世界格局。所以，他们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不断干涉他国。但是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所遭受

的挫败显示，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应该秉持的观点是：人类不能过多地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人类已经不能承受战争了，任何战争都没有赢家。“二战”以来，美国多次参与地区冲突，但都没有赢得胜利。相反，参战导致美国实力衰退。

如果美国一直秉持战争理念，那么在未来几十年内，对于协调那些如今还能够勉强支撑起来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进程都将是于事无补的。我想，未来的危机或许会非常令人震惊。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新兴经济体创造的

您觉得“依附理论”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吗？如果适用，为什么它们会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发展那么快速呢？

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增长，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增长中，哪怕是中心国家也没有负增长，只是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眼前，我们已经度过了2008年那一波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又开始回暖。可以说，新兴经济体正在维持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而且很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新兴经济体创造的。所以，如果把全球经济看做一个整体，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体系中，“二战”后的那种旧的动力正在被一种新的动力所取代，而且这种新动力正在不断增长。新兴经济体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内市场，无论是在需求还是生产、组织、技术方面，都给世界经济增添了一份新的力量，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拉美而言，10年前，中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这1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美最重要的贸易方向。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金砖国家内部,由于资源禀赋和产业能级相近,会不会存在某种竞争?

当然,我认为一定会有竞争存在。而且,金砖国家确实也需要竞争。这很正常。但此时此刻,这还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中国也是资源和原材料需求大国。中国所需的资源可以从非洲、拉美获得。问题在于,在非洲和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出口原材料并不是个好主意。他们希望能够对本国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中国一定要尽快对此作出回应,并不能只考虑购买原材料,也可以购买一些经过加工的产品,这不仅能使非洲、拉美等国获益,同样也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所助益。

的确,这些国家现在尚有很多资源可以开采,但是,资源不可再生,总有一天会开采殆尽。目前,在资源领域的合作上,金砖国家之间的确还存在空间,还存在共同利益。所以,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

在拉美,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工业领域的发展中,中国和拉美国家存在竞争。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拉美在国家层面的事务上能力欠缺,无力去推进一个有利于促进地区发展的大项目。而且,在与中国就相关问题的谈判中,也没有太多优势。中国很愿意在谈及拉美时将其称为世界经济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和拉美更广泛的合作,且至少现在来看,拉美还非常落后,需要中国的帮助。

拉美自身是否有优势呢?随着种族问题的消解,如今拉美国家正在南美洲国家联盟(USAN)内部讨论有关原材料、经济发展以及区域规划、地区公共政策等问题。而这种规划,在我看来是拉美地区和中国谈判时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促进金砖国家内部共同发展。

中国也应该很愿意对此作出贡献。拉美国家有着复杂的过去，且经济活动中的承受能力也比较弱。比如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拉美国家或许在短期内可以获得经济规模的增长，但同时也会付出失业率上升的代价。

所以，拉美有自己的问题。当然，拉美国家现在也在积极重塑自身。拉美国家在积极为新的全球经济社会格局作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国家对于“区域”重要性的理解也在迅速提升。

金砖国家基本上都是大国，这种大国意识会否妨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如果金砖国家仔细审视自身和彼此，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里，金砖国家在本国生产方面也有相似的问题。这些国家现在必须清楚，什么是可以预先规划的。如果继续容忍经济发展中市场化手段所带来的问题，就会继续导致争端。而如果这些国家能够保持基本政策的持续性，那么就可以幸免于难，且迎来更大的发展。因为单纯的市场手段并不能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相反会增加人类之间的隔阂。

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如何解决世界上70%的人口被排除在主流世界以外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确落后，但是都在努力改变。他们希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仅在政治上积极参与，而且也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

此外，犯罪率上升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有组织犯罪力量的扩张，会伤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承受能力。而犯罪率上升，往往是因为缺乏让边缘人群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因素之一。目前

世界上一批有识之士认为,应该控制和引导某些不稳定因素,而不是直接予以摧毁。

新的发展必须尊重旧的文明

“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学派提出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依附到底能否带来发展,如果能,条件有哪些?

如果金砖国家可以对世界的实体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依附就应该会越来越少。如果金砖国家未能影响世界,那么就不仅会把金砖国家,而且会把所有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国家(NAM)和南南合作国家都带入可怕的无序状态。因此,所有这些原则必须成为架构世界逻辑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为此斗争,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失败了,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您是否可以简要评价一下包括您在内的诸多理论家所提出的“依附发展理论”?

我们的学术界曾经因军政干涉而遭到破坏,我们需要时间来重组学术界。因为学术界不仅要批判性地思考世界,也要满足国家部门的需求。这是学术界的两种功能。但一旦致力于满足这样的需求时,人们就不会非常具有批判性了,也不想具有批判精神了,而只是为了这个体制服务。当然,要改变人们的想法是很难的,因为很多人也都是宣传灌输的受害者,即便在学术界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并不能理解、解释正在发生的变革,固然也可以进步,但进步的步伐会

小得多。

中国正在走向进一步的开放,试图对世界有一种更复杂、更有机的理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你们正处在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具有相当大的改革能力,当然压力也不小。有种种有利因素也许并不能一定保证成功,因此,必须深入探讨如何才能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能力。现在,学术界还未能适应目前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尽管美国学术界也能够就此话题开展一些对话,但主流思想还是非常缺乏批判精神。欧洲也是,欧洲人只想着自己,但其实世界已经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我们的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具有很强影响力的,现在到了21世纪,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但要重新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还是有点距离。我们在不断改进我们的理论,但现在还是不太完善。

“依附理论”也提出,虽然依附带来了短期发展,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造成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如果产生了这种结构性畸变,有没有解决方案?

应该大力发展新技术。现在的各类研究已经从纯粹的、形式化的知识转变为更实际、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的知识。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有可能将技术运用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正在朝这一方向拼命努力。我想中国会成功,因为中国有5 000年的知识积累,可以整合新的知识和科技。拉美同样也有非常强的传统资源,我们的知识基础也可以让我们很快地掌握这样的科技。一旦我们拥有了技术,就可以对其自由运用,而不用从属于那些拥有发达科技的国家如美国、欧洲、日

本。当然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旦你掌握了最高技术,就不用再依附其他国家发展。

现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拉丁美洲在5 000年前有很强大的文明,有宏伟的建筑和发达的生产体系。拉美文明后来被欧洲人破坏了,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并且更加尊重人性和差异性,更加尊重不同社群及他们的想法。

我们生活在拉美的人要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组织、理解现代化的进程,不能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发展,发展必须成为既有文明的一部分,新的发展必须尊重旧的文明,整合所有好的知识和经验。

也有人提出,依附性发展的结果是,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我们是应当指望精英阶层来拯救普通大众,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政府来扮演这一角色?

指望精英阶层对人民来说太可怕了。你知道非洲现在的情况吗?现在世界银行控制着非洲,想把非洲人民带到市场体系中去,但其实他们在市场里根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们的产品根本没法在这样的市场里竞争。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非洲人被强迫进入大城市,却在里面无所事事。而欧洲和美国是如何帮助他们的呢?他们给这些挣扎中的人们的那些援助,是来帮助他们发展自己吗?这样的援助对人民其实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它帮助的是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是世界银行、IMF以及这些大型国际组织在那些地区的部门领导。这样的援助更加强化了依附,让欠发达地区更

加落后。欠发达地区并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它们之所以成为欠发达地区，是因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经济。现在的这些援助实际上有助于维系依附的现状。要指望所谓精英阶层，绝对不是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解决之道是给这些人以工作，让他们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

青木昌彦

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

采访 | 田晓玲



青木昌彦

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196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之后，青木出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和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在，他还是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1998年，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学会的熊彼特奖。他也一直被看做制度经济学家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人选。青木昌彦于2015年7月去世。

有人说，世界级管理大师在亚洲的代表是日本的大前研一，而世界的经济学家在亚洲的代表人物，青木昌彦算是其中之一。2008年6月，青木昌彦被推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这是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斯·阿罗、阿玛蒂亚·森等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出任过的职位。

传统上，市场被看做是人类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不过，在20世纪的后20年，人们日益认识到“制度才是重要的”。从道格拉斯·诺斯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的成果，对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做整全的研究，以期认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厘清人类经济的发展规律。

作为新比较经济学中最重大的方法创新，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包括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对制度问题展开了深

入分析。同时，青木昌彦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现在为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由他发明的。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还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青木昌彦就到过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际，他更是多次来到中国，同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在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他还特地回到日本，从2002年起开始系统发表关于“失落的十年”的系列评论，促成了后来的日本、中国乃至全世界重新认识日本的一场新运动。

制度有好有坏；好的制度取决于“人”

您是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代表人物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在许多场合，人们都会让您来解释“制度”的真正意义。我们想知道的是，您说的“制度”，是不是更接近于传统习俗，而不仅仅是一些成文的法律规范？

很多人认为“制度”就是类似于法律的一些东西，制度改革就是法律规范的改变。在我看来，制度其实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中彼此互动的方式，以及人们对这些互动方式的预期。关于社会行为，人们必须形成一些共同看法。从博弈论角度来说，这就是博弈，这种博弈状态才是社会的运行方式。人们借助外来因素对这些稳定的博弈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制度。外来因素可能是法律、习俗、规范，或者诸如中央银行、法院之类的组织，人们对各类组织如何运作有看法、有预期，这些看法和预期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了制度。人们相

信这就是社会运作的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后就会根据这些看法来行动。

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制度”、“均衡”之类的概念还是比较抽象。您在自己的书中也尝试着举例说明,比如:尽管政府颁布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普遍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法令,那么,与其说法令是制度,还不如说贿赂官员更能被看做是制度。“制度”概念的弹性真的有那么大?

我的意思是,制度就是人们共有的看法。当然,制度有好有坏。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法律的改变,就去改变制度,改变社会博弈方式或者说社会的运行方向,除非人们相信这些方式的确就是社会博弈应当遵循的规则。

您也通过制度比较分析研究过俄罗斯的转轨经济,发现当年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尽管曾经派遣大量经济专家前往莫斯科指导那里的经济改革,效果依然不好。这是否意味着,“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外源性”的,而是“内生性”的?

的确是这样。在中国的案例中也是这样,19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也派了很多专家,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时任总理朱镕基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后来吸取了这些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包括国外的商业实践、公司治理的法律、中央银行的法律,等等。当你建立起这些法律,中国的央行按照这些法律开始运作,国有企业依此转制为公司,开始以公司的方式运作,你就会获得一套概念,知道诸如中国电信、中石油是如何运作的,央行是如何管理汇率的。你对此会产生一定的预期,这些才成为制度。

在您看来，好的制度究竟是被政治家们所设计出来的，还是被创新型企业家所引发出来的？

好的制度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家。事实上，好的制度取决于“人”，包括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他们制定的政策会决定人们的互动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把人们的预期、信念和看法都包含在内。这是政治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博弈。双方都必须形成一定的预期和看法，并且考虑其他组织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社会就会在博弈和互动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那么，决定“制度”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技术，市场诱导的力量，或者“文化基因”是否都算得上是这些因素？

是的，这些因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还包括社会习俗。

政府应该更多地从市场退出，转而扮演市场守护者角色

“内部人控制”是您在研究转型经济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意思是指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由于不够谨慎而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好多年过去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您看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的确是这样。1990年代学术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我之所以提出“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有企业转制成现代公司是一种潮流。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司的表现通常会在股票市场有所体现，公司表现不好，股票价格下跌，就会对公司管理产生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管理不善的公司会更换管理层。但是，如果国有企业在转制后，管理层仍旧掌握权力，占有公司相当大

的股份,这些份额仍旧为政府持有,那么,外来的控制就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管理就仍旧会停留在原来的状况。我感到,这种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如果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太大,企业就不可能真正运行,也不能真正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近来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看到,最近国际上有不少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出现。在您看来,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有哪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中国的状况是,在过去20年,有差不多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些人被称为“流动人口”。问题在于,“户口”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割依然存在,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户口的人要想参加当地的高考,仍然存在障碍。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土地所有权。有农村户口的人都拥有土地使用权,但是他们在社会保险方面并不是特别有保障。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国有2亿流动人口,未来可能还有1亿人要流动出来,10年以后,19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要面临退休,如果他们回到乡村,那么,用什么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是中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

还有一个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在诸如财政关系上的相互博弈,在您看来,它会不会带来某种道德风险,最终影响国家能力的建设?

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过一场财政体系的变革。1980年以前,中央政府不能自己直接收税,而是由省级政府来完成,牵涉到如何通过

协商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分配税收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1980年代的公共财政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到1990年代,税基从省级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包括增值税、收入税,都更加“中央化”。这是非常好的变革,可以使全国市场更加一体化。但它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省级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但是钱却被收到中央政府层面了,尽管中央政府也会把相当部分返还给地方政府。问题在于,这种转移应该更加透明地加以操作。这是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改进的问题,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要。您曾提出,在市场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演变过程中,政府必须是有效的、具有执行力的,政府应该起到“利益协调人”的角色。在当下中国,分配公正、道德诚信的讨论备受关注,人们期望政府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么,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如何界定?

如果从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的话,日本、韩国和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共性。大约在150年前,这些国家有超过80%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之后,从这种状态转变成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格局,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使农村地区的过剩物资转变成工业化资本的过程中,需要政府扮演一定的角色。就中国的案例而言,1950—1970年代,政府在将农业剩余转化成工业积累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经济起飞因此才成为可能。但是,一旦经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流动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了(这一阶段在中国大致发生在1980—1990年代),我觉得,政府就应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退出,转而确保市场能够高效、均衡、透明地运作,这个时候,政府相当于扮演着一个市场守护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关于政府角色的讨论,是基于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而言的?

是的。我们必须先经历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阶段,然后才是人口开始流动的阶段,这时,在工业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市场完全建立起来了,市场更加透明、市场的发展更加基于人力资本。中国过去20年在教育均等化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人力资本也有了显著提高,有更多的人进入到高端产业中。在1950—196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快,新增人口几乎全部进入生产领域,这就是中国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原因。从1980—1990年代直到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现在,这个过程慢慢进入停滞,因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我们不可能指望人口还能够大规模增长;同时,大部分人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仍旧住在农村的人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不可能流动到城市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可能出现了转折点。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增长必须更多地寄希望于人力资本的提高,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组织运作方式等来提高个人生产率。这才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教育、保证劳动力市场更加高效地运作,以此来保证人力资本的改善。

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要求不断调整制度, 适应不同阶段的需要

您提出,中、日、韩的现代化进程是被高度压缩的;与用了较长时间慢慢地自发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这类经济奇迹还需要格外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危机因素?

东亚现代化的过程被高度压缩了,所以,它们的老龄化进程会非

常快，像日本、韩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个阶段，就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人，比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要更快。要考虑如何支撑这种局面，必须让就业人口的生产率得到更大提高，这样才能支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议题，包括如何设计社会保障体系，如何使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更加透明，如何更多地通过教育、培训去投资于人力资本。

日本“失落的十年”广为人们所关注。为什么人们对它做出的解释会存在很大分歧？在您看来，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什么？中国能否避免这条弯路？

我的解释非常简单。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连续阶段。日本经济发展出现过人力资本投资非常多的时期，通过组织人力资本，包括改革企业架构来适应人力资本的变化，1970—19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现在，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和韩国都后来居上，与日本相比更加具有竞争优势。日本必须通过自我改革来适应新的阶段；面对就业人口的萎缩，要提供更多机会给女性和年轻人。日本的组织架构是依据工龄来提升职位的，工作时间越长，职位越高，所以公司高层都非常年长。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老年人不一定知道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日本企业需要做出变革，更多地提拔年轻人，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事务中来，女性也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这样一来，就业人口萎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问题在于，日本的政治家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迟早也会碰到老龄化问题。韩国也是。一开始，韩国的劳动人口比例非常高，但老龄化进程非常快，未来10到20年，韩国的劳

动力人口萎缩速度以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比日本还要快，所以，也需要年轻人在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女性更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日本过去的生育率一度下降得非常快，但是2年前开始有所变化，三十八九岁的女性也开始生育，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也标志着社会更加成熟。

也就是说，您认为日本的问题出在老龄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汇率、银行问题？

日本这一时期的汇率、银行只是产生了一些问题，但都不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考察根本性的问题，我一直强调要从非常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你就会发现日本现在其实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韩国和中国也会很快进入这个阶段。

制度经济学为中国学界看重，但是长期以来它仍旧未能处于主流经济学的位置，您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我觉得制度经济学应该进入主流经济学。中国的发展非常快，在非常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断调整制度来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制度经济学更加感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美国，他们的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他们很少看到在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仍旧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人口和老龄化，而欧洲则面临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以及社会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问题。

我希望，相关组织能够像国际经济学会的年会那样，推动人们形成更广泛的视野。这次国际经济学会年会，我们有人口、社会规范、宏观经济、农业等讨论专场，这些话题都是互相关联的。来自全球不

同国家的人,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参与,显得非常重要。

您在书中引述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话说,身处不同社会文化之间做跨境理解,存在着精神分裂的巨大风险。作为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您长期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往来观察,是否也感受到这种压力?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像我以及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要想深入了解不同社会的运作的话,观察来自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人,同他们谈话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跨境理解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钱永祥

社会急速变动使价值和规范无法成型

采访 | 李纯一



钱永祥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专长于黑格尔哲学、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著有多篇论文与学术书评，合集为《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译有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与孟祥森合译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主编季刊《思想》。

讲演之前，钱永祥双手十指交叉向前，像是运动员的赛前热身，小小摩拳擦掌一番，打算与台下华东师范大学的听众们抵掌而谈，讨论“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否有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可言”。因为，从“小”动物讲“大”道理，还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论题，只有你来我往的交锋对质才能达成更深入的理解。因此他说，“道德就是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在现代社会，再没有比说理更重要的了。”

从高亢的青春之歌，到南港的知识分子，近年来孜孜矻矻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宣讲动物伦理，钱永祥依然“清晰而丰富”。他说自己也像以赛亚·伯林那样，相信文化多元，但不能接受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他倡导减少痛苦，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特别希望每个社会都能把弱势群体也看成是一个社会完整的成员，让他们有充分发展的机

会——社会资源怎样公平分配，不单单是出于道德的关怀，也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公平分配会带来社会稳定。

他接受的学术训练，见证了西方道德秩序观的演进，背负的则是中文世界里的社会想像。

要把个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潜能的生命

我们还是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启蒙运动谈起。启蒙运动被认为促成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您比较认同以赛亚·伯林的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一元论和多元论概念，它们是否也是启蒙运动导致的不同理路？

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就是导致了一元论。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运作方式，而这种运作方式可以保证我们找到最后的唯一真理，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信念。所以，启蒙运动保障了一元，但是启蒙主义的一元主义又是普遍主义的，不相信在我们真正使用理性之后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照伯林的话来说，启蒙主义一元论的特色就在于：相信真理只有一个，我们知道怎样找到这个真理，找到它的方法也只有一个。这个一元具有普遍性。似乎中国人的理性和美国人的理性不会两样，用一种理性的路径就可以保障我们都能找到普遍的也是唯一的真理。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把一元论和普遍主义并置在一起讲的，但是伯林却说自己多元论者。他的多元论在思想传承上有启蒙运动之外的源头，最主要的就是浪漫主义，这也是18世纪的重要思潮。伯

林主张用多元论来对抗启蒙主义的一元论。可是,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伯林自己也说,他又是一个普遍主义者。

一个多元论者怎么可能同时主张普遍主义呢?

在读伯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的立场——可以相信文化多元,但不能接受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在我看来,价值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对和错了。事实上,很多文化价值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也有人相信,但后来我们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比如中国过去的一夫多妻制、女性裹小脚,是中国文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特色,但它们是错的,被废止了。对于文化价值,我们是得问一问对和错。所以我主张:要接受多元论,但在多元论之上,也要找到让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这样的标准不能内在于某一个特定文化或某一特定时代。

那么,我们去哪里寻找这样一个超越了特定文化、超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准呢?就我自己的研究感受而言,有两个可选的进路。其一,我相信人与人之间都有说理的义务。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我不能仅仅说我自己的就是对的,我一定要寻找到理由来支持说我是对的,而这个理由不能是我自己的理由,而必须是别人能够接受的。所以,在多个价值观或文化之间,一定要有说理的过程,要相互说服对方。在说理的过程中,那个理由会逐渐变成普遍都能接受的。要通过提供理由来克服价值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

其二,有一些基本价值,并不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中国人、男人,才为我们接受,有些价值,我们知道对生命是不好的。消极地说,制造痛苦、制造伤害是不好的事情;积极地说,我们希望每个人的生

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今天世界政治与社会的变动也促进人们对启蒙进行反思，您觉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否就是严复说的区分“群己权界”，也就是划定个体和社会的界限？

这几年我的研究课题就是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人一定要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和能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想法，也就是从个人出发，把个人的选择和决定能力放在首位；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人的选择和决定能力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同社会和经济因素有关，马克思主义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看待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它们看成互不相容的主张。一个社会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只强调个人自由，那么，它可能会变成大多数人即使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作自我选择了。

传统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能够使个人获得最多自由空间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这一传统，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自由不是一个空洞概念。我们今天对自由主义有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只强调个人选择，强调个人选择自己的偏好、欲望或利益。这是一种非常贫瘠的个人观。其实，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有自己的一套生命，有自己的来路，有自己对未来的展望，有理性能力，能说明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是好的和对的，因为这个选择能使自己的生命更丰富。

在对个人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要更为丰富。马克思特别是在他的早期，把个人看成具有潜能的生命，一个处在潜而未发状态的生命；个人能否把所有生命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

个圆满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所以，马克思会那么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使个人没有机会创造自己，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自我，都因为疏离的结果而异化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从这样的基本道德关怀出发的。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人从这里推导说，个人是虚构的，只有社会关系才是真实的。这样的推导不辩证。马克思也说过，人能够创造自己、社会和历史。如果人只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那还有什么创造可言？马克思的想法其实来自亚里士多德，即把生命看成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生命的所有潜能。

传统的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是否有了很大变化？

自由主义在现当代发展得越来越好，罗尔斯的学生们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及另一位女哲学家努斯鲍姆。

这次我到华东师大来讲动物伦理学，一开始也是先讲效益主义和功利主义，然后讲权利论，这两种道德学说基本上反映了自由主义传统中密尔、边沁和康德的传统。后来我讲努斯鲍姆有关动物的看法。她说动物也是自然界的生命，但有可能被糟蹋了，因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丧失了本性，动物只有在原野里才可能尽其本性。她说，人在看待动物时也应该考虑如何让动物尽其本性。而传统的效益主义、康德主义谈动物，只会谈到我们怎样满足它的需求，减少它的痛苦。这个对比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来看人，自由主义不能再把个人只看成是满足欲望的

人了,而是要把人看成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偏好。

存在着比共识更重要的真理标准

前面您也谈到,不同的思潮之间要有沟通,要从说理开始达成共识,形成价值的核心。您是否认可罗尔斯“重叠共识”这样的概念呢?

我的理想是我们期待的沟通能找到标准,这样的标准不只是共识。我相信存在着比共识更重要的真理标准。我们需要的可能比共识更多。我一直强调,减少痛苦,让每一个体生命得到充分发展,这两个价值的权威性应该超越了共识。我们不仅要在政治生活上和谐公平地生活在一起,还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这种期待超过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对共识的追求。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当下全球关注的焦点,其中如何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更受关注。您在自己的比较研究中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分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各有表述。简单来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两种分配方式都还不够。按劳分配是能力高、贡献多的人获得多,但是社会上人们能作的贡献并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个人的责任,比如残障者就没法与别人竞争;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劳动力比较值钱,所得也多。但我们要反过来问,国家和社会有没有给每个人以公平教育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就很不公平。

自由主义提出,每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你选择不工

作,那你就没有收入,如果你有心工作,先天或后天的条件使得你的劳动力不如别人,社会就要帮助你。在这个社会,每个人要获得基本的发展机会,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基本的医疗、教育、温饱、住宿,还要有基本的安全感。公平的分配,就是使社会有一个起点,让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应得的资源和机会。

罗尔斯的《正义论》强调正义即公平,正义要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实际上就是为社会弱势群体设立了保障底线。

罗尔斯的理论确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由主义传统上对于分配问题是比较忽视的。19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兴起,劳工阶级、社会下层觉醒,促使自由主义重新思考分配问题,罗尔斯则是承继了这个传统。有人说罗尔斯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依据相关理论在公共政策上实行了很多年。社会不公不只是阶级剥削,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怎样把弱势群体也看成是一个社会完整的成员,让他们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公平分配会带来社会稳定

您在自己的讲演中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一个人感知别人的痛苦变得越来越难,人们对周遭人的痛苦产生了麻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问题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社会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基本的安全感,人心就会比较平和、宽厚。一个社会,当然会有人处境

不好,如果社会能够合作,让这些人即使处境不好也不至于没有生存机会,这对人们的互相不信任会有减缓作用。台湾以前也是大家不信任对方,互相敌意,到了邮局,任何排队的场合都抢成一团,所以有人说,台湾人都有逃难心态,惟恐落到后头。后来我们发现,那不是台湾人的心态有什么问题,而是环境造成人们没有安全感,落到后面就会处境不利。这同社会保障机制有很大关联。

说到底,社会资源怎样公平分配,不单单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也有现实的考虑,因为公平分配会带来社会稳定。

回到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导致的“祛魅”,使得人们对宗教不再敬畏,这是否会带来道德的约束力不断受到削弱?我们是否可以把今天道德衰退的现象归咎到启蒙运动?

道德衰退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非基督教的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启蒙运动破坏了我们神的信仰,对宇宙秩序的信仰,它的冲击是否一定导致道德崩坏?我看不见得。有宗教信仰或超越性秩序的信仰,也许容易建立起一套道德秩序;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了那套信仰,人类的道德秩序究竟如何建立?

造成今天道德崩坏的原因,与其说是宗教世界观的崩溃,不如说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人口流动、职业流动等,使今天的人们不再基本上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和秩序里了,每个人原子化得厉害。社会快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要求人们如何去行动,我们不晓得。比如,现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很受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金融界完全没有了商业道德和伦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呼风唤雨动辄就是几十亿美元,他们的角色是全新的,不像过去以制造业为本的资本主义那样,资金的募集、使用和回收都

有一套固定商业规则。这是大规模急速变动的时代,任何东西都难以沉淀下来,价值和规范也就没法成型。

这个时候我到这里来讲动物伦理学和道德进步,也不是无的放矢。怎样对别人的痛苦更敏感、更关怀,这是很容易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不用去讲安身立命,只要社会上多一些人用这种心情看事情,有安定的心灵,社会就会更好。

讨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想家好像不太多,是否因为思想家们在金融领域的知识不足以给出完备的应对之道?

美国现在的问题,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就可以明白。他们的愤怒一是针对美国的银行家,另外是针对美国的政客,认为政客被金融家收买了。美国的病根并不在于它有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这个制度里面的贪婪牟利之心逐渐渗透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德沃金有过一篇文章叫做“金钱:美国民主的诅咒”。他认为美国民主的最大问题,是金钱力量的渗透;这也就是今天华尔街的情况。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成为金权政治,伤害了资本主义本身,也伤害了民主政治本身。这样就会使政府的独立性丧失,就像美国国会倾向华尔街那样。而之后,就会有像这些自称代表美国99%的人站出来了。

启蒙运动之后出现了知识膨胀、技术扩张,但与此同时,反智主义倾向似乎也很强烈,在美国社会表现得特别明显。为什么会出现与启蒙运动的主旨大相径庭的这类倾向呢?

启蒙运动的缺点其实正在这里。它把理性和知识推举到那么高的地步,认为所有人间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这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对理性的崇拜和迷信。启蒙主义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其

不仅仅表现在宗教狂热分子身上，也表现在科学主义身上，即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科学理性来解决。所以，反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反智的、蒙昧的，一种是把智当成唯一可靠、可信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回到伯林那里，采取多元论的立场，也就是说，人生有很多领域，理性和知识能处理的只是其中某一块，这部分的问题要尽量按照理性方式来处理。但是人生还有很多问题不是纯粹用科学理性就能解决的，这时，我们就要尽量扩张理性的概念。伦理学讨论的理性就完全不是科学式的理性。

您曾就“儒家与自由主义如何在分歧中寻求共识”这一问题与其他学者展开对话。在道德重建问题上，人们提出不少口号和方案。很多人还是觉得儒家的礼义廉耻、反求诸己之类的道德要求更显亲切。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否还是应该回到儒家，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心性？

我很认同礼义廉耻、反求诸己这些观点。儒家对人和社交交往的要求，都值得追求。但儒家有两个基本的限制，一是儒家不能承认所有人的平等。今天的时代是每个人都平等的时代，一个人不能因为才智较差而导致其作为一个公民在地位上较差。此外，儒家有一套做人的标准，成为君子和圣贤的标准如果要使社会成员都能接受，其实非常困难。多元社会寻求重叠共识，它的出发点，就是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共识的结果有认同，这其中的程序不能省。而儒家恰恰对于这一共识形成的程序有所省略，当然，遵循这套程序最终得到的结果不一定是儒家的。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采访 | 田晓玲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人类未来》《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等。

“9·11”恐怖袭击是继珍珠港事件后，历史上第二次对美国造成重大伤亡的袭击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2 998人遇难，包括411名救援人员在此事件中殉职。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随即宣布将对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以及保护他们的国家实行军事报复，随即先后发动了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打击。美国也由此被拖入反恐战争的泥潭，过去十年军力和财力不断受损，却未能有效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

2011年5月1日，美国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预示着全球反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但是随后不久，塔利班迅速予以还击，击落了美国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22名队员搭载的直升机，这支美国最精锐的部队遭受了20多年来最致命的打击，也印证了人们对恐怖组织复仇

的担心不无道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显然远远不会因为本·拉登之死而结束。

美国《时代》周刊在“9·11”十周年来临之际曾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对美国来说是悲惨的十年，只有6%的民众认为美国已经走出“9·11”事件的阴霾。“9·11”事件也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观，“后9·11”时代的美国人更趋向于“孤立主义”。有约6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过多地干涉了国际事务。许多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更关注于本国事务，与其关注巴基斯坦问题，不如在解决美国国内庞大的赤字、政治僵局、飙升的医保预算成本等问题上多花些精力。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秩序？“9·11”事件后一度盛行的“文明冲突论”是否具有对恐怖主义的解释力？反恐战争到底何时能够结束？弗朗西斯·福山，这位以倡导“历史终结论”而蜚声全球的著名政治学家告诉我们：“‘9·11’并不代表一个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历史趋势。美国对‘9·11’的反应是过度的。”他承认：“如果‘9·11’袭击失败，那么过去十年的历史会非常不一样。”

“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应是过度的

回顾来看，您觉得“9·11”事件的发生是始料未及的偶发事件，还是已经可以在全球政治关系中找到一些线索，早晚都会爆发的极端事件？

“9·11”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偶发事件，它并不代表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历史趋势。只能说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运气比较好

而已，成功策划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攻击，杀死了很多美国人。但我不认为基地组织就代表中东地区的大趋势，这些非常激进的少数派并不能吸引很多追随者。

“9·11”事件后，美国的反应是过度的。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了。美国的介入导致大规模反美浪潮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在那些地区的骚乱。试想，如果“9·11”袭击失败，那么，过去十年的历史会非常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不认为“9·11”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会发生的。追随基地组织的人也明白袭击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否成功。的确，这是一个危险的组织，我们需要予以控制。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美国应该在事先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方面做得更好。事实也证明，只要美国政府动员起来，阻止恐怖主义，效果将会非常明显。你看，“9·11”事件以后，过去的十年，再也没有一次袭击能够在美国本土得逞了。

“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正在上海访问，这位著名思想家表达了对此后人类历史进程可能出现重大转折的担忧。现在来看，“9·11”事件究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其实，我并不认为“9·11”事件会带来巨大的后果。我想重申的是，基地组织并不代表中东地区在政治方面非常大的趋势。本·拉登之死可能让基地组织变得更加不重要了。相比之下，眼前发生的变局可能影响更大，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对民主的要求。阿拉伯人民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治理并不满意。这可能是过去几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9·11”毕竟还是改变了美国外交的关注重心。

“9·11”袭击使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忧心忡忡，很难放松下来关注其他事情。在衡量事情重要性上，这是一个影响因素。幸好，我们现在变得更加平衡，能够判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威胁了。

“9·11”发生后，全球金融危机是又一个重大事件。有人说，“9·11”事件从政治上挑战了西方文明，而金融危机则从经济上挑战了市场经济。就这两大事件而言，哪一个对您的冲击更大？它们是否修正了您此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我不认为两者是根本性的挑战。就像我前面说到的，“9·11”事件来源于一小撮少数派，导致美国反应过度，导致随后十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但我不认为它会带来非常长期的影响。它也不会动摇西方文明的根基。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更重要些，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过去几年，美国过度强调自由，类似“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思路，非常倾向于放松对资本的监管。银行业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它所冒的风险就可能会给其他所有人带来损害。这就是危机发生的路径。这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并没有发生危机。所以，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某种方式的危机。

恐怖主义是弱者使用的武器

本·拉登在“9·11”十周年之际被击毙，对世界历史进程而言，仅仅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隐喻意味？有人认为，拉登被击毙后，反而

给反恐带来很大的不利。您认同这样的观点么？

我认为它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个巧合。目前基地组织内部并没有出现像样的领导力量足以继承本·拉登，由此，该组织会非常弱化。我认为该组织正在失去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的问题正在产生，新的基地组织力量也正在出现，比如在也门，加上那里的政治骚乱，形势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现象。

我也并不认同美国的重心仍旧在反恐的说法。的确，击毙本·拉登对奥巴马的支持率有很大帮助，毕竟是他杀了本·拉登。但我不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重心还在基地组织上面。我们有很多问题有待处理，比如阿富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本·拉登的问题，还有塔利班问题。这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奥巴马提出从阿富汗撤军，但成功撤军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立。所以，这仍将是一个问题。

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民主化并没有让美国感到更安全。您怎么看西方民主在这些国家遭遇的困境？

民主的出现需要很长时间。伊拉克的民主，时间还非常短，并未形成很好的机制，可能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民主才可能牢靠地建立起来。埃及等国家要建立民主制度，也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那些国家的政权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如果能够在那里建立起非常稳定的民主，最后就会优化经济和贸易关系、改善政治合作。所以，民主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需要一个过程。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遇强烈反对。反恐需要全球合作，而单边战争可能缺乏道义支撑。像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机制，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能遏制单边、霸权和恐怖主义？

过去以来，很多事例表明，联合国安理会不管在遏制单边行动、还是在解决安全问题上，都没有太多作为。事实上，安理会和联合国的作用，并不能只是简单地制止人们使用武力。对遏制武力和推动全球合作这两方面而言，联合国的表现非常软弱，在安理会中要达成共识非常难。

如果联合国难以发挥作用，而目前我们又没有其他机制来反对恐怖主义，那么，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最终根除恐怖主义呢？

很可能的情形就是：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根除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弱者使用的武器，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他们只能诉诸恐怖主义，来逼迫反对力量改变。只要存在力量不对等，恐怖主义就会永远被人使用。这种普遍性的问题会一直存在。但是，具体到那种极度激进的屠杀式恐怖主义，那种建立在错误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了，我认为它会终结，20年后，可能很少有人再想到这种恐怖主义了。

共性问题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却不会创造出全球合作本身

“9·11”事件后，人们讨论更多的，是一度沉寂的“文明冲突论”，不少人认为您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似乎站不住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您认为“文明冲突论”合理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同亨廷顿有过许多辩论，《文明冲突论》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行为。虽然现代化带来了很大的变

革,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他们不同的文明形态。这就有个疑问,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长的时间,影响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或者说,现代化最终能否促成人们在文化上趋同?举例来说,以前沙特政府为了维护伊斯兰习俗,曾从南亚雇用了50万海外劳动力为女性开车,但是现在,沙特女性也要求和男性享有同等权利。这充分说明,不同文化经过现代化洗礼后,在应对某一问题时会有共同的解决方案。据我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现代化的行为上表现是类似的,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个显例。借助互联网或四处旅行,文化、文明很难再主导人们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的行为了。

有人提出,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实更加严重,如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等,这种共同的危机才真正构成了人类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共性问题是否更能够成为人类未来的主题呢?

我认为,诸如全球变暖、疾病、贫困等共性问题,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但它们并不会就此创造出全球合作本身。人们仍旧被分散在各个国家之中,需要首先满足的是本国利益,所以,很难形成全球共同体。很多时候,这些共性问题其实也正是冲突的来源,比如,在水资源问题上应当实现合作,因为河流会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些国家,人们共享着河流里的水。但这种现实在很多时候带来的却是冲突乃至战争。所以,现存的共性问题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和平的解决方案。从某种角度来说,日益上涨的商品价格意味着全球对原材料、商品、水资源等东西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这也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因素。

如果共性的问题都无法为我们带来合作与和平,那么我们还可

以指望什么呢？

我们需要很好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全球是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这就要求领导者们创建出好的机制，还要创建出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很好地处理跨边界的传染病问题，我们也有了处理气候变化的组织，尽管现在进展还不是太快。议题不同，情况也会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需要的是比现在更多的机制。

从G7、G8发展到今天的G20，这些机制究竟对全球治理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G20是对全球的权力转移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认可。权力从美国、欧洲、日本扩大到“金砖四国”，这对于增加G20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但是，G20现在还难以真正扮演过去由G7扮演的协调者角色。当然，现状并不代表未来，问题在于，从7个国家一下子增加到20个，G20甚至也可以变成G30，很多国家被包含在其中，而组织越庞大，就越难协调彼此的行动。我认为G20需要创设一个强有力的秘书处，要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在这个庞大的20国组织中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真正来协调20国的行动。一般而言，组织越庞大，成员越多，其运作的效率也就越低。

“金砖国家”崛起是过去十年国际政治的唯一重大变化

您曾经提到，“9·11”之前，许多国际危机都是由弱国或失败国家引发的，但是“9·11”的出现表明，弱治理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进一步强化了您的这一观点。如今看来，全球

是否开始找到解决弱治理的好办法了？

不幸的是十年后，我们的工具并没有比过去更好。针对依然存在的索马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国际社会也曾经试图努力去做一些改善，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就人道主义危机而言，海地去年经历了大地震，国际社会就介入其中，抢救出大量人员，搭建了临时救护设施，为灾民分发食物。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真正建立起稳固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也就是让这些国家真正成长起来、未来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很多成功。部分原因在于，要在失败的国家建立起良好的治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我写作新书的原因所在。

从目前情势看，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掌握的资源 and 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些国家的治理能力。这对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构建来说是否是一个坏消息？

情况非常复杂，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弱政府的当权者由于国际组织的出现，其权力被日益削弱了。另一方面，这些政府本身非常弱，不能为本国人民提供诸如医疗、教育之类的基本服务，所以，国际组织在这些弱政府失效的地方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只能够在特定领域帮上一些忙，难以使这些弱国真正强大起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总比没有人做任何事要好些。

您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政治问责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对于现代国家政府具有决定性意义。目前中东国家出现的变化是这种政治问责缺乏导致的吗？南欧“笨猪四国”出现的国家

溃败又是怎么回事呢？

所有中东国家的独裁者都缺乏这种政治问责。萨达姆在那里执政40年，穆巴拉克执政有30年，没有办法让他们下台。至于南欧的问题却非常不同，希腊的危机源于非常差劲的经济政策，加入欧元区以后，他们一直都在增加消费和支出，却没有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在您看来，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秩序究竟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中，唯一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全世界崛起，开始占据主要位置，从而动摇了美国、德国在柏林墙倒塌以后20年间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使世界转向更加多极化。全球体系的权力被分配给更多数量的国家了，这是过去十年最大的故事。同时，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慢，而“金砖国家”的增长非常快。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前，这种权力转移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能否给世界历史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不同模式的国家，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有非常能干的政府，的确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方式。我反复强调，长期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不同模式的可持续性。从短期来看，中国的模式的确做得非常成功，相反，美国政治出现了很多问题，让我们无力去解决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吉迪恩·拉赫曼

有一种全球情绪叫“愤怒”？

采访 | 杨逸淇



吉迪恩·拉赫曼

Gideon Rachman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主要负责撰写美国外交政策、欧盟事务和全球化等方面的报道。拉赫曼长期浸淫在新闻界。在1990年到2005年间，他历任《经济学人》美国版副主编、亚洲地区主编、英国地区编辑等职。作为评论人，他还活跃于电视及广播节目中。

2011年8月30日，当英国人吉迪恩·拉赫曼以“2011，全球愤怒之年”（2011, the 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为题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时，他本人也许没有想到，“愤怒之年”这个看似夸张另类、却又不失锐利的用语，会被那么多人加以引用和传播。

“愤怒从来都不会没有原因，但没有一个是好原因。”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句话乍听起来真是一句妙语，也许可以装裱起来装饰墙壁并时刻提醒自己不再愤怒。但是，愤怒真的就没有好的原因吗？当然不是。2011年的全球愤怒，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不公在全球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共识。

印度愤怒了：报纸的头版总是被腐败丑闻所占据，“在本应花到穷人身上的每10个卢比中，只有一个卢比真正到了需要它的人手中”；

智利愤怒了：“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公正的和堕落的，是一种诈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教育的商品”，民众要求改革公共教育；

美国愤怒了：华尔街占领者宣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

以色列愤怒了：全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爆发，民众要求降低住房价格、削减税收以及有更多机会获得免费教育……

全球愤怒此起彼伏。人们看到，愤怒是有对象的，愤怒是会升级的，愤怒者多，则被愤怒的对象就多。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论愤怒》一书中提出了愤怒根源于希望的论点。因此可以说，愤怒不是愤怒者的终极目的，如何制怒、从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才是愤怒者们的真实使命。

“2011，全球愤怒之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愤怒之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它隐含着对某种经济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拉赫曼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同时认为：“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应该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这种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的理性之光吧。

许多示威有相似的主题

因为您的“2011，全球愤怒之年”一文，“愤怒之年”的说法在全球广受关注。我们想问的是，难道真有一种全球情绪叫做“全球愤怒”么？

存不存在“全球情绪”这样一种东西？感觉上肯定存在。我想

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有如此众多的国家被某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所困扰。2011年正变成“全球愤怒之年”。

的确，“情绪”只是一种看法。但我认为，世界各地的示威者们相互吸取了灵感。因此，伦敦和纽约的一些“占领者”明确地将自己与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者相比较。目前，我们看到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俄罗斯杜马选举不公。“愤怒之年”年初以埃及的抗议活动发端，年终则以初现的俄罗斯示威收尾。

全球范围内的确出现了太多的抗议活动，问题在于：中东和非洲的抗议、印度的抗议，与雅典和伦敦的抗议是一回事么？

我不认为这些抗议形成了一个运动。但是在我看来，电视画面和互联网的存在，意味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运动可以相互影响。我也认为，许多示威有相似的主题——特别是对那些精英的愤怒，他们被指控腐败和不公正地垄断了经济和政治权力。

对执政精英的财富规模与腐败程度的愤怒，引发了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对于腐败现象与官员犯罪的指控，是印度公众抗议活动的主因。而对年轻人缺乏机会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不断下滑的不满，则是西班牙、希腊、以色列与智利示威活动的共同主题。

普通民众被排除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之外，是这些抗议的共性。您在写作“2011，全球愤怒之年”一文时，认为美国是个例外；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否超出了您的预料？您又怎么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全球化”？

是的，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尽管我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人们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这与发生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示威形成对比，在那里，公众的愤怒集中在被视为不民主的政治领导人身上。如果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那么，我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将继续扩散开来。

对于美国而言，以现实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正受到威胁，应该能够促进美国在从教育改革到预算赤字等各个领域采取果断行动。如果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讨论，美国的公共舆论对于迎接一个新时代就可能准备不足。其结果是，对于美国在国内外遭受的挫败，公众的反应不大可能是冷静和果断的，而更可能是愤怒和荒谬的——这将助长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代际冲突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主题

2011年的全球愤怒，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众对政治和商业精英阶层的愤怒，很多人渴望获得免费教育和医疗以及体面的劳动收入，渴望传统上的欧洲社会模式。然而，欧洲日益深重的危机似乎表明，传统的欧洲社会模式恰恰是不可持续的。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模式的？

我认为这是欧洲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要彻底摧毁对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承诺，而是要使这个系统得以现代化并使其花费便宜。这个愿景依然存在，并且可能会成为现实。

一个日益显现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保持高税收来支付医疗保健费用和老人的养老金。代际冲突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主题。

我们传统上把全球化想像为某种外交议题，它似乎常常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四面八方的民众愤怒要求东南西北的政府拿出应对办法，全球化是终极的内政议题。未来欧元区能否共渡难关仍将面临来自各国选民的挑战，这一政治风险是否会在明年集中体现出来？

新的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可能会挑战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如果全球化崩溃，则会伤害到贫困国家的工人，甚至那些富裕地方的人们也可能难以幸免，因为随着全球市场的封闭，廉价商品将会变得踪迹难觅。

有些人认为，倘若单一货币灰飞烟灭，欧盟本身也将毁于一旦。但这样的危言，有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早在单一货币问世之前，欧洲在建设共同市场、实施免签证旅游政策和加强外交政策合作等方面就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即使欧元灭亡了，这些也会继续存在。欧洲领导人不应再坚持“欧元瓦解是不可想像的”这种观点，而应开始做好相应的准备。

压低劳工收入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同全球愤怒和动荡相关。问题在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早已经是全球市场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的全球愤怒难道会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全球市场构架么？

可能会。但是关键取决于欧洲是否存在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

机。不幸的是，这个机会是相当高的。

不可否认的是，与1968年全球化程度还不高的时代相比，如今的全球情绪由于新媒体出现而传播更快，有些时候甚至被新媒体过于放大了。您怎么看待这一状况？

新媒体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1968年学生运动暴发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问世呢。因此，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的不满和存在某种形式的全球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互联网也显然比电视难以控制和审查。微博和摄像手机是新的强有力的工具。

全球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赢”

与乐观、理性的情绪相比，悲观、非理性的情绪是否更容易传染开来？知识分子们在树立和传播理性科学的情绪方面究竟有何作为？负责的政治家们又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毕竟，乐观、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更为有益。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谁来定义什么是“合理的”和“非理性的”呢？欧洲领导人认为欧洲单一货币是一个理性的和科学的观念。但是，也许他们错了也未为可知？

我的在《经济学人》的一位前同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写了一本不错的书，名字叫《理性乐观主义者》(*The Rational Optimist*)。对他而言，技术变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通讯改善、贸易增长，使得全球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生活标准日益提高，寿命更长、生活更富足。马特·里德利在书中写道，即使在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中，“在某个地方总有某个人正在修正一款软件、试验一种新材料

或者调节某个基因,这都能让你我未来的生活更轻松”。

技术的力量能够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既是对过去的一种经验观察,也是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想法。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能够像过去一样把我们从今天的问题中拯救出来,虽然他们说不清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长远来看,我认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终究会是正确的,世界会变得更富裕、更和平、更繁荣。我只是认为进步的路上会遇到一些严重的“杂音”。

您曾经写过一本书《零和世界》(*Zero-sum World*);然而,全球化真的是一种“零和博弈”么?由于技术变革和贸易增长,今天普通墨西哥人的寿命已经超过了1955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这难道不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吗?

我个人不相信全球化是一个“零和游戏”。我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赢”。全球化也有输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非熟练工人。世界各国一些生活标准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增长,的确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些变化更可能与科学的进步和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关。

社会动荡、悲观情绪占上风的时候,恰恰也应该是智慧和思想生长的时期。但是正如您2011年的另一篇著名文章所提出的,思想家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如今反而见不到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了呢?

对此问题,我无法确定。或许他们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认出他们来。你或许需要离得远一些才能对伟人进行判定。狄更斯被同代作

家视为雇佣文人而被人们所不齿；奥威尔也是在去世之后才声名鹊起的。或许，我们都花了太多时间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图书馆。现代媒体文化也可能导致知识分子过度曝光，刺激他们超额创作。如果穆勒不断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或者甘地每天发上5条Tweet——他们或许也不会成为那么深刻的思想家了。或许当今的重大突破是在科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今天知识的进步靠的是分布在全球各地协同工作的专家网络，而不是靠单个杰出学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总结出一个伟大理论。还有最后一种可能，即尽管拥有巨额财富和各种尖端设备，这一代人并不像我们自认为的那么睿智。但我认为，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应该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

【话题背景】

“阿拉伯之春”：2011年1月14日深夜，突尼斯政权被民众抗议所推翻，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飞往沙特。以此为肇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11月27日，埃及举行了选举。

10月20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被俘身亡。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叙利亚局势也处于微妙的状态。

“印度之夏”：安纳·哈扎雷，74岁，退伍老兵。着装模仿圣雄甘地。不喜欢喝酒，不看有线电视，甚至不爱吃肉。2011年4月，他进行了一次公开绝食，引起全国民众注意。为抗击腐败，他建议成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新机构，负责高效地行使司法权力。对于猖獗的腐

败问题、官样文章以及政府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的现象，印度人忍无可忍。不仅是下层民众，许多中产阶层的民众也加入了反腐败运动。

因号召绝食抗议腐败，哈扎雷于8月16日遭逮捕。由此引发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政府迫于压力将其释放。8月28日，在印度国会表决通过他对《公民监察法案》提出的三项要求后，哈扎雷结束绝食行动。这场持续近半年的反腐运动，演变成国大党数十年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占领华尔街”：2011年9月17日下午，大批愤怒的抗议者在距华尔街以北的祖科蒂公园里“安营扎寨”。10月15日“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已经蔓延到了全球1500个城市，“占领”运动达到最高潮。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但“占领”运动之火烧至全球，响应者无数，至今，这场运动仍未结束。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具体诉求和统一组织。该活动网站上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抗议活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华尔街“贪婪”、金融系统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以及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

希腊大罢工：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继续加剧，为了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一再主张削减福利体系和实施欧盟要求下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些措施对普通民众造成重大冲击，激起数次全国罢工。11月9日帕潘德里欧被迫走下总理宝座。11月11日欧洲中央银行前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出任联合政府总理，主持处理债务危机。他致信欧洲联盟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全力采取紧缩措施。数以万计希腊民众12月1日走上首都雅典街头，举行24小时罢工，抗议政府进一步紧缩财政。罢工由希腊一些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发起。这些工会会员大约有250万人，占希腊全国雇员大约半数。

戴维·梅森

“占领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的神经

采访 | 田晓玲



戴维·梅森

David Mason

美国巴特勒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13个国家（包括美国）探究对于社会公正的态度，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关于美国强大和衰落等方面的问题。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试图占领华尔街，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意图反对美国政治中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不过，最初的两个星期声势并不大，和美国其他小规模游行示威并没有多大区别。

不曾料想，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场运动迅速持续发酵，不仅席卷了美国100多个主要城市，美国以外国家的城市，包括布拉格、法兰克福、多伦多、墨尔本、东京和爱尔兰科克，也纷纷组织起了支持活动。

英国《金融时报》非常犀利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一个月前，人们还仅仅把他们看做一群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做着年轻人通常做的事情。今天，只有傻瓜才会对一场反映出全世界各行各业普通民众愤怒和失望情绪的运动视而不见。”

由加拿大非营利杂志 *Adbusters* 于 2011 年 7 月发起倡议的这场运动，此后并未出现一种像样的领导力量，参与抗议的人群尽管声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 99% 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 1% 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但其实，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标语牌五花八门，诉求内容也多种多样。再加上寒冷天气即将到来，很多人开始怀疑它的持久力。不过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对这场运动表示了好感和支持，这一点在近期各项民意调查中都有所反应。美国《时代》杂志调查显示，54% 的受访者对抗议有好感，仅有 23% 表示反对。与此类似，只有 27% 的人对茶党运动有好感。

2011 年，从阿拉伯世界的突尼斯和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再到欧洲的雅典和伦敦的骚乱，社会动荡接连不断，“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又给了 2011 年一条被称为“愤怒之年”的理由。“占领华尔街”反映了美国社会怎样的政治社会生态？和这一整年的世界风云又有何关联？美国巴特勒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一书作者戴维·梅森对此的解读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这种异常的政治氛围，以及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左右两翼都出现了，是对我们长时间深陷经济危机作出的可预测的反应。”

它抓住了在美国社会中弥漫开来的对抗不平等、公司贪婪、无节制和腐败的情绪

“占领华尔街”无疑是全球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焦点事件。这场运动究竟怎么定性？是齐泽克所担心的嘉年华，还是媒体秀？或者是一场反对金融寡头独占财富、抗议社会不公的社会运动？

“占领华尔街”的这场运动非常难以定义。它是如此无组织、分散化,且没有聚焦在一个主题上。我认为,这是一个还处于初期的社会运动,它抓住了在美国社会中弥漫开来的对抗不平等、公司贪婪、无节制和腐败的情绪。像许多社会运动一样,它的规模一开始非常小,但发展迅速,从数量、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地理范围上都是如此。运动从纽约开始,已经扩散到美国其他许多城市,甚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但是,把这些抗议者看做一股主要政治力量是不对的。平时,纽约的示威者大概1 000人左右。大多数时候,在我所在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华尔街的抗议活动甚至上不了报纸的头版。

你提到加入抗议者队伍的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其实在美国,除了非常少数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他的出现也没有被大多数美国媒体提及。

不过,我相信“占领华尔街”运动对美国而言仍旧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注意力重新聚焦到不平等问题上,这一问题在美国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它却处于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自大萧条以来的70年里,美国目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是最严重的,比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更甚。

我们注意到,有不少人拿这场运动与1968年席卷全球的运动相比。但很明显,“占领华尔街”运动缺少明确的领导力量,缺少比较明确的政治诉求,缺少时间表,也缺少可参考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会不会削弱它的现实力量?

“占领华尔街”和1968年的运动有相似之处,比如运动都主要开始于年轻人。我们还可以比较发生在埃及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1950和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的民权运动,以及1989年发生在东

欧的“天鹅绒革命”。

缺乏领导力量，缺乏运动的聚焦点和一些具体要求等，的确会削弱其潜在的影响和力量。也许这将导致它的崩溃。但上面提到的很多类似的社会运动，也基本上是缺乏领导的，起码一开始是这样。其中一些运动的要求，包括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解放广场的示威活动，都是非常散乱和笼统的。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运动，就像现在一样，触碰到了更广泛社会的神经，并最终带给整个社会显著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

参与“占领”运动的多是年轻人。一直以来，美国年轻人总被赋予“一代”的定义，“一战”后被称为“迷失一代”，“二战”后被喻为“垮掉的一代”，如今，又会否因“占领”运动被冠以“觉醒的一代”？

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主要是年轻人参与，但它现在已经普及和成长，变得更多样化。提出的问题几乎影响到每个人，口号也日渐具有普遍性：“我们是99%。”我不认为这像1968年那样主要是一代人的革命。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大概占全国的20%，并掌握了全国财富的1/3，这一数字超过了底层9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

和此前其他运动不一样，新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它们恰是以华尔街金融创新为原动力发展起来的，这是否是极大的讽刺？

作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功能，我不认为这是讽刺。的确，现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加快了，但这和现代生活的其他东西是一样的。社交媒体与电子通信使突尼斯和开罗的运动更便利，那么，同样的事情也

会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

美国的繁荣表象掩盖了这个国家以至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抗议华尔街的贪婪，是这场运动的最直接诉求之一。但是，难道不正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给美国在近20年的全球科技金融竞争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吗？

在我看来，“金融创新”对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战后令人惊叹的经济、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是建立在下列因素的基础之上，如爆炸式增长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全球贸易扩张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工具，它们的安全与稳定而不是任何金融创新，对其他因素的发展极其重要。

过去20年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我们当前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20年来，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步萎缩，金融服务业的比重稳步增加。但金融服务在本质上对经济的贡献几乎没有。金融家们主要做的是让资本流动，他们靠的是债务的不断累积。银行和贷款公司鼓励美国消费者贷款，哪怕这么做并不明智，但是那些机构可以在交易中牟利。

到2008年，突然变得很明显，经济中的这个大部门成了一个空壳。但是它太大，一些金融机构像AIG、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都大到不能倒，使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否则会带来整个经济的崩溃。

然而现在，很多机构又开始兴旺了，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又在接受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补偿金。与此同时，失业率却高达9%，美国普

通工人的实际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并不比他们20年前的收入多。这是华尔街占领者一个主要的不满。的确，这惹恼了大多数美国人。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美国金融业的呼声就一度十分高涨，奥巴马也是打着金融管制牌上台的，但他就任后为何一直难以推出其管制金融业的措施？

2010年夏天，奥巴马总统力促国会通过一项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法案包括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消除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许多不好的做法，避免让消费者继续负债累累。多德—弗兰克法案获得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两院通过。但最近的国会选举让共和党获得众议院控制权，自此之后，任何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新措施都被共和党人否决，他们反对几乎任何加强政府作用的提议。

金融体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坚实构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可能动摇这一基本构架。是不是正因此，导致全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对现实世界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

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不同意现代经济的核心就是金融体系。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工具，但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稳定和安全，让经济交易和贸易能够顺利运作。

问题是，金融服务业现在扮演独立角色，通过金钱流动生产财富，时常使用复杂、愚笨的投资工具如对冲基金和信用违约互换。许多金融机构非常沉迷于这个赚钱游戏，它们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价值是提供稳定和安全给顾客、投资人、生产者和政府。

针对这场运动,有人认为,追求效益和利润的自由主义已经主宰世界大半个世纪了,历史的时针也该摆向追求公平正义一边了。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这场运动真的能为全球带来新的社会想像吗?

的确,新自由主义主导世界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因为在这一时期,美国一直是全球的主导力量,美国证明、展示和推动了这个发展模式。不可否认,美国的模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成功。“二战”后的50年,全球财富和福利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其中很大部分是由惊人增长的美国经济、消费和美国繁荣所推动的。

但在经济增长背后,也有阴暗面,而且从1970年代开始,它变得日益明显。美国的繁荣表象掩盖了这个国家以至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过度消费导致巨额债务增长,包括政府和家庭债务。在对利润和消费品的追逐中,我们越来越忽视社会产品,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所有这些现在都处于严重的困境中。

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是时候恢复平衡了。我们应当更重视公平、正义和平等。这些一直是美国理想和美国梦的核心,但近几年却退居次席。我相信,这也是推动华尔街占领运动最主要的诉求之一。

政治的极端化、政治家不情愿妥协,也伤害了这个国家

对于这场运动,美国两党态度迥异。民主党人近期都对“占领华尔街”的动机表示理解或同情。而共和党则截然相反,称示威是“把矛头对错了目标”。如此迥异的态度会否导致这场运动被不同政治力量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

确实,“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为民主党政治家和学者接受,并遭到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甚至取笑。然而,我相信,“占领华尔街”

运动有潜力吸引不同政治战线的支持者。我有两点理由。

首先，舆论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华尔街抗议抱有好感。《时代》杂志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对抗议有好感，仅有23%表示反对。相比之下，只有27%的人对茶党运动有好感。另一项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开展的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华尔街运动，18%的人“倾向于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触及美国社会的神经，因此它有可能变成更大的运动。

其次，“占领华尔街”和茶党运动有大量共通和重叠的地方。虽然它们植根于人口中的不同类群，有不同的议程，但是两个运动都属于民粹主义，反对现有权力机构；都是反抗集中化和权力滥用，反对对普通美国人的认知忽视。虽然，很多茶党人士对在华尔街抗议的“嬉皮士”心存怀疑甚至抱有敌意，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旧会同意华尔街运动参与者们的诉求，包括反对政府支持富人的政策、政府的银行救助计划以及金钱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当人们像“进步时代”一样将期待的目光转向政府，却发现政府已为根深蒂固的政客金融寡头利益共同体绑架，被日益极化的两党政治所摧残，就连奥巴马总统也发出“宁愿国家输，不愿对手赢”的哀叹。就此而言，“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成了“制度困境”下“民主的无奈”？

的确，金钱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且有害的作用。游说者和金钱利益在选举和决策中扮演了不相称的角色，损害了普通公民的利益。这是华尔街占领者的主要抱怨，也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比如茶党，所关心的话题。

政治的极端化、政治家极不情愿妥协，也伤害了这个国家，抑制想要去解决更重要问题的努力。这种异常的政治氛围，以及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左右两翼都出现了，是对我们长时间深陷经济危机做出的可预测的反应。人们的工作、家庭、生活、经济保障等都面临危险，这会导致恐惧和焦虑。正常的政治，或是政治妥协，都很难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

您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也曾说过，“美国例外论”使美国坚信贫穷与富有更大程度上同个人的缺点或成就相关，而与制度无关。这场运动，能否把人们思考的触角，引到制度这个层面？

几年前，我领导了一个更大的国际舆论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相信个人的富有或贫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才干或工作，而不是出于经济或社会制度。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人很努力工作，就会成功，任何人都可以变得富有和成功，即使是背景很差的人。

但事实上，和前一代人相比，目前美国的社会和经济流动少了很多。贫困和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是原因，也是结果。在贫困街区（尤其是在城市）的孩子经常去条件不好的学校，因此更容易接触毒品和暴力。这阻碍了他们接受良好教育，而教育是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我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就，是将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美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会开始更系统地了解不平等问题。主流新闻报刊如《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也越来越多地涉

及贫富不均的话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回应。

您的《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表达了对美国未来的极度悲观。但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科技、军事、金融依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比如，每年的全球大学排行榜表明，作为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标志之一，美国的大学依然在全球名列前茅。情况是否并没有那么悲观？

我在书中提出，几乎在每一个层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及国际上，美国都已经失去了它的领先或主导地位。我列举了一些数据证明了这种下滑。我认为，债务的爆炸性增长对美国而言是个大麻烦，国家注定会经历一个持续的和深层次的经济衰退。它将不再像“二战”后的50年那样，依然能够拥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军事和全球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富有和强大的国家正在消失。即使回到我们在1970年代的生活水准，美国仍然是这个地球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美国模式让这个国家度过了很多危机。

在我看来，这对美国意味着，它必须调整以适应一个不同的全球环境，在这个环境下，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主导，同时，美国还应当适应一个增长速度降低、开支减少、期望降低的时代。这种心理调节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也因此更加难以实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应对还不是那么好。

您应该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左翼了吧？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是多数还是少数？

我写和说的事情，特别是认为美国在许多领域不再是主导了，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吓到许多人。美国人通常乐观、骄傲、欢快。他们不喜欢听，而且经常拒绝听不那么积极的消息。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中，这种看法也慢慢传递给了一般的公众。“占领华尔街”就是其中的表现形式。

雅克·阿塔利

欧盟未来取决于利益攸关方有否共识

采访 | 田晓玲



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多任法国总统顾问。先后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巴黎政治学院以及国家行政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矿业学院工程师学位。1981年，他成为总统首席顾问，一度被称为“密特朗的手提电脑”。2007年7月，他再度成为萨科齐的总统顾问，组建法国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出任主席。他曾经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2009年度“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

“全球金融体系目前的作用是确保通过抽取巨额佣金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过度的公债创造了一个使公共和个人行动都会瘫痪的政治社会氛围。”

当雅克·阿塔利在他的《国家的破产》(State Bankruptcy)一书中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远不像今天这么严重。

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边缘国家蔓延，并对欧元区的整体经济日益构成威胁，其中，最先出现危机的希腊形势尤为严峻。

作为法国横跨政经两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密特朗和萨科齐的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对眼前的欧债危机究竟会怎么看？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这位《国家的破产》的作者的看法似乎使人大跌眼镜：“欧洲的债务问题远没有美国严重，它只是被那些英文媒体夸大了。”

乍看，阿塔利似有推卸欧洲责任之嫌，但细究之下，他是在挖掘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起源，一个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务危机竟然把全球经济拖入百年不遇的巨大困境之中，关键在于杠杆型债务经济伤害到全球；当初银行和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如今带来的却是全球政府部门更大程度的杠杆化。于是，希腊推倒了欧债“多米诺骨牌”。

解决危机之道究竟何在？这位深入研究过近代公债发展历史的政治家给出的答案也十分简单：取决于利益攸关方能否达成共识。

美国的经济问题始终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会马上破产吗？”“我们正在促使后代破产吗？”这个提问，是您在自己的《国家的破产》一书开头就提出来的。现在，我们也想问您的是：我们马上会破产吗？

这个问题一方面取决于你指的“我们”是哪些国家。事实上，包括中国、美国还有欧洲在内，都有很多债务，如果不能得到足够支持，的确可能会破产。另一方面，我说破产并不是说现在，而是说10年之内。美国的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很高，日本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0%。但是我能肯定一些国家会找到解决方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未来就能完全乐观，这个过程需要做出很多的决策。

眼前最受关注的全球经济事件，依然还是欧债危机。在您看来，危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仅仅是高福利导致的吗？

我并不同意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欧债危机。在我看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美国经济，它远比欧洲经济问题要重要得多。当然，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的确吸引了全球更多的注意力，但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说很不公平。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美国的经济问题。整个西方经济现在都出现问题了，不仅是欧洲，美国也是如此。

至于欧债危机背后的原因，我并不认为是高福利带来的。我们是有很高的福利水平，但这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欧洲有很多高福利国家，荷兰、瑞士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它们并未出现债务问题，也没有严重的失业。我们要做的是偿还债务，同时增强自身的经济体支撑更多政府预算的能力。建立起一种既是高福利、同时又没有很多债务的社会机制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看到，在欧洲，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确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背后是否有什么共性可循呢？

每个国家出现问题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西班牙的财政赤字总量其实并不是很高，但它的个人债务非常高；意大利包括法国，它们各自的公共债务都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源于它们对公共债务的技术性使用，是为了弥补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应对行为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吗？

不一样。美国的债务机制会导致全球性的危机。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因为缺乏监管的金融部门过度发展了金融衍生工具才导致的危机。其后果就是，美国不可能再提高薪水，不可能弥补工人们增长较慢的收入水平，所以，人们不得不去借贷。当美国的金融部门崩

溃以后,就会面临全面的衰退。人们可以看到的应对经济衰退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因为经济衰退才开始增加的,这一切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这让欧洲也不得不紧随其后,以避免出现更大的衰退。所以,使得欧洲陷入经济衰退的原因,并不在于欧洲自身,而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

诚如您书中所说:公共债务,控制不好是致命的危险,而控制好了,则是一种生命、激情和冒险的来源。毕竟,公共债务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那么,什么才算是好的公共债务呢?

在我看来,所谓“好”的公共债务不是用来支付政府的开支比如薪水的,而是用来投资教育、科学研究的,是用来支持公共事业发展的,长期来看还包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公共债务的好坏取决于它的用途,即人们把它用在哪儿。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其超过一半的公共债务并没有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而是用来支付政府的开支了,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可能只有不到一半属于“好”的债务。

有些国家在公共债务超过其GDP的60%的情况下就破产了,而有的公共债务超过本国GDP的200%也没有破产。公共债务的合理界限显然很难确定。您本人也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者之一,该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公共债务的合理水平一般在一国GDP的60%以下。现在这个标准依然合理么?

是的,超过60%这个警戒线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了美国,有人甚至认为也出现在了中国,有些统计数据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超

过GDP的70%了。这样看来,欧洲的情况只是和这些国家相类似,并没有多大不同。尽管60%的标准是一个合理标准,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现在处于衰退之中,所以也就很难再坚守这个标准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努力回到这个标准上来,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欧洲是一个非常大的洲,内部的贫富差异非常之大,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在人均GDP上相差6倍!

债务超过本国GDP的200%的情况只是发生在日本,这和欧洲不一样。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欧洲,因为我们更倾向于将储蓄投资在私人部门和行业,不可能都用以支付公共债务。

我认为,在衡量一国的公共债务时,也可以引入一国的“财政收入”这个概念,有的国家的公共债务已经相当于该国7年的财政收入了,这就过高了;5年可能是一个极限。

欧洲共同债券不会等到欧元区崩溃之后才推出

目前比较危急的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希腊的公共债务已经超过其GDP的140%。您怎么看希腊债务危机的可能前景?希腊最后会不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绝不会退出欧元区。退出欧元区将是一个错误,而且,欧元区设立时的协议也没有对退出作出规定,所以,退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退出欧元区对希腊而言是灾难性的,是一场噩梦,在我看来希腊不会这么做。希腊可以破产,但它不会退出欧元区。在我看来,希腊最终也不会破产,因为欧洲其他国家会来援助它,这也关涉到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

我们面临的并非人们说的欧盟将整个崩溃的风险,当然,如果我

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包括西班牙债务在内的种种问题,那么可能会带来欧盟的崩溃。我个人对欧盟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我相信欧洲会取得进步。

您通过研究认为:违约是长期以来对超额负债最常用的解决方式,并且观察到在1800—2009年之间共有250笔外债和68笔公债出现过违约。那么,这次希腊有没有可能通过违约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债务危机?

违约当然是解决债务危机的一种方式。但是,更好的解决方式是,希腊政府应当允许以市场价格购买公共债务,现在的价格比原有价值更低了,现在的公债价格差不多已经跌到了原有价值的60%。

就像我强调的,希腊自己应当做出改革,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应当伸出援手帮助它。我并不认为希腊债务危机问题是一个巨大问题,毕竟,希腊占欧盟整个GDP的份额非常小,只有2%。这就好比中国的一个小城市出现了问题,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一样。

那么,随后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危机又将会怎样发展呢?毕竟,标准普尔最近又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

如果那样发展,将会出现一个噩梦般的场景,结果是灾难性的。但是我相信,意大利和西班牙,以至于整个欧盟,都会竭尽各自所能帮助彼此走出这场危机。

法国和德国已经就欧债危机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德国国内对于政府拿钱出来援助其他国家也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那么,是否

可以认为这将是解决欧债危机问题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换句话说，欧元区的前途是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态度？

德国的意见分歧不会成为不确定因素。因为希腊债务也会给德国带来巨大影响，希腊经济一旦崩溃，会加剧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问题，可能导致所有的德国银行都陷入危机。同时，德国65%的出口销往欧洲，所以对于希腊危机，德国是一个高度的利益攸关方。

欧盟的未来取决于大家能否达成共识，当然，其中的很大部分话语权在德国和法国，光德国一个国家做不了任何事情。德国和法国如果联合倡议发行欧洲共同债券，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会乐意购买，毕竟，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本身并没有什么债务。

您很早就提出设立欧洲共同债券的构想。当下也有人看到了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的软肋，甚至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那么在您看来，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其障碍究竟在哪里？

有些人会认为欧洲共同债券存在风险，因为它增加了创造新债务的可能，也许会比美国债券更贵。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发行欧洲债券的话，整个过程将会非常严格。至于何时能发行欧洲债券？也许，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政府都破产了，甚至欧元区整个崩溃了，才会加速欧洲债券的出现。但我认为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欧洲领导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债务违约，解决过度公债还可通过更高的税收、更少的公共开支、更快的经济增长、更严重的通胀等途径来实现。但是，在

不牺牲质量和公共服务公平性的前提下,显著降低公共开支是可能的吗?

的确,这似乎不可能。但我认为,除了降低公共服务的开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们应当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

您也非常强调经济增长在解决债务方面的作用,您怎么看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四种新技术浪潮,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神经科学技术。这四种新技术浪潮都有可能创造出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

欧洲总是在危机中取得进步的

您有一个观点,认为世界上的穷人在资助着富人们的生活开支。现在,许多国家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能够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或者购买将来的欧洲公债。新兴经济体真的能够成为欧债危机的“救世主”吗?

新兴经济体不可能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救世主”,因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对外依存度更高。中国经济状况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中国经济依赖于出口,所以,在欧美的债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攸关方,让欧美国家走出危机也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

在15世纪,威尼斯的破产不会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繁荣。但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不再可能了。对于梦想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欧元

区国家而言，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人们注意到，法德已经出现“放弃欧洲梦，回归国家主权”的呼声。“欧洲梦”真的过时了吗？欧洲的未来在哪里？

欧洲总是在危机中前进的。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危机，同时也一直在向前进步。我们总是试图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您主张“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那么，您对20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何评价？

我认为G20并不很重要，也起不到什么重大的作用。相比之下，全球治理的其他机制可能更为重要，比如联合国。

全球治理的确是一个难题，我们没有在其中找到可以真正掌舵的领导人，在此情况下，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权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IMF可以在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一度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马克思似乎重新回到了欧洲。作为《卡尔·马克思，或全球化思维》一书的作者，您是如何看待这种“马克思热”的？

我希望我自己的这本书可以翻译到中国来。马克思考虑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问题，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非常卓越的分析，预见到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会孤立地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应当在全球层面出现。我希望他是对的。他还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代替资本主义。这些洞见

都非常重要。

目前，一方面有论者提出欧洲债务危机期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协同救助，另一方面，欧洲至今仍旧没有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您怎么看当下的中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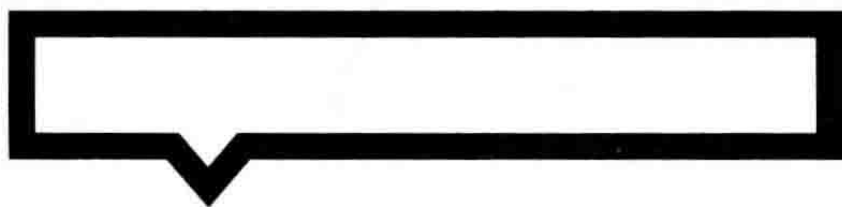
一个强大欧洲的存在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为了使中国企业能够更多地投资到欧洲，同时使欧洲的企业来中国，我们需要共同做很多的事情，一起建设一个全球世界。比如，可以设想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上建立一种全球货币。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

世界·中国

站在世界再造的起点



乌尔里希·贝克

“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

采访 | 田晓玲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1986年，贝克在其《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并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因为当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并且日益成为全球知识界的共识。贝克于2015年1月去逝。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了，对此，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做出应对？我们从日本的核危机谈开去，看看“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阐释。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的地震，不仅引发了日本东北沿海的海啸，还引发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出现放射性燃料的严重泄漏事故。除了自然意义的扩散，一种对于核辐射可能带来影响的担忧心理也随之蔓延开来。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对核泄漏事故相关进展都予以了持续报道，多国引发了对于核能发展安全和前景的广泛讨论。

显然，日本东北部的这场大地震，已经演化成一场复合型的全球风险。这让我们很快想到了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德国著名社

会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

在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当天，我们就通过电子邮件同贝克教授取得了联系，他欣然同意接受采访。三天后，我们发出了详细的采访提纲。那段时间，贝克要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以色列参加学术活动，无法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回复，但是他还是给我们邮来了他的新作“核工业主义的胜利”一文。

的确，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了。对此，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做出应对？我们从日本的核危机谈开去，看看“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教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阐释。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想法轰然倒塌了

贝克教授，最近全球最关注的事件，就是日本东北部的强烈地震和海啸。您一直在跟踪这一巨大灾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么？

当然。这场灾难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自己对此也特别关注。事实上，不关注这么一个巨大的灾难是根本不可能的。

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同时导致了核泄漏。这使我们想到了您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分类：第一类是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自然力所致；第二类是工业化社会早期的风险，如劳资纠纷、安全事件等；第三类是工业化晚期的风险，又被称为现代风险，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由此是否意味着，核泄漏比起地震和

海啸来,更值得人们加以广泛地关注?

我同意这个看法。真正理解这种分类非常重要。在前工业时代,灾难被认为是同自然本身紧密相连的,所以,人类并不需要对灾难负责。举个例子,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地震,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但当时哪怕是知识分子们也都将灾难的发生归咎于上帝。

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地同人类的决策相关。在第一现代性阶段,至少在欧洲,出现了很多机构,试图处理早期工业化中出现的意外和灾难。其特征是,即使是很糟糕的事故或灾难,从地理、时间和社会维度看,都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现在的核灾难,不管是正在发生或预期可能发生的,尽管也同人类的决策有关,但其后果不能够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了。比如25年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当时可能还未出生的很多人,现在都受到这一事故的严重影响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维度,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蕴涵。

您提到了切尔诺贝利。您觉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这次日本的核泄漏有所不同吗?

在某些程度上,两者的确有所不同。德国政客在1986年曾说过,共产主义国家的核反应堆爆炸了,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应对,而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用不着担心,因为我们有安全的原子能设施。但是对今天的日本,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日本是最先进的高科技和工业化国家,对地震和海啸也都有相应准备,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安全的想法,我必须说全错了。尤其经过这次灾难后,这些想法都轰然倒塌。人们会有更多的讨论,并带来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

也有人认为，这次核泄漏是由于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原因造成的，人们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此，您怎么看？

这样的看法完全错误。首先，就灾难概念本身来说，自然界并不存在灾难，只有变化，地震、海啸就是某种变化，只有在社会和文明中发生的变化才会变成灾难。第二，核电设施的建造选择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区域，这个决策并不是大自然做出的，而是出自政治家之手。提出风险的概念，是要对可能出现的灾难做出预期，而人类则要试图控制和处理它。日本预期到了地震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次地震的能量比预期大得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很难再区分自然和文明、技术和文化了，因为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晚期，不同类型社会风险的出现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问题在于，在今天的日本，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不同种类的风险似乎在同一时间一起发生了。对于这种复合型风险，人类应当做出怎样的应对才更合适？

我已经说过，我们很难区分出究竟是自然风险还是技术风险了，因为它们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甚至还没有把恐怖袭击的风险考虑进来，尽管现在似乎并没有针对核电设施的恐怖袭击，但是未来也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意识到，原子能的成本非常高，这些成本应该由谁来负担？我们必须对核能有新的认识。

全球范围都要重新思考核能发展的政策

您在书中谈到，核能曾经被很多人（比如法国人）看做现代性的巅峰成就。当然，德国人不会这么看。因此，在日本核泄漏发生

后,德国就出现了抗议在本国开发和大规模使用核能的行动。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到日本核泄漏,人类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一些观念吗?

是的,我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判断就是,科技如此成功,带来了灾难的可能,而预期灾难发生的人,和真正经历灾难的人,都会销蚀技术进步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基础。不仅仅在德国,这在全世界都在发生。你可以注意到德国最近的一次选举,支持核能发展的政党输掉了竞选,尽管这可能是感情用事的结果。在非常热衷发展核能的法国、英国、美国,也都出现了知识分子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中国、韩国也都有。重要的是,全球范围,都在重新思考核能发展的政策。

日本的核泄漏,是否意味着“无风险核能的神话”开始破灭了,或者“技术理性”开始终结了?

不能说技术理性终结了,应该说,“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我们曾经被告知,核能的风险非常小,但是,人们并没有考虑其可能造成的巨大风险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技术设计过程不能仅仅交给技术专家的理性。日本的这场核灾难,也同时发生在全球家庭客厅的电视里,这也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非常不同。日本的核泄漏是全球性事件,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目睹了核泄漏,每个国家和社会的观念与信心都就会随之改变。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维度。我认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应当对此做出回应。

相信技术进步和无风险核能,体现的是科学理性;对核能的风险表示担忧,是社会理性的体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使社会理性不空洞,或者使科学理性不盲目呢?

首先,我认为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资源和能源政策。工业化固然需要能源,只是我们需要新的能源政策。仅仅说我们不能遵循科学理性,并不是很好的选项。事实上,我们需要高度创新性的技术来应对我们的能源需求,而不仅仅把核能当做未来能源的基础。我们必须改变能源的生产方式,需要依靠科学理性的所有创造力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所有核事故带给我们的启示。

如今,包括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在内的各种风险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风险的全球化是否同时意味着,风险并不会因为强弱贫富贵贱而有选择地降临,而是会超越地域和国界,发生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

我同意这种看法。风险并不是选择性的。许多决策是在国家层面做出的,但是它的确会跨越边境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所以,思考新型的全球治理显得很重要。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灾难发生在人们的客厅里,人们通过看电视关注核灾难,会联想到自己国家的核电设施也可能出问题,从而产生对灾难性后果的普遍担忧。这就如同“9·11”恐怖袭击一样是个全球性事件,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事件,意识到自己和风险有所关联,进而产生担忧,形成了全球性风险的想像共同体。

您提到“9·11”事件。人们对地震、海啸之类自然灾害的担忧,同他们对“9·11”事件之类的人为灾难的担忧,其程度是否会不一样?

不同国家会有不同担忧。一般而言,美国人非常乐观,不太担忧风险,他们认为欧洲人太热衷于谈论风险了。但“9·11”之后直到

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都高度关注,而这种关注在欧洲和亚洲却相对较少。地震和海啸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的感受也不一样。在日本文化中,准备非常充分;但是这次复合型灾难,日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尤其对核灾难的应对准备不足。日本的广岛经历过原子能悲剧,日本人对此应该有更深的认知;但同时,他们对核能又非常乐观,认为眼下的灾难并没有广岛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处理不好,这次核事故的后果可能比广岛更糟。不管结果如何,我想日本都会改变自己的能源政策,无论是在科学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他们都会优先考虑核能的替代品。

您曾经说过,不同群体对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能力是不同的,灾难如果发生在弱国或者弱势群体身上,情况会更糟。这是否表明,风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风险是在全球平均分布的?

当然。在全球风险社会,诸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核灾难,这些灾难的后果在不同国家非常不同,穷国受到的伤害会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先进技术,也没有相应机制来应对灾难的后果。事实上,就应对可能发生的灾难而言,全球不平等是一个巨大挑战。

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我们学会与风险共存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复合型的全球风险,我们能够期待全球性的组织或机构来加以管理、防范和控制吗?

对于这种可能性,我是非常悲观的。我们并没有相应的机制,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灾难可能会打断现代性文明。这些灾难或者说对灾难的预期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我说的“全球时刻”。人们必

须集中智慧寻求问题的答案,从而建立起全球共同体。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来确保安全,或者至少让风险可控,我把这项任务称做全球的首要任务。要合作还是要灾难?我们需要的当然是合作,这样,技术文明才有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用G7、G20、G2来描述全球治理的状况,最近则有人用G0来描述全球治理的付诸阙如。这是否也是您悲观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不完全同意G0的说法。新的倡议正在出现。欧洲人对原子能的想法非常不一致,但是日本核事故发生后,欧洲逐渐达成了共识,认为要建立起一种“欧洲治理”。

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来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这不仅事关国家利益,而且事关全人类的利益。以往,每个国家都认为凭一己之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在全球风险社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那些问题。事实上,只是基于本国利益作出的选择最终都会失败,因为它们可能带来风险,长期而言,风险反过来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利益。对此,公众和政治决策者都必须加以严肃对待。

您怎么看时下盛行的所谓“末日论”或“诺查丹玛斯预言”?更多灾难的出现,会否加重人们的担忧?

一方面,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剧烈的,的确加重了人们对灾难的感受。比如,核电设施并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百,这意味着可能发生更多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全球所有的灾难都不通过媒体传播,其实人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灾难。媒体的确会增加我们生活在一个灾

难社会的心理压力。

人类如果始终处于应付可能灾难的准备状态，难道不会产生厌烦情绪吗？

当然是这样。我们不能总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每时每刻，灾难都在发生新的变化。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冷静下来，不要把全球的所有灾难都当做自己关心的重点，否则，日常生活就不能维系下去了。风险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没有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总是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会阻碍我们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习惯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学会同风险共存。重要的是要分清哪些风险可以承受，哪些是人类不堪重负的，哪些风险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哪些风险即使出现我们也能加以控制。

由于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对风险加以界定的权力，大众传媒、科学家等专业人员的地位极其重要。如果说风险并不是灾难，只是对灾难的预期的话，那么，我们的大众传媒和科学家又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对核能危险的担忧，公众的感觉和判断完全依赖于专家，而在很多时候，专家往往也是互相矛盾的，最终导致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是社会和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我说过，风险是对灾难的预期；灾难可能并没有发生，灾难也可能是间接的、被传播出来的，如果没有图片和报道，人们就不会知道。所以，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具有启蒙的价值，他们的使命是让风险变得可见，让人们正视风险，告诉人们应当做出怎样的正确反应。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

凯文·凯利

面对技术的包围，人类应当有所选择

采访 | 田晓玲



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在此之前，凯利还曾担任乔布斯最喜欢的杂志《全球概览》的主编和出版人。1994年，他出版了巨著《失控》，这本奇书被誉为是对现代和未来社会的“ORACLE”（神谕）之作。

30多年前的1981年8月，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个人电脑，重达11.34公斤，售价相当于今天的3500美元。尽管它昂贵、笨重而且也不怎么好用，但是，人们仍旧马上就认识到了它的价值。次年，IBM个人电脑获得了《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奖。不过，当时的人们怎么也没能想到，随后30年，这一发明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工作、娱乐、人际交往乃至生存方式。

如今，个人电脑刚刚步入而立之年，断言PC机时代终结的声音却早已经弥漫开来，其中包括它的联合发明人马克·迪恩（Mark Dean），他认定：“在重要性方面，PC机已经被手机取代。PC机的未来命运将会像曾经的打字机一样。”由此，IBM早在几年前就出售了其PC业务。2011年8月19日，惠普公司也步其后尘，宣布将PC业务剥离。PC机的短命，和科技产业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从IBM到微软，再到谷歌，以后还

会轮到苹果、Facebook, 每一个都代表了当时非常伟大的商业文明, 但是技术的更迭来得更加快, 尽管旧的技术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它很快就退出了中心的位置。

另一方面, 以PC机为基础, 互联网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 也让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著名的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出版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一书, 就反映了这种激烈的情绪: “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30年过去了, 回头来看, PC机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互联网究竟是好还是坏? 未来的技术发展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个人电脑仍旧在使用, 但已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了

30年多前的1981年8月, IBM公司推出了第一台PC机。今天回头看, 世界因为PC机的出现究竟发生了怎样出乎预料的变化?

30年来, 个人电脑带给我们最出乎预料的变化就是, 它使我们互相关联起来。个人电脑刚刚发明时, 发明者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台电脑, 让电脑为人们服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大家会通过电脑连接在一起, 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关系, 要比电脑和个人的联系重要得多。

梳理一下30年来PC机带给世界的里程碑事件, 您会作出怎样的

一个排列？

今天被我们称做 Windows 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在屏幕上观看和拖拉文件。这一发明先由苹果公司推出，后由微软接手。从仅仅是字符发展到能处理图片，这是非常巨大的事件，改变了很多事情。另一重大事件就是大家通过电话线连接在一起这件事情，一开始是通过使用 modem，然后是借助互联网。这是最最主要的里程碑事件。

电子屏也使人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免费获得彩色图像，而在此之前，彩色打印非常昂贵。另外，打印机，包括激光打印机，对电脑的使用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的激光打印机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并且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还有电子表格，个人电脑上的电子表格就是促使人们当年花钱购买个人电脑的根本原因。在电脑出现之前，做电子表格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徒手完成的，电子表格因此被称做“杀手级应用”。

您十年前就曾经说过，PC 机时代已经终结了。您说的“终结”，含义究竟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尽管我们仍旧在使用个人电脑，但是它们已经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了。对很多人而言，他们倾向于使用智能手机等，来完成从前由个人电脑处理的很多事情。但并不能因此就说 PC 机已经死了，它只是处在消亡的过程中，被其他东西替代了，正如同我们现在仍旧可以骑马，但马已经不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样。

那么，这种趋势是普遍的，还是说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不同的国家,情况肯定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人们不使用个人电脑,而是使用手机。但是大体上而言,每个地方都在转向使用可便携和可移动的机器,而远离个人电脑,至少他们会使用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所以,移动性成了核心—你不需要坐在桌子旁边,而是可以随身携带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到处走动。

网络能提高人们的效率,更能消磨人们的时间

与PC机相比,互联网的出现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变化更巨大。现在,人类是否进入到一个离开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下去的时代了?

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依赖网络了,未来,我们也很难想像人们可以长时间地远离网络。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很难远离电而生活下去那样,如果突然停电,我们会不知所措。这也类似于我们现在得依赖于衣服那样,我们出门都会穿着衣服,否则赤裸身体会使自己难堪。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离开了网络,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了。

我们知道,尽管您对网络的发展洞察非凡,但在现实生活中,您却有意识地同科技保持一定距离:很少使用智能手机,也很少使用笔记本电脑。您的个人经历是否意味着:独立于互联网之外,人们照样可以不落伍地生活下去?

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技术包围着。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有所选择。的确,很多高科技产品都很有用,但是,我们不需要使用所有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不使用Twitter,不使用智能手机,但会使用互联网,我还有一个漂亮的数码相机。我认为,人们未来会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样的选择,因为新的技术总是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使用所有的

技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那么，被技术包围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问题在于，你使用的技术可能并不适合你。每个人的天生禀赋都不一样，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技术，以适应我们独特的才能。只是随大流地使用他人都在使用的技术，就会找不到自己的独特位置。通过选择技术，我们才会找到一些工具，最好地帮助我们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天赋。

的确，互联网在向我们提供信息盛宴的同时，也把我们带到彻底的精力分散状态，“碎片化”使我们无法再“深刻”下去。有人因此认为：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似乎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悖论？

互联网的确会非常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又会让我们更有生产力。提高我们的效率，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但是这不会改变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未来一百年，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上网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与网络能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相比，网络还会消磨时间，让我们低效，让我们分散注意力，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

消磨时间、降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是负面的效应。事实上，效率对机器人才有意义，唯一需要效率至上的就是机器人。而人类应当允许自己犯错误，去不断探索。探索本身并不总是那么有效率的，因为探索就意味着实验，意味着可能犯错、可能失败。科学本身就不是高效的，它充满了错误和失败。探索才是我们人类擅长的工作，让机器人高效去吧。

通过改变媒介,我们实际上也在改变自己

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您非常超前地预测到了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网络社区等等新鲜事物。您的这本“预言式”的书如今翻译到中国来了。您会不会写一本新的技术预言的书?

我的书 *What Technology Wants* (《科技想要什么》) 已经翻译成中文。书中,我讨论了未来一千年可能的技术趋势。我认为,我们拥有的一切未来都会更加定制化,比如GPS,可能会出现飞机专用GPS以及跑步专用GPS。另一趋势就是技术更加复杂化;每个人都希望技术能够更简单,但这一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技术总在不断复杂化。界面也许会更简单,但内部却会更复杂,就像iPhone那样。所以,未来的技术会更加复杂、定制化和多元。

这种技术的复杂化会不会对穷人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设置门槛,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分化,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局面?

当新技术来临时,旧有的技术并不会就此消失,它们依然还在你周围。现在,诸多非常古老的技术依然在为人们所使用,诸如木头、金属、纺织品等,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那些想使用旧技术的人们还可以继续使用它们。

我不认为技术会分化社会。技术不关涉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关乎先拥有还是后拥有的问题。一开始,总是富人们为新技术花费金钱,技术很昂贵,本身运行也并不好。一段时间后,它会越来越便宜,可以为越来越多有钱人购买。等到它真正便宜,运行也非常良好之后,穷人就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到。所以,技术应用的基本模式就

是：富人提供资金资助技术进步，推动其价格能被穷人承受，穷人只是稍晚一点使用技术而已。

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关闭了，但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或是技术落伍，而是因为窃听丑闻。这种倒闭方式，在您预料之中么？

我不认为默多克对报纸、杂志有很大影响。过去十来年，有更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威胁报纸和杂志的生存。报界真正担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的年轻人很少通过纸质媒体去了解新闻，也很少看书。这才是真正的威胁。

在互联网日益影响深远的当下，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传统纸质媒体应该同新媒体、网络传输手段相结合。您认为传统媒体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些真正的威胁？

就我所知，很多传统、官方、受人尊敬的报纸，最有可能的就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这样的出版物，会继续生存下去。做那些伦理的、长篇的调查报道，核对事实，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人们会付钱去购买这些新闻，因为这些新闻才是有价值的。当然，仍旧会有很多微博和博客，人们也会做其他各种报道，90%的报道可能会通过这些方式来做，尽管如此，仍旧会有10%的报道是专业性的。最后能生存下来的报社一直都会有生意可做，这样的报社可能不太多，但每个国家都会有几个，他们专做那些困难而专业的报道。

麦克卢汉曾说，就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而言，媒体传播的内容远远不如传媒本身重要。在这样一个以技术为中心的时代，内容是不是永远只能是一个配角？

麦克卢汉刚过了百岁诞辰,他的观点同今天的相关度依然非常高。当你写微博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媒介可以让你即时传播,到达非常广泛的人群,语言简短,流动性非常高。这些特征都比你说的内容重要得多。媒体的形式如今仍然在不断成长之中,一切都在屏幕上,而不是在纸上。至少在美国和欧洲,人们不再生活在书本之中了,而是生活在屏幕之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同书本时代大异其趣。人们对事实、批判性思维和时间都有了非常不同的感觉,这些都是媒介塑造的。

通过改变媒介,我们实际上也在改变自己。一百年前,人们是由书籍这种印刷媒介塑造的。书的“作者”(author)就是“权威”(authority)一词的词根,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作者那里得到权威的,没有作者,权威就会降低,这就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或文明,这种文化或文明中存在很多权威。现在,书籍和作者都少了,权威自然也少了。

任何强有力的技术都会被强有力地滥用

社交媒体如新浪微博,今天在中国也非常流行,用户将近2亿。每条微博只能使用140个中文字来表达思想,很可能导致人们思维的粗浅化或浅薄化。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判断?

中国的很多诗歌都很棒,但用字都很少。所以,我不认为字数少会导致浅薄。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都可以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表达。

微博带来很多正面作用。你能亲眼看到很多事情,很多业余的人在做真实、即时的报道。但同时,负面效应则是有人可能会利用虚拟空间聚众滋事,可能会出现网络审判,甚至有专门的“快闪

族”^{*}。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技术本身。我认为，任何强有力的技术都会被强有力地滥用，换言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滥用，说明这种技术本身还不够强大。

在伦敦骚乱中，社交网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相卡梅伦一度表示，在需要的时候可能会关闭社交媒体。您怎么看虚拟空间的公共治理？

是的，我们的确能够在政府专断的时候关闭社交媒体。但将来，我们会有一个点对点互联的社交媒体，就像文件共享一样，就很难关闭了。同时，关闭它就像关闭电话系统一样，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合法沟通的成本也变得非常高。

您一直倡导技术的正面作用。技术的负面作用是否就是人们在享受其好处的同时应该付出的代价？能随技术进步消除吗？

我并不认为技术的负面影响最终会得以消除。我不是乌托邦空想主义者，不会认定未来的技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对科学的看法是：新技术总是伴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有多少问题出现，就会有多少种解决方案。只要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多那么一点点，哪怕1%，就是一种进步。这很少的一点点正是我们需要的，经年累月，这1%就会累积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

您曾经以“美瞳”隐形眼镜或心脏起搏器来举例说，“人造物”

^{*} flashmob，就是一群素昧平生的人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事先约定活动主题、时间、地点，然后一起做出夸张举动，这种活动的过程通常短得令旁人来不及反应——编者注，下同

和技术已经融入生命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就此预言人类将越来越依赖于机器,技术将日益智能化。人类真会走向以智能互联网为一统天下的时代么?

我相信,智能互联网不仅仅是机器,也是人工智能,它能把60亿人都联接在一起,这60亿人的思想,他们点击谷歌、投票、提问之类的活动,将会是智能互联网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所以,人工智能与人类集体智慧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但是,技术的智能化和无限制扩展,会不会把人类拖进一定的道德困境?比如,报道称过去三年,英国科学家已秘密制造155个同时包含人类与动物基因的人兽杂交胚胎。不受道德约束的技术发展会不会摧毁人类本身?

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什么是正确的和公平的,这些问题对技术而言始终非常重要。现在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尤其是在卫生领域,人们非常害怕,比如克隆技术。事实上,人类自身也总是在不断“克隆”自己,比如双胞胎就是,我们并不会对此感到不安。而科学家一说到克隆,大家就会觉得它是邪恶的。很多看上去不道德的事,通过不断学习,就可以为我们认可,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该怎么做来确保公平。很多新技术涉及道德问题,但是,我们有能力给出很好的解答,尽管答案有时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努力使技术更加道德,让尽可能多的人从新的技术中受益,让尽可能少的人因此而受害。这是道德的内涵,也是我们要致力做的事情。

戴维·罗森布鲁姆

公共部门需要更高的道德伦理素养

采访 | 田晓玲



戴维·罗森布鲁姆

David H. Rosenbloom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美国国家行政科学研究院院士。他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约翰·高斯奖和公共行政学会德怀特·瓦尔多奖，并担任过美国行政学会主席、美国《行政学评论》主编以及克林顿总统的人事顾问。强调从法律、政治和管理三个维度来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使罗森布鲁姆在公共管理学界广为人知。

当下，很多人都在谈论社会管理创新，但对“社会”究竟在哪里却语焉不详；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在发展，但在“公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却歧见迭出。

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出版了《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敏锐地指出，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变得越来越自我和孤僻，独自去打保龄球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美国社区力量的衰弱和总体社会资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市场力量膨胀，甚至到了控制政府的地步。

此后10来年，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媒体的迅速兴起，全球经济出现的大衰退，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公共”与“社会”的认知。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命题。

就公共行政学而言，自威尔逊提出建立这门

独立的学科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1930年代,人们唯一强调的是公共管理概念,认为公共行政可以同政治分开,尽管在实际上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公共行政学发展出了多姿多彩的各类门派;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开创的“多元行政观”,就是其中之一。罗森布鲁姆认为,公共行政既是管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他强调,“仅仅把公共行政当做公共管理,的确可以把理论简单化,但是在现实中,公共行政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多种价值出现冲突的时候,最大化所有的价值。”

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方式

您是公共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在您看来,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公共”究竟在哪里?

“公共”在哪里,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取决于不同社会、政治体系如何界定公共和私人领域。直到现在,美国的公共部门相对欧洲和中国而言都非常小;至于其他国家,公共部门也有大有小。在公共管理领域,之所以要界定公共部门的范围,首先是出于市场失灵的考虑。你需要协调社会事务,必须保证人们有足够的衣、食、住等安全保障。问题在于如何提供这些东西?是通过市场,由私人部门来提供,还是由公共部门来做?在很多国家,向公众提供物品和服务的渠道首先是市场,当市场出现失灵,比如市场不能解决污染问题、垄断问题,等等,这个时候,政府才介入其中,以解决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

谈到“公共”这一话题，曾经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说，今天，美国人不再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活动了，而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您同意他的这个描述么？

我明白普特南的意思。我们失去了很多社会互动，丢失了很多社会资本。“独自打保龄球”只是一个比喻；他的意思是，过去我们常常是团队、集体一起出去活动，现在却不是了。

普特南写作这本书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作者非常及时地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与此同时，社会变化也非常快。一是类似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出现了爆炸式发展。不能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变得更“独”了，他们只是在同陌生人进行交流而已。今天，美国人之间的互动仍旧非常多，只不过不再借助过去的方式，比如在俱乐部或者是运动队里。我的看法是，人们的确有时候变“孤独”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通过社交媒体互相沟通。

与过去相比，人们对公共生活似乎不再那么感兴趣了，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这是因为人们更忙于去赚钱和积累财富了吗？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人们的确更忙于去聚集财富了，尽管并不怎么成功；尤其当经济处于下滑过程中，财富更难聚集。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是，人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也花费很多时间用于上下班交通，并没有很多休闲时光。人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赚钱以支付账单。

这类现象是特例，还是普遍性的？

很难说清。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人们都倾向于长时间工作；而在南美和欧洲部分国家，人们似乎有很多的休闲时间。当经济危机冲击希腊时，德国人会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希腊人几乎不工作，他们30岁才开始工作，50岁就退休了。由此看来，人们的工作强度在每个国家也各不相同。

但是在有些国家，人们仍旧有闲暇时间，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这些闲暇时间花费在政治讨论上。人们只是上下班，然后回家睡觉。

当代人除了工作压力大，在网络上花时间也不少。究竟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可以使人们摆脱工作压力，并且从对网络的沉迷中走出来，花更多时间到社区和社团中去，与邻里朋友作更多的交流？

我曾经听过一个电台节目，说有人写了一本讨论网迷的书，倡导人们要有一段时间不上网，不用Facebook，不收邮件。问题在于，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工作，有人发邮件给你，需要立刻回复。除了坐在电脑前之外，生活似乎没有其他内容了。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些界限。问题在于如何设定这些界限。有宗教人士就规定，在一周的某些时间不用任何电子设备。但这也只能解决一天的问题。

政府在社会转型期应当有所作为缓解冲突

公共生活的衰落，加上越来越多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对公共生活的破坏与冲击，全球的公共管理对这些新情境是否有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的情境,全球公共管理可能已经作出了某些调整,比如更多地依靠非盈利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所谓的市民社会。公共生活的衰落,问题可能不在全球管理上,而在政治方面。人们不大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了,在民主国家,就形成了一种“弱民主”的状况,公众的参与非常有限。这意味着有组织的团体或利益集团会起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它们的话语权比过去更大。大多数人并没有站出来,因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

全球化对地方政府的管辖权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有时会让渡一部分利益给跨地区的组织和跨国企业。问题在于,我们又该如何规范跨地区组织或跨国企业的权限呢?

设定权限非常难。之所以有这些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方案。我们往往有一个概念:主要的政府活动应该由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能让渡给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或跨国机构,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些主要的政府活动,并依据各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来确定我们的界限在哪里。

比如,跨国机构对食品安全、煤矿安全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而这些工作其实恰恰是相关政府机构的核心任务。政府机构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建议,但是不能任由跨国机构来制定规则;制定规则应该是各级政府自己的事。

进入21世纪,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接踵而至,频频发生,是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很多时候不得不疲于奔命跟着问题跑,从而做出短期行为,最终使得公共政策呈现碎片化趋势?

好些国家都正面临着公共政策制定上的这种问题,加上政治因素、选举活动,等等,这些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常常以短期为导向。人们需要立竿见影的东西,而那些长期才可能见效的政策或措施往往被推迟实施。美国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那里,基础设施建设被忽视了,另外,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大家都知道肯定要改革,但没有人希望现在就改,因为改革的政治成本非常高。

由于机构设置问题,一些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很难在不同部门之间协调,比如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就涉及卫生、工商、质检等许多部门。仅仅依靠部门的重新设置(比如中国的大部制)是否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政策执行难以协调、政策碎片化之类的公共管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在于,官僚体系和专业知识之间本身就存在冲突,因为技术专家分布在不同的小部门里,决策部门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只能寄希望于对不同的专业技术加以协调,这样做的难度很大。当然,可以把所有小部门集中到一个大部门里去,但这种做法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会产生其他新问题,比如大部门的内部管理,就是棘手的问题。我们对问题总是能够作出非常好的诊断,非常了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但是,我们却又总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每个部门都倾向于认为自己部门的事情是重要的、具有优先性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应当如何应对才是?

我们应当关心那些没有被包含在多数人群里的少数人群。为了多数人群的利益,少数人群的利益可能会被牺牲掉。根据我的理解,

中国非常强调经济增长，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和谐社会必须把西部包括在内。必须对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这两种价值作出衡量；所有投资固然可以投放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区域，但另一方面，必须考虑让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生活的实际：我们总是面临不同价值的相互竞争，我们必须在其中求得平衡。人们通常认为：资源毕竟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做A或者B。但是，这种想法恰恰是错的；正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必须面对那么多重要的价值，考虑如何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通常扮演的是利益协调者的角色。面对多发的社会冲突，公共管理又能起到怎样的特殊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经济增长、冲突频发的时期，政府和公共管理应当创设一些项目来缓解冲突和压力。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有些工种非常危险，人们做了三个月就死去了。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如何为工人提供营养和住宿、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如果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完全应该有所作为，介入社会提供一些设施，从而在转型期缓解社会冲突。

经济理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总是处于第一位

绩效管理是和现代公共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它曾被不少人理解为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评价机制，政府官员纷纷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存在吗？

其他国家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在美国，各个层面的政府几乎都不会参与到为GDP作贡献的事务中去，我们基本上不用GDP衡量

公共管理的绩效。我们看重的是能够在约束条件下高效地提供服务。当然,专注于GDP增长的国家可能会用GDP作为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这也可以理解。美国公共管理比较强调团队建设。我们也希望个人能够服从官僚体系,政府机构中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团队的一部分,而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成为最出挑的。

您非常强调非基于使命的价值,比如信息自由、运作透明,等等,这些价值是否可以测量?如果不能,我们又如何来加以评价?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找到衡量这些价值的标准,当然我们在此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并不是说建立了标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我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学术界,我们必须重视年轻教师,关注他们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之前的10年那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专注于写一本书的知识贡献要超过五篇核心期刊文章。但是,很多人往往不这么做,因为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大学教师理应对知识积累作出更大的贡献,但评价体系的压力却使他们不得不做一些没什么创造性的小事情,写一些小文章。所以,我们对评价体系必须非常小心。有些难以衡量与评价的东西可以找一些专家作评估。

我们再来看对政府和官员的约束问题。一般认为,规范政府行为、约束官员行为要靠制度;但在制度之外,其他约束力量,比如道德,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您怎么看这类问题?

道德和伦理应该在政府公共管理中起更大作用,我们希望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有更高的道德和伦理素养,不希望他们腐败或滥用权力。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借助

职业教育,应该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开设伦理课。当然,借助机制来预防腐败也同样重要;腐败的重大危害在于它是可传染的,如果其他人都腐败的话,你很可能也会同流合污。

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人们认为公共部门是僵化、保守、浪费的。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试图用市场化的原则来改造政府。30年下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算成功么?

我不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完全取得了成功,但是这场运动的确让我们认识到,需要提高效率,关注效益,在分配资源时对公众和消费者负责。这场运动改变了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真正的服务,关注更快、更有效的服务。除了效益以外,这场运动没有给公共管理的其他价值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诸如透明、问责制之类的价值取向不仅适用于金融交易,也适用于政策制定,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似乎并没有带来这些影响。

目前,全球经济衰退趋势没有明显减缓,不少国家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庞大的公共债务会不会彻底改变全球公共管理的原有路径?

我看会,尤其在美国,严重的公共债务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人们会意识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公共部门必须更加讲求效益,甚至要缩减公共开支。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这些问题,毕竟,过去我们曾经依赖的资源未来几十年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但公共行政则需要确保社会的公平正

义。在公共管理中全面引入市场机制,会不会导致政府放弃自己的部分社会职能?

逻辑上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从政治上看,我不太确定。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形。我的意思是,在美国,从逻辑上看,政府应该收缩,市场应该更大,但是,奥巴马却并不这么看,他想扩展政府。所以,从政治现实和逻辑两方面来衡量,情形也会很不一样。

在很多时候,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分析结果也不一样。当一国处于经济危机或财政危机时,经济理性就会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想说的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难道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吗?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价值。今天,人们几乎普遍地把经济增长、消费增长当做唯一的衡量标准,但是,500年以后的人们回头来看的话,会认为我们这些人可能都错了。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更加关注社会满意度,而不仅仅只是埋首工作。一部叫做《蚂蚁》的电影就很好地描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我们总是不停地工作,经济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价值则处在第二位。同过去相比,我们的生活是否有了改善?就消费而言,的确是这样;但是,就人类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我们的生活很难说就一定有所改善了。

达龙·阿西莫格鲁

“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采访 | 杨逸淇



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早在2005年他就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向“FT中文网2012年度荐书”榜单推荐他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时写道：该书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各国走向繁荣和导致失败的制度原因，切中我们当下问题的关键。

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信中就说过：“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近200年后的今天，这一研究依然热度不减。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推出新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结果一纸风行，很快登上畅销书榜单。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困境”，这恐怕正是阿西莫格鲁这本书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有两个关键词：“包容性”制度和“萃取性”制度。简而言之，“包容性”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

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相反，“萃取性”制度则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资源，把它们集中到少数政治精英身上。在他看来，不同的制度制造了富国和穷国的差别。

在阿西莫格鲁眼中，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包容性”制度发展得最好的，而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正在损害其制度的“包容性”。他认为，中国的“赶超型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但他同时指出，经济增长本身可能会改变社会，这在历史上不乏成功实例。中国只有继续改革，鼓励“创造性破坏”，才能实现持续性增长。

尽管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乃一家之言，但他在书中所描绘的一些情况在现实世界并不鲜见，诸如：富人移民，国家财富外流；一些人热衷于靠裙带关系发财……这也正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忧虑之所在。

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真正进入世界富国之列，面临诸多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全球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致富马拉松赛”，对于我们探索发展道路相信不无裨益。

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

您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只有那些拥有“适宜的经济制度”的国家才能够避免贫困。我们如何理解所谓“适宜的经济制度”？瑞士的经济制度对埃及是否“适宜”，或者说，新加坡的经济制度对中国是否适宜呢？

事实上，我们不大这样说。我们不大使用“适宜的”这个词。我们更多使用的术语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一书的主要论点是，具有“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更容易摆脱贫困。“包容性”经济制度本身无所谓“适宜”或“不适宜”。在经济上，“适宜”于瑞典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可能“适宜”于埃及和中国。问题是，在政治上达到这样的“包容性”制度是不容易的，通向这种制度的路径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一种在瑞典取得成功的制度可能在埃及和中国并不有效。

自从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答为何一些国家如此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贫困。许多人将之归因于国家的地理位置。比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就指出：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那只是一个伪命题。诚然，就今天的情况看，温带地区的国家比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富裕。但是我们要明白，解开这个谜团不仅仅涉及地理因素，而且与历史上出现的殖民主义及其演变有关。早期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世界，而且它带来的制度变革也间接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热带地区国家和温带地区国家采取的是不同的制度，他们对非洲并没有长远打算，只是想捞到黄金或象牙一走了之，因此采取的是“萃取性”制度。比较肯尼亚、牙买加或秘鲁的殖民化与美国的殖民化，就会发现，制度才是肯尼亚、牙买加或秘鲁之所以比美国穷得多的主要原因。

那些“地理决定论者”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历史，也没有发现到新的证据。如果今天有一些地方由于地理因素导致了贫困，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维度上来考察地理位置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事实恐怕会让“地理决定论者”大跌眼镜的。看看那些被欧洲殖民过的地方：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印度次大陆，它们曾经也非常富裕，那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比北美或澳大利亚先进得多。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就会发现，1500年前相对较为富裕的国家今天恰好成了相对较穷的国家。

同样的地理位置，古今贫富程度却不同，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于是，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地理因素其实是次要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若国家发展出“包容性”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国家便会兴盛。若制度是“萃取性”的，权力与机会都只会集中于很少一部分人身上，那么国家便会衰落。墨西哥、秘鲁和印度今天之所以贫穷，根源在于它们在被殖民过程中被植入了“萃取性”制度。

在你们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包容性”以及“萃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是两个关键因素。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单阐述一下这两个概念？

“包容性”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近似相等的机会）竞争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如保障财产权，鼓励对新技术的投资，这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相反，“萃取性”制度则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资源，把它们集中到少数政治精英身上。这种制度不保障大众的财产权利，也不鼓励创新，因为提供这样的权利不符合精英的利益。

“包容性”制度与“萃取性”制度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包容性”政治制度平等地分配政治权力，从而确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生存。在“包

容性”政治制度中，政治权力通过多样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分配，只是为了建立法治和秩序作为保障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集权。“萃取性”政治制度则将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专为精英利益服务的制度。

当国家建立起“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就会释放每个公民进行创新、投资和发展的一切潜能，给予他们以力量，保护他们，国家便会兴盛。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它们被“萃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所统治，它破坏激励机制，阻碍创新，通过建立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剥夺民众的机会来削弱民众的才智。

对比一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差别，就可以看出，所有问题都在制度上。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包容性”制度值得借鉴

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显然，在历史解释中，任何简单化的“函数关系”都会有失公正。因此，一个对繁荣和贫困进行解释的理论还应该把文化纳入阐释框架之中。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指出：欧洲正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才建立起现代世界的。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如果一定要我从下述两种解释中做一个取舍：一种是极为简单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网罗了比如说25种重要因素，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对我们的认识来说，将事情搞得过于复杂和琐细是无益的。当然，世界是复杂的。但除非你关注最重要

的因素,将其从其他因素中提炼出来,否则,对你理解复杂的事物毫无帮助。在寻找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时,如果你要关注最重要的因素,你应该研究制度:探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的作用,并追溯制度的形成过程,解释它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理论的核心就是揭示“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一种理论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它能够使我们聚焦于事物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时需要从许多有趣的细节中提炼总结出来。因此,一种好的理论不是去如实地再现细节,而是为一系列进程提供一种有帮助的、有充足证据的经验主义解释,同时,阐明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

如今,专事研究发展的专家们已经把成功的现代化称为“到达丹麦”。在法国左派的眼中,他们的梦想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主义”;而美国的保守力量则担心奥巴马把美国带向“瑞典现代化模式”。您是如何评价北欧新模式的?

北欧制度如今获得了许多好评。无论是从经济竞争力,还是从社会安全保障,抑或是从生活的幸福程度来说,北欧四国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避免了南欧的“经济硬化症”和美国的极端不平等。但归根结底,北欧制度与英国或美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尽管美国的制度今天正面临着根本性危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制度相比,北欧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其“包容性”体制。至今为止,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其赋予公民最广泛的普选权和相对应的平等社会,可以被称为“包容性”制度发展得最好的。比较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亚洲的不少国家依然

缺少这样的制度。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您所说的“制度”究竟是有待于内生出来呢，还是需要从外面植入？

制度如何能从外面植入呢？你可以那样试，但你永远不会成功。它们是规则和社会组织。除非这个社会的人民服从它们、维护它们，否则，它们就会枯萎。

从彭慕兰的《大分流》到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中心）—东方（外围）的单元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历史本来就是按照多中心和多元的路径向前发展的。对于这些观点，您究竟怎么看？

我认为人们对制度的思考无关乎西方与东方的中心之争。当西方采取“萃取性”制度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经济活动和知识的传播被抑制，因此，它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当它改变了“萃取性”制度后，经济就开始增长。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也是如此。

有论者指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傲慢受到重创，于是，“西方究竟能够主宰世界多久”的问题在当下应该拿出来好好讨论了。您觉得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么？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担心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也在损害美国制度的包容性。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这种经济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大，就会转化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如果一个人写一张银行支票就能为整个选战提供资助，那么，选举出来的官员怎

么会具有倾听不同声音的包容性？

在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曾占世界的差不多三分之一，不过，当时清朝的制度很难说是一个开放和法治的体系。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解释历史上的这些现象？

在1820年的时候，工业革命甚至还没有开始。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当时的人均收入都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那是因为人口多）。中国的荣耀年代自那时起已经开始没落。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在15世纪中国的技术先进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世界任何国家？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它犹如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制度的组合，即在于当时实行的一些法律和制度，以及一些经济激励手段。由于重农抑商的传统，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在产业中得到推广应用，商业活动受到了抑制。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进创新

您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多次分析了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缺少可持续性。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强调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能长期保证可持续增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萃取性”制度不会带来增长，历史上不乏“萃取性”制度取得成功的实例。17和18世纪的种植园经济让加勒比国家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与70年代之间苏联也经历过高速的经济增长。

关于“萃取性”经济增长，有一点十分清楚：它不能产生广泛的

技术变革和创新,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已经部分改革了其经济制度。得益于经济改革,中国的农业首先获得了井喷式增长,此后,“中国式增长”的故事不断重演。但是,这种情况缺乏可持续性。一旦中国进入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的时候,中国基于进口外国技术、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的“赶超型增长”之路就会走到头。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现存技术和大规模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有不少限制。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根据你们的研究,如果说中国经济缺少“创造性破坏”,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向基于“创造性破坏”的经济过渡?

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创造性破坏”就是经济领域的新陈代谢,同时动摇既有的权力关系。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进创新,这一点在中国现有条件下难以实现。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起“包容性”制度。这是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唯一途径。

老实说,建立“包容性”制度并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当然,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有助于“包容性”制度的成长繁荣的。其中包括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它可以防止社会猝然陷入无序状态;一个已经有一些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这便于形成广泛的联盟;市民社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媒体。在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

及19世纪英国政治进程中，媒体曾经激励人民担负重要的角色。今天，诸如微博、聊天室、Facebook等新媒体也能够起到相同的作用。

其实，正像您强调“动态性的政治变化”一样，中国不断地进行改革，恰是这种动态性的一部分。您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还有怎样的建议？

我的回答依然是建立起“包容性”的制度。历史的教训是，如果解决不好政治问题，就解决不好经济问题。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力量给政治体系带来足够的改革动力。

现在不少西方人对中国能否转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表示怀疑，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原因：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鼓励提高生产力和发展贸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验与那些尝试从“萃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杰里米·里夫金

通讯和能源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

采访 | 田晓玲



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著名趋势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长期关注科技进步对经济、劳动力、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代表作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这一洞见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封面文章，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话题之所以夺人眼球，是因为低迷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剂“强心针”，而过去两百年的两次工业革命的确深刻改变了既有的世界格局。

早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推出之前，美国著名的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就已经推出了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里夫金丝毫没有回避两者之间的关联：“你提到的《经济学人》的文章，是基于我在《世界金融评论》上发表的封面文章，该文就是讲3D打印、互联网和能源之间关系的，而在我去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有对3D打印更加深入的讨论。”可以说，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始者，里夫金的著作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里夫金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CEO商业

圆桌会议的创立者和主席,这一机制涉及100个全球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建筑公司、房地产公司、IT公司、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交通物流公司等。里夫金的全球经济发展团队是全球最大的同类机构,他们正与不同的城市、区域和国家政府进行合作,推动经济向后碳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

经济层面上真正的地震是能源革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刊登封面文章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本人是否注意到这篇文章?

你提到的《经济学人》的文章,是基于我2012年3月在《世界金融评论》上发表的封面文章,该文就是讲3D打印、互联网和能源之间关系的,而在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有对3D打印更加深入的讨论。

与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相比较,您是否同意《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对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您自己又是怎么描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我以为,《经济学人》只是讨论了一小部分内容——制造业,它忽视了背后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样式转变。让3D打印成为可能的是互联网、能源矩阵的转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

让我在这里再作些补充。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

通讯方式的交汇。新能源的出现让复杂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它把人群聚集起来，通过劳动分工整合成大的经济体，这同时对新的通讯方式提出了要求，通讯革命又可以用来组织和管理新能源革命。

举例来说：19世纪蒸汽机和煤炭的使用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使大量廉价印刷报纸成为可能，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比例。印刷术又反过来管理了以蒸汽、煤炭为动力的能源革命。这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集中化的电力，使电话、广播和电视成为通讯中介，来管理石油时代，继而出现了消费文化。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走向消亡，化石能源会越来越昂贵，经济增长会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消耗殆尽，基于化石能源之上的技术，比如内燃机，也就会被淘汰。

默克尔刚刚就任德国总理时曾邀请我去柏林，问我德国经济如何在21世纪实现增长。我就问她，依赖化石能源的时代即将过去，如今，面对以新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你怎样发展德国、欧洲甚至全球的经济？这是欧美、中国以及全球都面临的难题。所以，经济层面上真正的地震是能源革命，而不是眼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余震。

在您的叙述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互联网+能源”。这两个看似不十分相关的概念怎么会被结合到一起的？也有人认为，此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已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而能源革命则是第四次了。

不，两者都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对历史演进有很大的误解。只有当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新能源革命需要通讯革命来管理。回头来看，在19世纪，加速发展的印刷技术生产出了可供阅读的材料，管理起以蒸汽、煤炭为动力的

能源。20世纪,把电力和电话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明白了,信息技术可用来管理分散的能源,通过能源网络把能源集合起来以实现共享。我喜欢用的类比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导致唱片公司销售收入跌至冰点,这时唱片公司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技术的威力所在。能源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享。

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实现能源、制造、营销和物流的民主化

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了吗?

我们正在走向新的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的汇合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商业、政治和社会。过去25年我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通讯革命。我生长在一个由上而下的中心化的沟通环境中,互联网则不一样,它的组织方式是分散的、合作式的,强调相互支持。今天有23亿人可以发送自己的声音图像,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通讯革命开始与新能源汇合,则可以形成分散式、合作式的能源。所谓“分散式能源”,同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区别在于,传统能源的获得成本很高,必须借助规模化、从上到下和垂直化的架构;分散式能源则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每天的日照、风吹、粮食、海水甚至生活垃圾都可以转化为能源,大多数人都可以接触到“分散式能源”。

现在欧盟都已经认可这一模型,并试图建立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这个计划也同样适合亚洲。亚洲和欧洲可以一起成为这一工业革命模型的领导者。具体而言,我的书中提到:支柱一是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支柱二是重新认识

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支柱三最难，涉及储藏，要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支柱四是利用网络通信技术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实现资源共享；支柱五涉及运输，要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插电式、燃料电池型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

重要的是，必须把这些支柱集合到一起，因为它们单个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不能再犯美国的错误。奥巴马的错误就是在一地造太阳能厂，在另一地造电池厂，这些设施没有连接，所以花费了巨资却没有成效。

您特别强调化石能源时代的结束和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我们担心的是，尽管可再生能源是清洁的、环境友好的，它也很可能是昂贵的。人类今天真能一下子从化石能源时代跨越到可再生能源的时代么？

我觉得这一进展比五年前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过去五年，风能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太阳能在欧洲大陆也很有竞争力，其他能源的开发也在进展中。我们想像一下，在中国成百上千万的建筑中，人们现场收集绿色能源，然后储存、输送到整个亚洲的网络上，就可以产生压倒性力量，这和共享音乐、博客是一样的。

您在书的序言中提到，金融危机后，多数国家都在寻找走出危机的办法，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从服务业或金

融业回归制造业,能使我们走出危机吗?

不久前,我碰到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他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在欧洲,德国其实早就这么走了。当我们拟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规划时,其基础设施可以不受国界限制。如果一个城市建立起五大支柱,它就会寻找另一个同样的城市,把多出来的能源输送出去,另一个城市可以是北京、首尔或新德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会跨越大洲。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互联网和能源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能源的民主化,人们可以用非常低的交易成本来创造能源、共享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还可以使我们实现制造、营销、物流的民主化。我们可以用3D打印软件对一个物品进行编码,然后打印出3D产品,这就是“添加式制造”,它和目前的“减成法制造”完全不同。传统的“减成法”是对原材料进行剪裁、拼接然后连接而成;而3D打印则是通过软件一层层自下而上生产产品,它可能只需要传统生产方式十分之一的原材料和能源。共享和经济民主组成了全新的模式,所有中小规模企业可以一起合作,来和集权化的全球大公司竞争,这是水平式的而非垂直式的。

这对中国尤其有利。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时,能源非常昂贵,需要投入大量金融资本,需要国内统一的市场和政府来管理自上而下的运营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像WIFI一样,连接了成千上百万的节点,更有利于跨国市场和洲际市场的形成。统一的洲际市场将是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欧盟是潜在的世界最大市场,本身拥有五亿消费者,其从地中海到北非的相邻地区还存在另外五亿潜在消费者。亚洲紧随其后,可以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连接起整个大洲的市场,这一进程也有利于洲际政治联盟

的形成。

但是，眼前的债务危机表明欧盟的体制可能存在问题，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到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框架下已经问题多多的社会制度，能够与更新的技术相匹配吗？

在美国也有人认为，欧洲的社会市场体系在金融层面行不通，征高额税收之后提供公共服务，却没有让资本市场自身运作起来。但是，一项关于最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年度权威调查表明，排名靠前的是瑞典、挪威、丹麦这样税率最高、公共服务最好的国家，它们有完善的社会市场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成千上万的工作和生意，这些基础设施自身也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比如3D打印。“二战”后，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成熟起来。而1900年时，我们已经开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建造基础设施。经历1929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战争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了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项目。1950—1980年代，产生了大量工作岗位，美国进入非常繁荣的时期。之后就是最近20年发生的衰退。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积蓄、能消费，用的其实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下的财富。现在，不仅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已到达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出路就是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它会为所有人提供一个竞技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两者都有，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两者，因为它要求每个人都是创业者，创造信息和能源、生产产品。

大量投入能够帮助我们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英国崛起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崛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是否还会有某个国家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呢?

不会了,那些都是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当时通讯和能源的特点形成的垂直式经济模式导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共享能源、在洲际的范围内沟通或运输,这样的能源网络甚至还会跨越时区。所以,它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呈水平式的,成千上百万个节点、建筑和城市链接到网络上,在整个洲际范围内共享和沟通。所以我说,下一步全球化将是洲际化,欧盟的情况正符合这样的趋势。亚洲对此也有很深入的讨论。要建立水平式的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实现洲际网络,建立洲际的市场和政治联盟。你不可能独自一人成就事业,像英国、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有所成就的模式已经过时了。

不过,在实现新能源的共享之前,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旧必须建立在高新技术之上。人们担心这一过程可能仍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

当然,专业知识是必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在新兴经济体中迅速展开,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快,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你到印度之类的亚洲国家或非洲去看看,很多地方还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没有电力,于是,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反而比修补老的要快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手机,没有人能想到手机会在非洲有市场,但是一两年以后,那里几乎人人都在买手机,即使那里的一些地方基站还在建设之中。

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会这样。

至于前期投入的资金,我认为这不是问题,过去几年我和很多机构及银行都有过讨论。最不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和私人及公共机构的合作来吸引投资,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公共基金或国际投资基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今天,银行和私募基金都在投资陈旧的基础设施,却没有相应的回报,在传统能源、技术和工厂方面的投资回报也越来越少。我并不是说第二次工业革命会一下子消失,只是说其在未来20年获得的支持会越来越少,我们必须确保对能够帮助我们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大量投入,因为这将对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会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商业模式。

有人提出中国的崛起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也有人认为这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而言是巨大机遇。您怎么看?

我并不怀疑中国可以创造出非常高水平的技术,毕竟,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生物学者。对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欧洲国家还是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摆脱传统的中心化的思维方式,换之以一种分散化、水平式、合作式的思维方式来组织商业。这是划时代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果不转移到水平式的思维方式上来,那就不会有什么出路。现在,我们必须像以前生产信息那样来生产能源,这就要求我们把思考范围扩展到全球经济、政治空间。对亚洲而言,在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型中,关键要看哪个国家能够在传统的国内市场完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让它们运转起来,然后,不再像以往那样出口一个个单独的部件,而是出口整个基础设施技术。

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曾经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投入更多的资本给劳动力就会提高生产力,两者之间成正比,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人均资本投入只能解释经济增长中的14%,那么,另外的86%来自哪里?过去20年的研究表明,另外那部分来源于热能动力效率的提高。归根到底,经济活动是从自然资源和物质储备那里获得能量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未来25年,一门生意的成功与否同劳动力成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真正重要的是能源成本。

所以,在这个不稳定的过渡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消亡,第三次工业革命初生,能源成本就成了关键。传统能源会变得非常昂贵,而新能源大量生产出来以后则会便宜很多,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公司而言,能源成本成为关键性因素了。如果那86%部分的生产率都来自热能动力效率,那么,转向新能源就会大大提高效率。现在,我们有大型的公用事业与能源公司,我们购买它们生产的能源;但在新能源时代,我们就不再是购买了,而是把自身建筑中产生的能源输送到能源网络中。传统的投资组合方式不会一夜消失,但在未来25年肯定会不复存在。在新能源时代,能源公司的专业不再是出售能源,而是管理能源。他们的新商业模式就是,和其他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帮助他们来管理能源流转,提高热能动力效率,从而提升生产率。这种新的模式也可以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使人们真正迎来基于经济模型之上的后碳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型,为21世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人们更快地提高生产率,解决气候问题,正因此,欧盟首先开始投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怀抱。

设想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尤其是全球城市化进程又会

带来什么变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印度也有同样的讨论。那里有3亿人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生活，乡村非常穷，他们迁移到城市，而城市又接收不了那么多人，没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正在消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能源变得越来越昂贵；那些在乡下连电都用不上的人们蜂拥到城市来，然后面临失业，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仅在印度出现，其实在全球也都在发生。如果把电能与通讯技术结合，就会改变乡村的穷人迁移到城市里去的传统模式。在印度，我们做了相关研究，情况就是这样：乡村通电以后，人们立刻从城市回到乡村做起小生意，并且通过网络互相联系。当能源和通讯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就会改变整个生活环境。如果说，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郊区化——使城市周围出现了很多郊区，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会使我们的居住地分散化，城市规模会变小，人们不一定聚集在一起了。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大数据时代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

采访 | 田晓玲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数据科学家，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长期致力于网络经济、信息与创新、信息监管、网络规范与战略管理的研究。还在“大数据”这一概念众说纷纭时，迈尔-舍恩伯格就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010年，他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和数据编辑肯尼斯·库克耶一起，发表了长达14页的大数据专题文章。称他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并不为过。

“大数据”的热潮席卷全球，正如美国《福布斯》杂志说的那样，如今，在浏览新闻网站或者参加行业会议时，想看不见或听不到“大数据”这个词几乎不可能。2012年，美国6个联邦政府部门宣布将启动“大数据研发计划”，投资超过2亿美元以改进从海量和复杂的数据中获取知识的能力。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把发展“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

究竟是什么魔力，让“大数据”这一概念得到全球各国的普遍关注？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眼前对“大数据”的关注度是否已经过高了呢？在我们寻求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解答时，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连网研究所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讨论“大数据”，他如果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也起码是合适人选之一。

《经济学人》说，在大数据领域，维克托是最

受人尊敬的全方位发言人之一；美国《科学》杂志说，若要发起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没有比他更好的发起者了。

除了理论研究以外，维克托还非常接近实战世界，早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先后成立了两家数据安全和制作反病毒软件的公司，而在他写就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那些最前沿、最崭新的大数据应用案例，都得益于他多年来紧跟企业与商业应用的步伐。他的咨询客户中，不乏微软、惠普、IBM、亚马逊、Facebook、Twitter、VISA等大数据先锋们。

目前，维克托还是欧盟互联网官方政策背后的重要制定者与参与者，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在新加坡商务部、文莱国防部、科威特商务部等部门任过职，特别熟悉亚洲信息产业的发展与战略布局。

失去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为的是获取宏观层面上的洞察力

今天，“大数据”已经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词汇，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它的？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数据在信息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与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一起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报告。大约三年前，在我自己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我俩都意识到“大数据”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炒作或者什么宏大的宣言了，而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整个社会，于是，我们决定就此专题写一本书。

那么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大数据时代？它和传统数据时代到

底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将大数据运用到了商业实践中。

事实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数据已经在科学家们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过去几十年间，这一做法又延伸到了一些公司的决策制定过程。但在大数据时代之前，数据是非常匮乏的，我们拥有的数据非常少。因此，我们的决策、我们构建的制度都建立在这样一种数据匮乏的基础上。今天，一切变得非常不同，它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称之为“更多”、“更乱”和“相关性”。

这三个特征也是您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非常强调的，它们甚至会颠覆我们过去的整个思维方式。您能否具体描述一下这到底是怎样的过程？

好的。我说的“更多”，是指围绕任何一个我们想要调查的特定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回答的疑问，我们都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获取更多的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利用海量的数据得到非常详尽的见解，这是传统方法不能做到的。

可以这么说，大数据时代和传统数据时代的区别，就像分辨率在200万像素的旧数码照片，一下子提高到2400万像素那样。后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文件，它可以提供更多细节。它可以让我们不断放大，看清楚小到颗粒状的细部，而具有较低分辨率的图像在这些细节方面就会非常模糊。

基因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有一家叫23andMe的新公司提供个人的DNA测试分析，以发现一些疾病征兆。它的成本只有两三百美元，并提醒客户关注会发展成严重疾病的个人癖好。但是公司并不对每个客户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而是针对已知特征的位

点(经研究得知因某种疾病存在,而可能会出问题的DNA片段)进行比对。这意味着,当一个新的特征被研究发现时,23andMe公司就不得不再次对客户的DNA进行测序并建立更完整的档案。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尝试了非常不同的方法。他得了癌症后,就有了自己全部的基因密码,数十亿的碱基对测序。这花费了他超过10万美元的成本,但这可以让医生完整地洞察他的基因密码。每当药物由于乔布斯的癌症病变而失去有效性,他们就可以根据乔布斯特定的基因信息,寻找到有效的替代药物。遗憾的是,这也没有保住乔布斯的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已经延长了他的生命。

由于技术创新,现在收集大量信息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数年前,史蒂夫·乔布斯花费了六位数的金额才做到的事情,今天,不到1000美元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了。

而“更乱”指的是,在小数据时代,因为数据是如此稀少,我们可以确保自己收集的每一个数据点都是非常准确的。相比较而言,大数据往往是凌乱和质量参差不齐的。但是,相比以高额代价来保证测量和收集少量数据的精确性,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将接受这种杂乱,因为我们通常需要的只是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努力了解一种现象的细枝末节。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放弃精确性,我们只是放弃对精确性的热衷。我们失去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为的是获取在宏观层面上的洞察力。

电脑翻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1990年代,IBM的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套非常精确的文件(加拿大议会记录的法语和英语版)来训练计算机。尽管计算机完全按照规则行事,但基于此的翻译质量却非常低。然后,谷歌在2006年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他们没有使用来自

加拿大政府的几百万句标准翻译,而是使用随手可得任何语言。他们在整个互联网上,利用数十亿页质量参差不齐的翻译,这些翻译不怎么标准——但是,这是一个小的权衡——他们能够使用的数据大大增加了,结果翻译质量反而提高了。与更少、更标准的数据相比,更多凌乱的资料完胜了。

“更多”和“更乱”组合到一起,产生了第三个特点,“相关性”,这也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最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思维将从因果关系转向相关关系。至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探寻“为什么”。但我们对原因的执着探索往往带领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建议,在大数据时代,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仅仅寻找“是什么”,而不必完全理解“为什么”。例如,对于大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机器震动中一些非常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机器将很快损坏。这使我们能够在部分机器零件报废前更换它们,这被称为“预测性维护”,它可以节省不少钱。但除了提高消费效率,“相关性”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对早产儿而言,即使他们长大成人,这些小宝宝仍旧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遇上很小的感染。医生卡罗琳·麦格雷戈(Carolyn McGregor)研究如何给这些婴儿最好的生存机会。使用大数据分析,每分钟可以搜集这些婴儿超过一千个数据点,麦格雷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每当这些早产儿出现非常稳定的标志时,他们的身体其实并不稳定,正在准备发病。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她就能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确定婴儿是否需要药物治疗,从而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这是典型的大数据应用:医生麦格雷戈通过更全面的传感器,可以比以往搜集到更多的数据。她也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

有的数据都是准确的，从而也会导致她分析中存在不精确的可能。她把“为什么”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而用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来提供帮助，她寻找“是什么”，这才是一个更好的预见感染的办法。

我们应该记住：大数据也可以挽救生命。

正确使用大数据，可以改善医疗、教育水平，促进人类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否将会引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看待它的价值？

大数据将会极大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它的价值能否等同于工业革命，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好说。我个人猜想是不能等同，原因是在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所以相对来说，当时的人们从工业化过程中能获得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今天则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真正想强调的是，大数据时代将推动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大数据可以提高人类制定决策的能力，这种提高将是大幅度的。有了大数据，我们不是简单地提高经济效益，而是将挽救人类生命，延长我们自己的寿命。我们还将改善教育，促进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小心。大数据同样也有“阴暗面”，正如我们在书中讨论的那样。如果应用错误，大数据也可能会化为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正确使用大数据。

您提到了大数据时代的“阴暗面”，它的到来会加深数字化鸿沟吗？

大数据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因此，如果我们使用了错误的方式，

它就可能会加深数字鸿沟。但是,如果我们用得好,相信大数据就可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而言。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火、电或是抗生素,等等。

也就是说,您对大数据的价值认知,是基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发展。

如果以非常广阔的视角来看人类历史,我认为,人类一直想要理解世界。起初,许多人的“知识”是基于迷信和预感。知识的发展非常慢,人们需要非常深层次的思考,再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以确保知识是可用的。

但即使如此,我们的知识仍旧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例如,19世纪,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一直在研究狂犬病疫苗,当时有一个被狗严重咬伤而染上狂犬病的小孩,父母担心孩子会死去,恳求巴斯德试试他的试验性疫苗。巴斯德照做了,孩子活了下来。随后的庆祝活动上,巴斯德以一个英雄的身份出现,他挽救了年轻孩子的性命。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吗?今天,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在被类似病狗咬到的儿童中,只有25%会感染狂犬病。所以75%的儿童哪怕使用了无效的疫苗,仍旧可以存活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非常科学的世界中,但其实,我们拥有的数据非常少。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在被证明安全之前,需要做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医学实验来进行测试。但这仍旧太少,人们还是会受到伤害,因为我们依靠的数据太少。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告别数据匮乏,做出的决策将更理性,更基于事实,当然也更可靠。这是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的希望——更好的决策将会代替我们过往那些可疑的迷信和不可靠的人类预感。

我们看到，麦肯锡公司2011年就发布报告推测，如果把大数据用于美国的医疗保健，一年可产生潜在价值3 000亿美元，用于欧洲的公共管理可获得年度潜在价值2 500亿欧元；服务提供商利用个人位置数据可获得潜在的消费者年度盈余6 000亿美元；利用大数据分析，零售商可增加运营利润60%，制造业设备装配成本会减少50%。“数据创造价值”的预测已经非常振奋人心。在您看来，大数据是否只是一门价值不菲的生意？

不，大数据可以做更多。医疗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只是分析一些重要的征兆，早产婴儿的感染出现明显症状的数小时前，医生就可以预见其生病。

同样，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也可以找出学校教科书中的哪一部分对学生而言效果最好，也可以找出效果不好的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按照人类的预感，即教师自己判断学生在理解特定课程时是否会有疑问；但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实际的数据可以参考，例如数据显示，电子书籍的某些页面被看过许多遍，因为它让学生感觉费解，据此可以调整我们的教材。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教育。

或者举公共政策为例：Inrix是为智能手机提供导航软件的公司，它还提供实时的交通数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每个用户本身都成了交通流量状况的传感器，把位置和速度信息都发回Inrix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行进在交通堵塞路段周围的客户提供良好服务。Inrix公司有一大堆人们的活动数据，这还将有助于城市规划者了解大家的通勤模式，人们从哪里出发去工作，然后返回，并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和铁路。这是最有效的应用。节省钱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管理。

大数据对于商业决策、学术研究乃至国家治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言，他们一定会从中受益吗？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还是有不少人主张远离过载的信息和数据、返璞归真回到传统的社群生活之中呢？个人生活空间一定得从“简单平面”转变到“多维存在”才有意义吗？

千百年来，人类已经经历的世界，都是在少量数据的基础上产生很多想法的世界。海员们结束长途航行后回来，地图才会在这一次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绘制。这显然不会很精确。经过试验和犯错的周而复始，人类发展得非常缓慢。但是，当我们只有非常少的数据时，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数据，难怪人类会不堪重负。但是，现在大数据可以提供帮助。如果人类不太善于消化这些过多的信息，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将信息进行过滤，并进一步可视化，使我们能够轻松地加以使用。

人们尚未普遍具备与大数据时代相匹配的思维和技能

有专家认为，大数据的未来是数据的APP（加速并行处理）而非基础构架；也就是说，仅仅有数据平台和基础构架是无法创造长期价值的。对此您怎么看？

我们认为，大数据时代将至少需要和过去时代一样多的人的独创性。同时，巨大的资源才是未来时代的金矿，那些拥有这些数据资源的人将获得的回报是不可想像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都是透明的，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您所谓的“互联网遗忘运动”会是最佳药方吗？

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发现了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价值，所以，保留这些数据，然后一遍遍地重复使用数据，往往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现行的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特别在西方，针对的是一个传统数据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大数据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隐私的规则方面作出调整。我们建议，可以通过调整相关保护规则来实现这一目标，正像你提到的，我们可以在一定时间以后，选择遗忘这些数据。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海量数据有待处理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海量无用信息需要删除的时代。这是否就是您在《删除》(*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中强调我们要有所取舍的原因所在？

是。在某种程度上，大数据本身也可以加强隐私的保护。因为如果有一百万个数据点，一个单独的数据点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和传统数据时代非常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其中一些数据，并不会破坏整个大数据的运行和使用。

大数据现在在全球究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处理大数据的技术是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

管理和处理大数据的技术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并不是非常昂贵。但是，有一样东西目前仍旧非常缺乏，那就是我们的思维——以理解数据背后隐藏的巨大价值，以及提取这种价值的专门技能。今天，全球范围内，人们还没有普遍具备这种思维和技能，但是我相信，在未来，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我们预计，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将提供针对大数据分析的课程，来培训大数据时代需要的技能。

历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国似乎都是学习者和模仿者;和上几轮产业技术革命不同的是,大数据时代,中国几乎和欧美发达国家同时开始技术研发,中国人口又居世界首位,将会成为产生数据量最多的国家。您看好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景吗?中国在大数据时代是否有创新和领先的可能?

是的,我们对此非常乐观。中国很可能成为大数据这一领域的先驱。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有很多优势:中国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数学和统计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多元化社会,这会创造大量机会来创造大数据这一资源,并建立大数据应用。同样的道理,对于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我们还需要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有尝试新事物和持续创新的愿望,以实证事实来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因此,和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大数据时代的确也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中文版是和英文版同时面世的,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事实上,中文版的推出比在美国推出英文版还要早,但两者都基于相同的内容。这仅仅是因为在书的生产、宣传以及营销方面,美国方面需要比中国更长的时间。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书可以在这里尽快出版。

沃尔特·米德

美国正在社会再造的起点上

采访 | 田晓玲



沃尔特·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同时任教于耶鲁大学、巴德学院等，也是《美国利益》杂志的专栏作家。

“美国是否开始衰落？”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有关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一直没有消停过。

经济方面，美国仍旧没能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缺乏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2011年夏天，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更是从3A级被下调到AA+，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首次。

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的情形下，美国爆发了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抗议运动，即“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后来席卷到美国100多个主要城市，表达了美国民众对当下社会的强烈不满。

而在文化方面，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软实力”也被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认为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这一切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的那样，似乎昭示着“美国已经与历史上那些衰落大国面临相同的局势”。

但是,与“美国衰落”论的赞同者相比,对此论持反对意见的人同样不在少数。有论者甚至指出,“美国衰落”这一话题每隔10年似乎就会被拿出来炒作一次,早已谈不上什么新意了,这一次也不例外,“美国虽然表现出一些衰相,然而其和真正的衰落还相去甚远”。

“美国衰落”论常常是被放在与“中国崛起”两相对照的背景下讨论的,因此中国学界对此论的看法显得特别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2011年发布了首部“美国蓝皮书”——《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传递了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立场:“美国实力将维持下去仍然是学界的主流看法。”

客观而言,与“二战”刚刚结束时占全球经济近一半份额的地位相比,美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早已不能相提并论了,同时,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等问题层出不穷,同样也为美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旧占据全球第一,其总体研发费用、大学排名、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创业指标等等仍然居于世界首位。

正是这些非常不一样的指标,让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维度的美国,“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也就变得众说纷纭。沃尔特·米德表示,尽管他并不承认美国已经衰落了,但他确实也意识到了,美国今后需要做得更多。“美国社会正在一个伟大的再造过程的起点上,这并不代表我们会忽视世界的其他部分,只是意味着我们将做一些真正变革性的事情。”

历史周期论并不能用来预测未来

近年全球各地有很多事情值得玩味,比如有关“美国是否衰落”

的讨论无疑是其中一大热点。您同意把这个讨论列入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序列吗？

我并没有看到很多证据能够证明美国正在衰落。最近也有文章对这一论题持相反观点。

那些同意“美国衰落”的人很大程度上将观点建立在文明周期理论或者是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论的基础之上。在您看来，历史是否真的有它自己的周期和路径？

人们谈论历史周期，看上去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们基本上不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有泡沫，但是你不能指出泡沫什么时候会破灭；同样，你可以说我们有历史周期，也许历史周期的确存在，但是，谁知道这个周期的跨度究竟是5年、50年，还是500年？所以，在我看来，历史周期论只是人们表达看法的方式，但不能用来预测未来。

我们知道，您并不同意“美国衰落论”，并提出美国在19世纪一直扮演着债务人的角色，但其地位并没有因此下降，反而在100年后的今天变得更强大、更富有。但是，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2011年被下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它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美国的确在衰落吗？

主权债务评级本身并不是很古老的事物。事实上，私人评级机构并不能够改写历史。美国国债的利率目前仍旧很低，这意味着投资者对主权债务的评级仍旧是3A；如果美国国债的利率非常高，才表明人们不再信任美国的债权了。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中认为，

美元将丧失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您对此怎么看？

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一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并不正常；不同的储备货币可以有不同功能。美国历史上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德国则采取非常紧缩的政策，所以美元相对于欧元而言长期趋势是贬值的。德国货币在带来低风险的同时是伴随着低收益的，而美国货币则是高收益、高风险。大多数投资者都希望把一部分钱放在美元上，另一部分钱放在欧元或其他货币上，把它们混合起来投资。这是符合逻辑的。

美元作为全球唯一储备货币，对美国自身也不是好事。美元成为3到4种全球储备货币之一，并不会削弱美国地位。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欧洲，那里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人口也几乎没有增长，除了希腊和西班牙，风险不是很大，但收益也很小。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如坦桑尼亚、赞比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也许它们未来的增长非常迅猛，但是那里还是有不小的风险。美国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它可以提供比欧洲更多的收益，同时风险也比其他国家更少。所以，投资在美国的人会持有美元，这里面有着非常大的利益相关度。

美国需要做其他国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美国有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希望美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这会影影响整个美国的外交政策吗？

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变化。的确，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处于恐怖主义中了，我们在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取得了胜利，本·拉登以为自己的行动会唤起全世界穆斯林来对抗西方，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尽管恐怖主义还没有终结，但我们不再需要花费那么

多精力、金钱、时间来对付恐怖主义了。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处理其他问题。

同中国经济一样，美国经济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一直延续着20世纪“大萧条”以及“二战”后所采取的增长模式，即大生产、大消费的所谓“福特主义”。这一体系建立在过度消费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出口导向型增长。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消费那么多了，而你们希望生产更多的想法也遇到瓶颈。因此，中美都需要再平衡。这对于两者而言都很复杂。美国人意识到现在需要做一些新的事情，但新的模式是什么依然不明确。某种程度上，中国更容易有所作为，可以向欧美学习。而美国却需要做其他国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后工业化时代实现大繁荣。这是美国面临的挑战。我们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找到答案。

也就是说，在找到新模式之前，美国将始终处于经济低迷的状态中？

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个经济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增长。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作出很多变革。学校体系需要改变；很多州和地方政府的运转并不好，运行成本高，官员的灵活性不够。我们需要从上而下再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还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毕业后就想立刻找到工作，按部就班。但今天，人们不得不经常变换工作，必须更加富有创业精神，而非官僚之风盛行。这就需要教师文化相应作出改变。很多基础性机制都需要加以改造。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和资源。我们的医疗也要作出变革。我们无法支撑目前的医疗体系，尤其是我们更多的人群在变老，人们

变得更加长寿,使原有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我们需要引入电脑信息技术,使医疗更加高效。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再造过程的起点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是意味着我们将做一些真正变革性的事情。

在您的另一本书《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和现代世界的结构》(*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您认为集海洋性、全球化、商业化和军事力量于一体的英美法系主宰了整个世界。从地缘上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只能是跟着这个体系亦步亦趋吗?

这个体系能够存在那么长时间,原因在于它不仅仅服务于美国。美国希望有一个贸易和金融的全球体系,在主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以防止战争;很巧,其他人也希望如此。美国人说,全球体系的目标是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富裕起来,国家变得受人尊敬,和邻国和平相处。又有谁会说我们不要这个体系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目标和其他人的目标匹配起来。

“软实力”曾经是美国权力超强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推行单边主义,连“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也在批评美国“软实力”出现了下降。您怎么看美国当今的“软实力”?

我认为“软实力”和“受欢迎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在大多数中东国家都不受欢迎。你和这些国家的官员、媒体一起开会,他们整场会上都在告诉你,美国做错了,我们不喜欢美国的做法。但是最后,他们会说,我儿子在申请哈佛大学,你能否给我写份推荐信?所以,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美国大兵回家

去,带我一起走!”这个世界有时候是非常让人困惑的。

在我看来,“软实力”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关联度并不高,“软实力”其实是美国文化的吸引力。在美国,普通人可以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普通人也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这些是美国“软实力”的真正来源。

在经济衰退中,人们会变得更有创造力

早在1992年,您就曾预测,如果全球经济停滞或收缩,将会出现南北冲突以及贫富冲突。今天回想起来,您如何评价当时的这一预测?“占领华尔街”运动作为美国社会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被看做贫富冲突的缩影吗?

我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不重要,只是几百个人,即一些年轻学生,还有一些对任何事情都会抗议、但永远不会改变任何事的人。他们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他们代表不了人们的行为趋势。它要变成一场严肃运动,就必须从大街走向政治生活之中去,必须选择代言人来参加选举。美国的政治不是由大街上的抗议来创造的。上百万人在华盛顿的大街上游行,只是意味着另外2.99亿美国人选择不参加游行。只有通过投票选举出不同的候选人,才能改变事态。所以,我关注民意调查,或者左右翼在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这些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关联。

不过,“占领”运动中的这些人所表达的难道不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吗?

很多人不喜欢华尔街的富翁们赚很多钱、却把银行管得很差、还

要政府来救他们。我也不喜欢这些富翁。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甚至没有具体诉求，不同利益群体的议程也不一致，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浪费时间。当然，我也同意他们所提出的批评，但我不会从那里获取信息或者思想。

在金融泡沫出现和破灭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很多不满情绪。历史上一直如此。人们对华尔街、伦敦的银行家们很生气，但是生气并不会带来激烈的政治变革。世界经济缓慢增长所带来的冲突中，有些更值得关注，比如“阿拉伯之春”，因为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带来了埃及的抗议活动。普通人并不会就民主发起抗议，他们只会因为买不起足够的食品而抗议，这些抗议更危险，与此相比，因为比尔·盖茨太有钱而发起抗议其实并不危险。

现在，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寻找更好的政策，可喜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因为经济下滑导致主要国家之间出现贸易战。这会带来真正的进步。

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也是美国社会乃至全球的一大关注重点。他被认为是美国冒险和创新的代表，他的去世是否“隐喻”着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的创新精神正在逐渐消失？

人们喜欢使用隐喻。我认为，在经济衰退过程中，人们反而会变得更有创造力。如果一切情况都很好，人们为什么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一切都很完美的话，就不需要做出改变了。但是突然之间，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新产品或降低成本，人们就要失业，那时，就要开始思考怎样创新变革才能保住工作了；或者在失去工作以后，思考依靠什么来生活，最好是想出一些新花样来。所以，恰恰是艰难的时刻会带来创造和革新。如果成百上千万的人都这样想，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出现创新和变革。

比之创新精神本身，您似乎更担忧美国的精英阶层，尽管他们身处非常好的位置，但却并未能够帮助美国实现社会转型，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能够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了。您为此还专门写了“知识分子的危机”一文。这是否也是所谓“美国衰落”的一个潜在因素？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提出好的观点，比过去更加艰难了，因为知识分子基本上生活在非常保守的机构和体制之下。大学非常保守，距离大多数人的生活太遥远。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工作一直在变，生活没有保障。知识分子应该反映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才能真正提出真知灼见；一旦远离这个时代的奋斗与挣扎，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机制，但是这类机制对学生和其他人可能并不利。我们不应该一直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甚至“发达”(developed)国家一词，也仅仅意味着发展过程已经结束了。根本而言，每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人知道发展的终点是怎样的。未来是不可知的，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未来是已知的，它能够同今天一样，只有10%的增长。它只是增长而没有变革。事实上，我们所处的世纪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革发生。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非常重要。

小约翰·柯布

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采访 | 王治河



小约翰·柯布

John B. Cobb, Jr.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全球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柯布博士多年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直持坚定的批评态度，柯布一直认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使人类的发展真正可持续，就必须超越西方，走一条后现代的发展道路。

柯布博士，这位“绿色GDP”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近年来一直把后现代的发展希望寄托在有儒、释、道深厚思想资源的中国身上。柯布博士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既有观点，认为人类最主要的错误观念，就是把奢侈生活当做美好生活，以为“美好生活”的标准是由消费的多少来决定的。他认为中国可以在推进环境保护方面为全球作出表率。当然，这位耄耋之年的思想家甚至也关注到了中国当下一些城市中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关于“城市化”，他坚持中小城镇的发展主张，并建议中国要把中小城市发展与后现代农业的推进结合在一起。

对于当下正在热议“城镇化”的中国学界而言，这位美国生态经济学家的声音，也许能提供另一种思考的维度。

美好生活就是奢侈生活，是人类最主要的错误观念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全球风险报告》认为，难以摆脱的全球金融危机转移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成为未来人类需要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作为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生态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您曾经预言生态系统会在50年内崩溃，现在是否还持有这种看法？

如您所知，任何预言都蕴藏着危险。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如此肯定地说过，地球生态系统会在50年内崩溃，毕竟，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判断。因为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崩溃实际上是由很多规模各具大小局部破坏所造成的，所以，很难给出地球生态系统崩溃的具体时间。今天，我们谈到的所谓世界各地的生态难民，就是指这些难民所生活的地方，狩猎、渔业、农耕或居住环境等等已经崩溃。事实上，北极的生态已经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地球上的沙漠到处在快速扩张。这种趋势可能还在继续……

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态系统的崩溃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看来，一个很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主要威胁在于，青藏高原的冰川有可能在不到50年后融化，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不仅是印度河、恒河和湄公河，长江和黄河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冰川。

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段，为了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您认为我们应转变哪些错误的观念？

我认为，人类最主要的错误观念，是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或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相信美好的生活就是奢侈的生活。“美好生活”

的标准是由消费的多少来决定的；国家的发展则是依据产量的增加来评判的。只要这一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领导人就得被迫采取那些将会导致我们星球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政策。当然，提高效率和减少浪费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另外，很多问题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解决。但是，只要我们不改变上述错误观念，保护生态发展所必要的深层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像不丹这样一个小国，已经作出承诺，要以增加国民幸福指数为目标，而不再是以增加所拥有的财产为目标。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而且，这将引发人类真正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幸福这一重大问题。不丹人信仰佛教，佛教徒在过去的2500年来一直坚信：幸福不是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之上，他们有能力坚守这个观点。幸运的是，佛教并没有像其他宗教那样提倡禁欲主义，而是认为，人身体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我希望不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典范。在我看来，大多数人身体所需的满足，不一定必然以毁灭地球的进程作为代价。不丹有可能引领我们走上一条真正可行且必要的生态发展道路，但这也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佛教文化和佛教教义。

其实，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都会有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幸福源于互相支持和互相服务，而不是对物品的占有和消费；幸福也可以来自自然的美、来自艺术和音乐、来自人类的知识；此外，挑战自我，取得各种卓越的成就，也可以增加人类的幸福感。人类的互相支持能保证人类满足身体的各种基本物质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万物的生长。如果他人没有足够的食物、不能获得很好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不會快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父母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会破坏后代的发展前景，那么，他们也

就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

为了应对生态危机，全球社会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在您看来，全球社会还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联合国可能做出的行动来回答。我相信，如果联合国大会真的能够放手让每个国家自主决定采取行动的话，那么，相当多的认真讨论和积极行动都是可能发生的。现在，大多数国家并未从由大型公司尤其是由财团控制的全球系统中获益。大多数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发现普通人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并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安理会对国际社会有关寻求真实幸福的议题不屑一顾。

美国现在是这种进步得以产生的主要障碍，因为它是财富特权的最坚定维护者。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办法来推动被美国所阻碍的发展进程。如果这种努力得以继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立场，或者，其他国家就会直接绕过美国而前行。在提供良好环境以应对生态危机方面，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机会更重要的了。

在您看来，未来10年，生态环境保护最有可能在全球哪些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生态发展通常是指抑制生态受到损害的速度。人们已经开始修复一些曾遭到破坏的地方，重新植树造林。精心的管理可以把已经被沙漠吞噬的地区重新变回绿洲。农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小范围内改善了土壤。尽管如此，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真正的生态发展。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给世界做出表率。

那么,在推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您认为美国又应当有哪些作为?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的责任,就是尽力去扭转不利于生态危机解决的那些美国政策现状。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要想改变这些现状是非常困难的。不断出口优质资源和不断进口过多产品,即使在短期看来也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不能支持现在的这些全球化策略,因为其所仰赖的经济基础已行将崩溃。当年的英国放弃维持帝国地位的努力,意味着英国不再试图控制全球,而是转向为本国公民提供良好生活这一方向。应该说,这样的转向是最有利于降低生态危机风险的。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虽然,像美国那样去竞争全球范围的主导权,对中国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中国事实上应该扮演一个更为恰当的角色——作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为世界的利益而奋斗。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不再像美国那样成为剥削第三世界的殖民势力,而是集中力量以自身资源为主,推进可持续发展。

现在,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纠正在GDP问题上的错误导向。这是中国举国上下讨论“构成国民个体或总体幸福的因素”问题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讨论可以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更加高度地重视生态保护。说实话,中国不仅可能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还能够给其他国家解决生态危机做出示范。

中小型城市和后现代农业在中国要并举发展

城市化,是人们在讨论生态问题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城市化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之一,但是也有人认为恰恰

城市化才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种方案。您对此怎么看？

城市对于生态环境是有过很多贡献的，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农村生活可以非常人性化，但是也有可能因此而显得不太体面。我想，孰优孰劣是很难下定论的。然而，考虑到世界各国将面临多种形式的生态危机，所以，那种认为生态系统崩溃还很遥远的看法会逐渐减少。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直接食用自然产品的话，整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将会变得更加安全。此外，我也相信，为防止水土流失，有机种植、节水灌溉、适应气候变化都将需要劳动密集型的耕作方式。因此，我赞成维持农村的庞大人口体系。

按照上述观点实际运作的话，现在各地的农场面积可能太小了。我不知道究竟多大面积的农场最适合中国国情。如果农村人口太多、同时农业的效益又不高，那么，适当的城市化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够从城市生活中获益呢？按照我的估计，3万人就足以组成一个城市了，当然，这个问题需要翔实系统的研究。

有数据表明，城乡差别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来缩小。在我看来，一个健全的社会，农业生产者应该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更为重要，应该得到起码的同等待遇。即使是城市化，也要考虑到城市自身的魅力问题。更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服务和文化环境，都是形成城市魅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3万人规模的城市能够分别分布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同时可以为城市居民和周围农民提供各项高质量的服务，那么，人们迁往大城市的愿望就会大大减小。当然，我希望有关缩小城乡生活差别的讨论能够与什么是真正幸福的讨论联系起来。如果构建巨型城市能够为人类的真正幸福作出显著贡献，那么，我就会修正我的

上述观点。

新一轮大规模的城镇化，成为今后若干年中国取得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关于城镇化，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建设巨型城市，一种主张发展中小城市。您有怎样的主张呢？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问题应该靠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来解决，外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总体上说，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依靠自身的资源和乡村环境的可持续管理来发展，这样的发展会更具可持续性。相反，城市越依赖远距离的资源，就会显得越脆弱，这种情况在战争时期更为明显，而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也会威胁那些依赖远距离资源支撑的城市。如果那些远距离的资源是全球范围内的稀缺资源的话，对于城市的威胁就会更大。

今天，石油和天然气正在急剧减少，这对所有城市而言几乎都将是一场灾难，取暖、冷气、照明、城市交通、工业生产以及商品进口等等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如果城市里的人们不能就近获得煤炭，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在很多情况下，城市附近的食物生产也需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一条途径，以减少对那些供给极易中断的能源的依赖。即便没有什么危机会切断城市所需的能源，为获取这些能源所付出的代价在未来几十年也可能显著增加。

中国最近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雾霾，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一种生态灾难了，至少是生态灾难的一种前兆。希望此事能够引起中国上下的高度警觉，进而帮助中国全面评估城市化的代价与后果。

从可持续性原则出发，我个人倾向于中国中小型城市与后现代

农业要并举发展。正如澳大利亚“绿色澳洲项目”科学家弗罗伊登博格博士(David Freudenberger)所追问的那样：难道中国真的渴求发展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相同的“现代化”吗？中国要实现“充分现代化”的农业，只需要1300万农民(相当于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充分现代化”的农业会让大约8亿人离开农村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这一迁移会迫使中国再建80个像北京或上海那样能容纳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国需要80个巨型城市吗？考虑到环境的承受力和人民的幸福感，这种以大城市为主调的城市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我相信，一个3万人规模的城市是完全可以满足城市化环境需要的，而且能源可以自给自足。在这样的城市中，多数居民完全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并且，这些城市在关键时刻可以用各种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较之大城市，中小城市更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的中小城市需要有可持续的农业做支撑。这意味着，要鼓励生态农业而不是农业产业化，换言之，农业的增长不再以蚕食耕地为代价，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空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可持续性也需要社会和谐与公正。为促成社会和谐与公正，要尽可能使更多的公共设施能够为所有居民服务。教育、健康、交通和政治参与都无需更多的成本就可以实现，这些公共设施将会减少贫富之间的福利差距。

在可持续城市化方面，美国有什么好的模式可供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我们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你们中国所要避免的。成熟的

可持续生态城,在美国尚不多见。不过,我的好朋友、世界生态建筑之父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所设计、坐落在亚利桑那州的生态城样板,可供其他国家借鉴。在他所设计的生态城中,每个人无需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大家可以使用所有的公共设施。这样的城市通过被动式太阳能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甚至所有人的需要,可以将所有制造业所产生的热能转化为可利用的能源;通过清除停车场,可以节约出大量的空间,并且在最小的土地上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增加了农业的可利用土地和大自然的土地。

我们称这种城市为“后现代城市”。这种“后现代城市”比现代城市更先进。

您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您是如何做出这个论断的呢?

我对中国的乐观态度,也许是因为我对中国了解得太少而造成的。但是,以上我所讲到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角色以及在缩小城乡差别中的示范者角色,都有助于我得出这样的论断。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刻意低估中国担任这两个角色的困难,但这两个角色对中国当下解决各种问题而言确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类似的问题上,有很多其他国家作了错误的选择。对中国来说,根本没必要去重蹈美国的覆辙。

现在有许多美国人总是抱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但这个体制其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中国高层领导发起关于什么是真正幸福的问题的全国性讨论,那么,我相信这种讨论方式在中国能以一种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方式进行,而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多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我甚至相信,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国

家做出正确的决策，有利于实现个人的幸福。中国可能会使城乡生活实现真正的平等；中国也有可能致力于构建一批真正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小型化城市，并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榜样。

当然，中国也有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中国也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不惜代价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放弃控制本国财政的优势，转而投靠国际银行体系，也可能旨在对邻国进行军事制裁并对第三世界进行殖民剥削。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做了，它就会像美国一样糟糕。我本人希望中国的做法会与此截然相反。

我相信，通过实现生态转向或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国能够为自身和世界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本访谈稿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山东建筑大学外语学院李玲博士翻译）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采访 | 任思蕴



爱德华·格莱泽

Edward Glaeser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获得过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格莱泽擅长以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城市发展,他撰写了大量和城市有关的文章,话题涉及城市的发展、种族隔离、犯罪和房地产市场等。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探讨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城市作为知识、理念和创新的传输中心所具有的意义。

比起肮脏、拥挤和混乱的城市,充满诗意和田园气息的农村似乎更适合人类居住。这一观念长期以来主导着很多人对生活的向往,包括卢梭和梭罗在内,许多思想家在城市和农村的选择上,也立场鲜明地倾向农村。

然而,爱德华·格莱泽却在他的《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一书中为城市申辩:城市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希望所在,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才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格莱泽认为,相对紧凑的城市生活不仅节约能源,也能降低对环境的伤害,而很多人向往的郊区生活反而会增加交通工具的使用、能源的消耗以及碳排放。在他看来,“居住在上海的高层公寓内,远比居住在绿树成荫的波士顿郊外更环保”。

对城市充满兴趣的格莱泽游走于全球各类城市——雅典、伦敦、东京、班加罗尔、波士顿、新加坡……他深刻体会到,城市相比农村的最大价

值在于，城市才能更好地维持人们之间的“亲近性”，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灵感和推动创新，从而促进城市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影响人类交流方式的现在，格莱泽也丝毫不担心城市的价值会被取代。他相信，连雅虎和谷歌这样能轻易实现远程办公的企业尚且需要一个实体的办公场所来保证员工的交流，恰恰说明，在充满信息碎片化和复杂性的互联网时代，面对面交流显得更加重要。

尽管研究的对象是城市，但格莱泽的着眼点始终是人。《城市的胜利》一书在罗列城市优点时虽然充满了经济学家“利益最大化”的研究取向，但是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作者在为城市大唱赞歌，不如说是在鞭策我们重视城市的管理以发挥城市的优势；看似在对比农村和城市的优劣，却时时在提醒人们要把人放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

城市究竟如何使人们更聪明、更富裕、更健康、更环保？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是否会陷入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问题的两难？城市的胜利是否意味着农村生活不值一提？

与其向大自然索取城市空间，不如加强高密度城市的管理

卢梭说过：“城市是人类的深渊。”在人类历史上，谴责城市、倡导回归自然的声浪确实不绝于耳。您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却提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最美好的希望。您为何会有此有别于传统认识的观点？

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绿色的植物、清洁的

水源和清新的空气。相比之下，城市里似乎缺乏这些东西。的确，在很多人看来，城市仿佛一团混乱，毫无乐趣。但根据我本人的研究，城市实际上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之为人的最大价值之一在于，人和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学习，而只有在城市里，人类的这一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从西方的发展中可知，城市在人类历史上一些“质变”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古希腊的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再到今天的Facebook这种新型社交形式，正是由于人们群居于城市，保持一种智慧密集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才使得借鉴他人的智慧成果变得更容易，思维也更加活跃。千百年来，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文明，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这与历史上东方的高度都市化不无关系。东方的城市对于推动当时文明的发展作用巨大，远远领先于同时期其余大陆上的农业文明。

城市的确有许多缺点，比如污染、拥挤以及不容忽视的犯罪率。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的贫困岂不是更看不到未来么？应对城市病的合理方式是加强对城市的管理，而不是消极指责城市的种种弊端。

拥挤、传染性疾病和犯罪等问题，是人们批评大城市病的主要依据。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激烈批评城市的无限扩张和人口过剩。他提出：要改变大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必须制止人口增长，制止建成区的不断蔓延，制止难以控制的巨大和不合理的“宏伟”。对此，您用了“城市比郊区更绿色”的论断给予应对。能否简要解释一下这一论断？

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能随时亲近大自然。公园、绿地、林荫道、河边步行区等，都是城市里美丽的风景。

我们千万别混淆城市和环境这两个概念。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正是人类保护环境的最佳途径。人们在相对“紧凑”的城市空间生活，住在较小的房子里，出行一般只需短途交通。由此，我们消耗的能源相对较少，对整个环境的伤害也较小。相反，如果我们居住在人烟稀少、森林环绕的郊区，每次出门办事，都有可能需要行驶很长的距离，这样反而浪费能源。在我看来，居住在上海的一个高层公寓内，远比居住在绿树成荫的波士顿郊外更加符合“环境友好型”的理念。

新兴经济体处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假设，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和印度，人均碳排放水平增长至和美国郊区的人均碳排放差不多的水平，那么全球的碳排放将会增长超过130%；而如果他们的碳排放维持在富裕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超高人口密度的香港除外），则全球的碳排放将会增长不高于30%的水平。由此可见，郊区虽然人口密度小，但是其人均碳排放才是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向郊区扩张建筑范围，还不如向高空扩张建筑高度。

您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难免会向自然索取空间，而城市本身又能够承受高密度带来的压力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人类应该纵向向高空索取活动空间。比起将人类的居住点散落在遥远的郊区或农村，整齐的城市高楼住宅反而会减少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

当然，高密度的生活会对城市产生压力，但是，城市管理是每个城市必须重视的功课。成功的城市管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新加坡

的城市管理就是一个成功案例。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一片贫穷的棚户区,而今天,它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在一个管理有方的政府的主导下,聪明人群在城市的聚集如何使创新和发展变得更有可能。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对教育、法治和基础设施的重视。另外,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也是向高空发展的典范,因此,这里虽然人口密集,但是却道路整洁,交通顺畅。

信息技术不断深化的年代,面对面交流显得更加重要

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使得城市变得更有价值。但是,互联网让人们得以在虚拟世界中点对点地便捷交流,会不会降低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呢?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新的沟通方式会不会降低城市生活的价值?

可能性不大。人类习惯于面对面交流已经很久了,生机勃勃的互联网至少目前并未改变这种形式。雅虎要求员工每天到办公室办公,因为即使在这样一个技术密集型企业,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依然是不能被替代的。和许多公司一样,谷歌实现远程办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该公司依然建造了名为Googleplex的公司总部,只有在建筑实体内,员工之间才能彼此靠近。早在25年前,技术先知们就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使面对面的交往,以及其必要的载体——城市,变得过时。对于这种观点,我过去不以为然,现在同样如此。并且,过去的20年对于城市而言是发展的好时期——以美国为例,西部城市又回归到继续发展的轨道,而东部城市也奇迹般崛起。

我所认为的趋势是这样的:信息技术深化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则提升城市的重要性,而绝不是减弱。因为城市促进了新知识、好点

子以及创新能力的回归。所谓近朱者赤，如果你可以与聪明人为伍，岂不是自身也会变得更加聪慧吗？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利好的原因所在。互联网虽然大规模增加了信息量，但是也带来交流的复杂性，人们很容易在信息的层层专递中迷失，因此，面对面交流才显得更加重要。

城市有时就像大学，为人们提供面对面学习的场所。或许有人认为，远程学习会对大学发展形成威胁。比如就我所供职的哈佛大学而言，课程的网络化、公开化是否会削减校内学习和研究的意义呢？我不这么认为。从这样一所生源和师资力量都很卓越的学校毕业的学生，总会有一些与众不同吧。

建立各种工业园和科技园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规划的思路。这在美国的城市发展历史上也是不鲜见的，并且被您称做“田园资本主义”（pastoral capitalism），您为何批评这种思路？

这种园区化的发展思路非常不利于保护创新能力。各种特征鲜明的园区总是把特长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削弱了不同特长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它把人的创新潜力人为地分隔开来。这样做会连带影响诸多的后续发展潜力。

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人，需要在处于城市生活的漩涡中心时，才能达到自我激发和迸发灵感的最佳状态。边缘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不利于激发他们的潜力，也剥夺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机会。技术创新更容易自然而然发生在有机的城市空间内，而不是发生在人为的工业、科技园区内。

美国著名城市底特律，其兴盛和衰落是同汽车制造业的产业转

移密切相关的。这一历史事实是不是表明,放眼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兴盛更大程度上同产业变革的周期相关?

产业变革的周期的确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没有城市可以永远依赖于某一产业而发展。产业最终会离开城市区域,转移到城市以外的低成本区域,有些产业甚至会向国外转移。

底特律后来的失败,不仅是因为汽车工业后来转向别处发展,也因为该城市在汽车工业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没有及时找到重塑自身的道路。美国北部很多老城市曾经都是制造业的中心。底特律和西雅图之间的区别在于,西雅图及时寻找到了城市发展的另一条出路,而底特律却没有。

能够顺利绝处逢生的城市一般都有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基础和创业基础。传统的技能确实是非常关键的。自1970年以来,有一部分北部的老城市重获新生,而有些却没有,这其中的变量就在于当年这些城市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比例。

创业基础也是必要的。纽约市就曾受惠于其在服装行业内的传统优势地位,这里曾经是服装行业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中心。在服装行业整体步履蹒跚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创业基础却使纽约市能在该行业找到新的发展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古老的工业城市都出现相似的衰退,而当底特律的衰退势不可挡时,纽约依靠服装行业实现了复苏,纽约的服装行业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发展更蓬勃。纽约市和底特律的区别又在于,底特律的发展是由三家大型企业主导的,而纽约市拥有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每个小企业主管理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企业主在外部情况发生变化时,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方向。

许多古老的城市后来都曾面临失去竞争力的威胁，它们先后采取了加大城市建设、巨额税收补贴等策略来应对城市的衰退。其中，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复兴功不可没。文化战略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文化战略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毕尔巴鄂是以文化战略重塑城市发展的最成功个案。尽管如此，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是受到了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博物馆的投入远远大于产出，并且，文化方面的投入在大多数时候是胜算不多的选择，因为文化设施往往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

当然，文化有其特殊的价值。成功的城市往往是注重文化和智慧投入的城市，因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投入会为城市发展助力。文化投入的最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或许能够扭转城市衰败的状态，还在于它为城市居民带来乐趣。

城市规划必须以人为第一位考虑因素

您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出：“建设是城市成功的结果而非原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大规模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的胜利，还是恰恰相反？对于当下正在着力推进城镇化的中国而言，您会进一步提出怎样的建议？

我知道，中国目前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投资规模确实很大。但是，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城市的存在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们为城市服务。城市发展的核心必须是为了有助于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留下功绩。

举个例子,上海的南京路是非常棒的城市空间,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密度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南京路本身以及街边建筑都是兼具实用性和娱乐性的,而不仅仅是作为城市的标志。相对而言,在穿过黄陂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标志性的高楼,这些当然也都不错,可是问题在于,附近区域在太多的绿化空间包围下,与周边区域分隔开来,这不但给行人的走动带来不便,也使得这一路段的街头缺乏吸引力。

中国的城市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上其他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我当然非常希望“城市的胜利”在中国也能尽快实现。中国城市发展必须时刻注意投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府对于城市发展的投入应该着眼于提高居住于城市里的人们生活质量。

您所说“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的城镇化也很有启发。问题在于:城市的居民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天的中国城市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当一座城市超过半数的居民为老龄化人口时,如何才能保持原有的竞争力呢?

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城市首先应该可以努力成为老年人的养老乐园。依然还是以上海南京路为例,那里总是有许多老年人在活动。

城市竞争力的保持要依赖于教育程度和创业基础。在教育发展方面,中国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中国需要再接再厉的是,必须思考更多的途径,保证小企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持续发展壮大的保障和动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要向年轻人张开怀抱。从中国城市的

现状来看,这不仅意味着房地产的充足供应,更意味着减轻年轻人安居的压力。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对于城市未来最重要的规划指引应该是社会学,而不是城市规划学,更不是城市经济学。问题在于,如今的城市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生意,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声音如何被城市规划者倾听呢?

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看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本人坚信,城市规划必须把人作为第一位考虑因素。我非常赞同雅各布斯的观点,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而非建筑物,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核心。而且,如果城市建筑在功能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那么这种建筑本质上就是失败的,不管它的设计和外观多么漂亮。

有两种力量能够推动城市规划者充分考虑和关注人的需求,即经济和政治。城市规划人员以及开发商等群体,能否在充分考虑人们预期的基础上打扮一座城市,这需要依靠政府充分利用各种调节手段。用市场的或者行政的手段有效实行干预,或多或少能够促进城市规划的以人为本程度。

如何处理城市人口密度高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两难境地吗?举个例子,对人口多、高楼多、地下空间面积大的上海而言,公共安全问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未必就会很危险啊,看看纽约就知道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纽约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各项城市管理都还

很欠缺。但是相对而言,纽约现在就是一个安全而成熟的城市系统。城市安全与否,与好的城市管理措施密切相关。

另一点很重要的是城市治安。如今可以利用高科技精准定位犯罪源头,也可以通过联网有效提高犯罪率较高区域的打击效率和能力。另外,如果能够加强执法的力度,城市的安全性就更值得期待了。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这与新加坡打击犯罪的力度是分不开的。

如您所言,既然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到城市里生活吗?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吗?您又如何看待农村生活?

当然不是!明智的国家会在城乡之间提供充分的选择。伟大的城市当然也应该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栖息场所。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信仰个人的选择和自由。热爱自然的人可以尽情享受自然或居于自然,习惯城市的人可以居于城市且提升生活质量,这种各得其所才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尽管如此,还是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强调城市的优势吧。

政府——即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以保证人们自由作出选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随便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还是居住在农村,而是说,政府应该先把城市打造得足够有趣、安全、舒适和成功,在此基础上,再由人们作出选择。另外,有能力的政府并不会去侵占农村的空间,而是会努力帮助人们发现城市生活的优势并适应高密度的城市生活。

莎朗·佐京

小型集市、传统街市更有人情味

采访 | 李纯一



莎朗·佐京

Sharon Zukin

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纽约文化与建筑的书写者,研究领域涉及消费社会与文化、美国与法国的经济新秩序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她因《权力地景》一书获得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研究奖,并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区与城市社会学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成就奖。

作为城市的使用者,我们知道城市并非本该如此、并非一日造就。但是,除此之外,很有可能现有的城市景观已经宠坏了我们的眼睛乃至感受——标准化的麦当劳成为熟悉感与安全感的来源,周末人人都去一站式封闭购物中心“赶集”,公共建筑具有唤起或压抑某些感觉的隐喻。类似于这样的城市故事,不仅在纽约,也在上海发生。

但是,莎朗·佐京认为,相比上海以政府决策为主导的模式,纽约的城市规划必须公私合作,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要搞清楚怎样建造基础设施来帮助开发商,如何帮助开发商获得土地,等等”,并且,“要以舒适原则来平衡权力和奢侈非常困难,纽约市的城市规划相当薄弱,对政治家来说,很难达到这种平衡。”不过,纽约在立法建造“廉租房”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美国城市”,佐京说,“纽约没有毁坏市里的公共房

屋,而是尝试修复这些公屋或社会住房。现在仍有大量居民住在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子里——而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地已经把它们都拆了。”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大街区,其居住环境往往十分糟糕,公共设备也不甚理想。不过,佐京展示了曼哈顿、布鲁克林一些商业区新出现的混合出租办法——“开发商将廉租房与面向市场出租的公寓整合在了一起。目前我们还不能肯定它能否一直这样良好运转下去。比如说开发商建了一幢房子,里面有600套公寓,它自愿提供比方说160套作为廉租房给低收入家庭;当然并非所有开发商都愿意这样做。作为回报,市政府会同意开发商建更高的楼,造更多公寓。”

还有一种模式也可以防止某些街区的衰落或者被放弃——“纽约市还在建设新的公共房屋,有很大一片街区,而且还有不少高价房靠近公屋。这在二三十年前不常见,如今却是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靠近公屋的房产,价格并没有受到影响。此外,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来开发住房,推进城市规划,将低收入者从市中心迁往别处,使他们不集中在一个街区。”

一些高附加价值物品的生产回归到大城市

您的《城市文化》(*Cultures of Cities*)一书,是研究文化与城市关系的代表作。您在书中定义的“文化”是复数,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要表达的是,城市中的文化始终是复数形式的,不会只有一种文化、单个群体的文化或是由国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城市是巨大且多样的,这是其最基本的定义。文化就是讨论城市多

样性的一种方式——不仅是人口的多样，还有活动、语言、风格和兴趣的多样。因此，在美国的城市里，文化有三种含义。

一是最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喝水、酒、茶还是咖啡，穿怎样的衣服，等等。二是指文化群体，也就是你祖上是来自欧洲还是美国，有时候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是一个混合的类别，界线并不明晰。我们称之为族群(ethnicity)或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不过这两个词有一些分别。族群是政府或其他人在看待你和你的群体时用的词；族群认同则是你自己由自己的来源选择定义的。

所以，当你来到一个人口相当多样的国家或城市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相对狭隘的国家、地区认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族群认同。比方说，有位来自安徽的移民，他来到纽约，但没人知道安徽在哪儿，于是他会说，我是中国人，不过最后他会说，我是亚洲人。从1960年代起，美国的人们发展出一种谈论族群的不同方式，即强调每个人都是美国人，因此人们不再会说我来自安徽、我来自中国、我是亚洲人，而会说，我是亚裔美国人。这就变成一种认同——族群文化在你迁移到大城市以后会变得不同。

文化的第三种含义，是作为一个产业的文化，这可以包括创意产业，以及新闻、美术、雕塑、写作、戏剧、音乐，等等，在大城市里，都会有一个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创意产业工作者有许多市场。这个产业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油画工作室，也可以是广告代理社或者报业集团。

大城市也是您说的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在《城市文化》里，您提到把文化视做“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通过符号创造

活动来开展文化产业。

确实,我很强调族群和文化产业领域真正的多方面发展,或者在城市里拥有金融中心和媒体中心,因为这是人们发展象征经济的地方——人们在市场里创造、交换符号。在上海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各种文化认同都获得多重市场的发展。然而,在族群意义上的文化也即作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创造性意义上的文化之间,必须努力做到平衡——就像人们在权力间寻求平衡一样,我们一方面追求奢华,另一方面也要求舒适。因为,在现在的城市里,每个人都风风火火、急着要卖东西,即便他们正在售卖的是一种文化——这样的城市对于想要追求良好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可并不舒适。我想,上海的市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上海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现在多少有点迷失,许多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族群特征的文化、作为传统的文化,在这个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里已经消失了,人们拥有的空间和时间都非常少,没法发展不同种类的文化。现代化通常都会导致单质化。

象征经济依赖于符号,那么除文化产业之外,人们是否也在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而这一般来说是上层建筑的基础?

多年前我在法国和美国研究产业变迁的问题。那时候我不相信经济可以脱离制造工厂而存在。但是正如全球化让我们看到的,生产、制造的场所已经变得不同,许多制造工厂都迁离出了城市。比方上海就不再有那么多个制造工厂,现在搬到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搬到越南。我们看到物质生产制造在地理上的变迁,而与此同时,一些高附加值物品的生产则回归到大城市。

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增长的产业就是食品生产,但不是那种生

产成千上万升牛奶的大工业，而是非常专门、有特色的食品生产，可能是一个人拥有一家小小的烘焙店，售卖时下流行的纸杯蛋糕。如果你看到这里有家纸杯蛋糕店，你就知道这地方是属于中产阶层的。因为纸杯蛋糕除了小孩子都喜欢以外，是一种有点精英化的小点心。手工制作的冰淇淋也是一个例子。

像这样的食品生产店家，20世纪时都搬离出纽约城了，甚至还有许多食品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现在，城市里开始出现想要自制食品的人，甚至还有关于都市农业的讨论——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人们可以在花园里自己种蔬菜。甚至还有建筑师和规划师在想像，是不是能建个人工生态塔，里面有土壤、有水，然后就能实现本地的食品生产。总之，现在一个普遍的趋势是，作为初级物质资料生产之一的食品生产，已经回归了城市。

纽约从未有过重工业经济——曾有过一些汽车制造厂，1960年代之前纺织业和印刷业在纽约地位较高，就像上海曾经也是纺织业重镇一样。但是因为地价昂贵，也因为工业逐步自动化，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两大产业的规模就越来越小。

那么，大城市是不是有一天会脱离物质生产呢？我认为现在生产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张了，人们都一定会认可这种地理上的变化。飞机、汽车、轮船还是要有人生产，但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走这个模式了——如果有许多人在先进技术生产领域工作的话。

大城市正是在允许新思想的表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资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手，它将消费主义推向全

球各大城市，这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各城市本身拥有的历史资源和地方性知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消费至上”和“娱乐至死”这样的信条。在您看来，有什么现实力量可以抵御资本对文化的无所不侵？

我坚信市场和集市 (market places) 是人们开展互动的基本空间。市场确实会发展出不平等，但我一直认为，空间，尤其是集市呈现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开展互动的非常有趣的地方。比方说联合广场公园，角角落落里有摆画摊的、有卖手绘T恤的。在纽约，本地企业受到鼓励，这样，许多人就不再喜欢去大型连锁超市了。他们会更喜欢小店，这样买家与卖家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更喜欢在农副市场买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和种苹果、豆子的农夫们交谈。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里的食品市场体系都像这样，我知道法国就不一样，法国人并不是可以直接在市场里面对农夫的。但是，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上，小店总是被迫关闭或被夹击包围——先是说要让这里变成干净、可控的空间，然后又说要有规模经济，于是就有了巨型商场。但有时候，这种发展反而让人感觉很糟，因为他们走进这些巨型商场，只知道要买东西，却并没有真正感受到亲密的、面对面的交流。这就让有些人转而再度支持那些个人经营的本地小店铺。在纽约，我们称这样的传统小店铺为“老爸老妈店” (mom-and-pop stores)，上海也有“夫妻老婆店”的讲法吧？我们这些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人，有时候其实不喜欢买那些大商店里的东西。

然而，这种亲密正是人们在超市和连锁店的大潮过后想追求的，所以看来还得要同时激励大商家和小店铺的发展，这点很有意思。集市是人们交换信息、甚至也包括交换时尚信息的重要城市空间。

比方说，我就是先去逛商店，看今年人们会穿什么，然后从中辨识出今年我想穿什么；而等到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衣橱里十年前的衣服现在重新流行起来。我想说的是，正是城市里的集市刺激了新想法的产生，刺激人们用创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新想法。那种同别人快速、有效互动的感觉，我想正是从广义上的集市而来。这和去公园这样的绿地空间，说我今天不是去做消费者、只是去放松身心不同——在小型集市、传统街市里，人们之间会互动，更有人情味地互动。因此拥有集市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的是，资本某种程度上也在固化不同城市空间之间的壁垒，比如，收入较低的阶层显然就难以进入高消费的文化艺术场所。您也提到说，购物其实是民主的一种幻象，人们好像能自由选择，但其实一些场所只开放给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

我认为，所有的公共空间开放给所有人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是娱乐的空间，也可以是给学习、节假日专用的空间，像“占领华尔街”也是这样的空间，人们聚集在一起表达异议和不满。我想，大城市正是在允许新思想的表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新思想有时候讨人喜欢，有时候则不是。但在历史上，大城市也只有鼓励多样性才会成长。因此，公共空间只要能鼓励多样性，任何形式都是非常好的。

我想，单个的人也在他们购物的时候追寻中意的东西。我们总是批评别人的购物状态，但从来不这么看自己——总觉得我们还好，我们不是受害者。我很少碰到有人跟我说“我是购物的受害者”。所以我想，确实存在一种所谓选择的幻象，把有能力有机会购物当做是民主的幻象。

然而，购物可以是一种大脑体操，训练我们怎样找到好东西——我们现在可再也不会出去打猎找肉吃了，而是直接去店里买。我们必须去买东西，并且感觉非常快乐，甚至觉得这是桩有创造性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在选择的时候都在力求达到一种平衡——你需要它，也喜欢它，而且恰好负担得起。如果能平衡这三者，你就会觉得快乐。当然，这种快乐仅指购物方面，自由跟这还是两码事。

社会学家也一样可以成为作家

您的著作《裸城：真实都市空间的死与生》(*Naked City: The Dead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的标题，戏仿了简·雅各布斯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而后者也已出版50余年了。能否为我们谈谈您的作品与雅各布斯作品之间的关系？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您看来，雅各布斯的这部著作给今天的城市社会学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什么？

这几个都是非常大的问题。简·雅各布斯已经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美国城市书写者，部分是因为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城市发展太快，正在失去其内在的灵魂和历史文化特质。

纽约的建筑在那时候已经被认为很高了，虽然现在有些楼比上海的小。对简·雅各布斯来说，走在纽约城里，就像现在人们走在上海街头的感受一样——高楼林立、灯火通明、车流不绝，甚至道路之上还有高架，这简直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设计者在想像未来城市时候的未来主义作品一模一样。简·雅各布斯非常反对这些，

她从美学和生理感受的角度来看这些建筑和街道，当她被这些毫无特征的宽街伟厦包围的时候，她心底里升腾出来的不适感和大家是一样的。我想，她对人性化城市的支持，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这也是她至今仍然大受欢迎、广受爱戴的原因。

而对于我，同样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认为社会学家也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来说，她的作品很有趣，她的写作很简洁。如果你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会看到她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在写作——她的书里没有脚注，也没有参考书目；她从交谈过的人里塑造出一个典型。所以，我想写这样一本普通人（比方我在读大学的女儿）可以读的书，也就是《裸城》，我努力写得简洁，用了很多释例而不是理论化的术语。可以说，简·雅各布斯对我在描述城市的具体环境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她对我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也对简·雅各布斯有所批评，所以我的书才起了这样的副标题。更准确地说，她是一名新闻记者而不是社会学家。她没有注意到创造出她欣赏的具体环境的那些社会因素，也从未顾及社会阶层或族群文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创造出某种实体空间。她也从来没有考虑不平等这一因素——对她而言，最大的敌人是政府的城市规划；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对于美国的城市尤其是纽约而言，最大的负面力量是私人资本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比政府要强势得多。我知道在这点上，上海远远走在纽约前面，地方政府会与开发商合作，建造新的城市空间和区域——这比我们美国的资本主义城市好多了。纽约市政府对私人开发商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在限定范围内，开发商才会不做彻头彻尾的坏事。

现在,我们在纽约也有两个和“新天地”类似的项目,也即政府同私人房地产商合作,一是在布鲁克林中心地区,还有一个在曼哈顿中城的西岸。这两个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旧得不能用了,需要重新规划。所以,政府必须拿到地,然后以低价给开发商,当然政府可以要求开发商遵守一些环境方面的法律,但这种合作关系并不强,我们的政府并不是这两个项目的出资方,这和上海或者其他地方不一样。

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许多城市都采取一种创意人才聚集区的组织形式,将画家、平面设计师、广告人和职业媒体人、信息和软件工程师等等集在一起,希望打造一个文化创意园区。把这类人员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中,就一定能确保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型吗?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什么?

在纽约,我们并没有政府规划的创意园区,而都是通过市场产生的,有点像上海莫干山路上艺术家们自己开出来的画室、画廊。纽约的创意产业都是通过市场的积聚力量自己产生的。我想,真正重要的是,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们有机会待在这些地方。像莫干山路这样政府不涉足的诱人地块,一定也对其他人群很有吸引力,于是就有一些人先到先得,然后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们负担不起,可能就搬到郊区。在纽约,他们都搬到布鲁克林。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涉及纽约城里创意社区在地理上的变迁,发表在2011年大阪出版的《城市文化与社会》期刊上。一般来说,纽约的艺术家聚集区都在向东迁移。

政府几乎不参与创意和创意产业本身,在这一点上,美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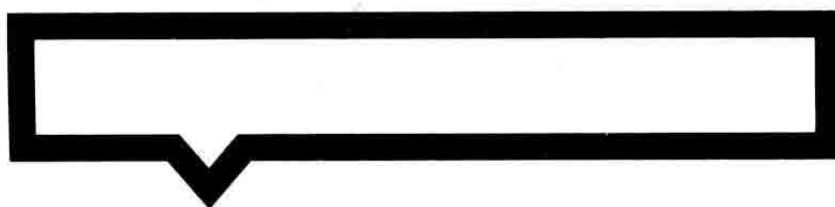
其他国家都不同。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规划创意园区的国家。我知道，现在上海有许多创意园区，但这些园区到底是否真的富有创造性，还不得而知——我是说，也许今年还行，但明年会怎么样呢？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

世界·中国

无极化世界里的中国身份



俞可平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采访 | 李扬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多年来在创新社会管理、改善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以不拘陈见的思想和观点广受各界关注。

多年来，俞可平一直倡导“善治”，认为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实质是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合法性、透明度、责任、法治、回应、效率、参与、稳定、廉洁、公正，这些被他列为善治的十个要素。他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很自然地给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政府需要不断调整其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俞可平不仅是一位思想者，也是一位行动者和实践者。2000年，他倡导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并出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这一学术性奖项的初衷之一，就是在中国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客观的、可以操作的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体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内容不仅涉

及依法行政、责任政府、行政效率、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社会管理等政府公共性改革,而且还广泛涉及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等制度改革,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与变化。

未来 30 年的改革重心将转向社会政治领域

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社会治理问题。在您看来,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为什么在当下特别受到重视?

十七届五中全会前,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经预言: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那么未来30年改革的重心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任务将变得更加突出,受到更多的重视。为什么这样?因为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和最紧迫的问题,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依然严重的腐败特权、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单靠经济的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一些调查数据表明,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经济表现相当出色,我们成功地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依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民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按理来说,经济增长了,民生改善了,人民群众应当对政府的服务更加满意了、幸福感更强烈了。但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这最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仅仅靠经济发展远不足以让人民有幸福的生活,让国家能长治久安。

目前的形势发展和社会格局,使得我们的社会管理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挑战。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全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哪里?

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例如,居民的安全感缺失了。我们小时候上学,几乎没有家长接送的,现在哪个小学,甚至中学,一放学校门口没有等待接孩子的家长?吃饭担心米有镉,吃菜担心有农药残留,喝奶担心有三聚氰胺,住进新房担心有装修污染,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遇到的挑战既广泛又严峻,这些挑战包括:社会公正、公共治安、社会稳定、社会诚信、利益协调、社会保障、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社会救助、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社区治理,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等等。

全新的挑战,要求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要常变常新。在您看来,当前我国社会中的社会管理创新难点和关键何在?

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了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开始解体,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传统的单位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户籍制度开始变动,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导致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日益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我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特别是权益保护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公共安全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应

急管理机制、基层治理机制、社会自治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至于说到难点和关键,在我看来,在于如何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静态稳定(以堵为主)与动态稳定(以疏为主),等等。当然,从理论上说,它们都应当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矛盾的。但我们切莫天真,以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了。事实上,重要的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怎么办?

强调社会管理不能忽视社会自治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您一直是倡导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您能否简要解释一下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

社会管理是政府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它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一体之两翼。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社会管理忽视社会自治,会造成公共权力过度扩张,损害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反之,片面强调社会自治忽视社会管理,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失控,影响社会稳定。因而,我们既要加强社会管理,但也必须推进社会自治。

我们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真正在社会领域实现善治,既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更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治。随着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推进,社会自治的功能应当得到更大的发挥。因

此,近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中央既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又强调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扩大基层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强调社会管理时,十分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社会自治的作用。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也与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以往政府在社会领域包揽一切,往往造成政府不堪重负。现在,在推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中,政府应当有哪些方面的角色调整与转变?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事务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越来越繁杂,政府绝不可能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那样,不仅是不堪重负,而且也无能为力,得不偿失,尤其是不符合人类社会民主治理的根本方向。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因此,党和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和职能。要更多地从传统的一些管理领域中超脱出来,扩大公民自治的领域;要转变管理的方式,努力从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维护社会稳定,要从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

政府角色调整和转变的目标,是不是就是您一向倡导的“善治”?

对,我所说的“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或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良好合作。我一直强调,要特别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因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管理，不是无组织、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参与。社会组织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经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超过40万，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300万。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应当相互对立，而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健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

公众意识提高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自治有赖于社会公众的现代意识。在您看来，目前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公众有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几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善政是善治的关键”。但是，从长远看，如果还政于民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那么，公民的作用必将变得日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意识和素质决定着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于社会自治来说就更是这样，因为社会自治的主体就是公民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民意识和素质方面，最重要的进步是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大大觉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

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多数老一代人还在用传统的民本政治价值来评价现实政治进步时,多数年轻人已经用自己的民主政治价值来衡量政治发展了。例如,老一代人如遭受冤狱,通常会在昭雪时对党和政府千恩万谢,但年轻人发生类似的情况,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向政府索赔。对于公民身上存在的问题,大体说来,对于改革开放前成长的那代公民来说,主要还是权利和法治意识要继续增强;而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公民来说,主要是责任和义务意识要相应提高。

应当看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的现状;一些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士,在网络特别是微博上很投入,但对于政策法规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却不够热心。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的网络政治有许多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这么多的网民关心政治,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近年来多数重大的政治事件是通过网络形成的。其次就是你提到的这种情况,低层参与的热度高,“草根服务草根”。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制度性的公共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大家只好挤到网络上来。其次的一个特色是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开始向社会公示,让公众参与。如推行政策听证制度和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民主决策方面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毋庸讳言,许多制度尚不够完善,或流于形式,或缺乏法律保障。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责任首先在政府。党和政府要努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性渠道,有序参与少了,无序参与就必然增多。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的制度机制,使听证、公示、咨询、责任等制度真正发挥实际的效果。当然,对于公民来说,也要更加重视制度性的

参与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曾经备受学界关注。在您看来,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整个社会是否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社会的意识?

全球化时代也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这是贝克和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全球化意味着风险传播和扩大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但这与政府管理创新的风险还不是一回事。任何创新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政府创新的风险可能会更大。因为在我国现实政治环境下,政府创新的风险不仅仅是政策失误所导致的人民利益受损,更大风险在于可能犯“错误”。所以,政府的改革创新虽然意义特别重大,但却尤其不容易。一方面,我们要想方设法将改革创新的风险降到最低,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创新方面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一定要营造宽容宽松的环境,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我倡导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主要目的也在于此。

日本大地震以及它的巨大破坏力震惊了世界,更是让一贯防震防灾意识很强的日本社会始料未及。您如何评价震后日本整个社会应对这次灾难和危机的表现?从社会管理角度看,日本大地震可以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时,我太太正好在那里访问。当时国内的亲朋好友很着急,但她告诉我,她在日本根本没有感受到恐慌,也没有国内友人所想像的那种“地震历险”感觉。机场、车站虽然突然拥挤,但人们照样文明排队。前些天国内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抢购碘

盐的现象,实在是匪夷所思。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反思日本民族在这次特大灾难中的表现,这种反思非常有助于我们民族的进步。我认为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日本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些启示:第一,社会的良好秩序应当更多依靠社会的自治和自律。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第二,现代化绝不只是GDP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制度的完善和成熟。第三,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善治的基础,国家发生危机时,这种合作尤其重要。第四,国家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紧急事件一旦发生,这套机制就能自动运行。“临时抱佛脚”必定事倍功半。第五,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核安全战略。

乔舒亚·库珀·雷默

国家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采访 | 田晓玲



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清华大学访问教授。侧重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的研究。2004年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被称为“北京共识之父”。

乔舒亚·库珀·雷默如今已经是西方世界政商学界著名的“中国通”了。早在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此后令其声名鹊起的新概念——“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一概念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试图借此来高度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共识”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代名词，并且引发了学界和舆论界对相关话题的热烈讨论。

他的另一个研究重点，知晓率可能并没有那么高。实际上，几乎在提出“北京共识”的同时，雷默开始研究中国国家形象问题；在“北京共识”提出一年多以后，他撰写了报告《淡色中国》(*Brand China*)，系统论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

《淡色中国》出版后的这几年间，“国家形象”这一概念也日益为中国政府和公众重视、熟

知。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有关中国的话题在西方世界十分流行——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11年5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就显示,21世纪的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排位第一,迄今为止相关新闻已经被全球纸媒、电子媒体、社交网站等播发约3亿次;另一方面,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进而主动自觉地借助多种手段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到中国国家形象片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从姚明、刘翔到李娜,外国公众到底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单向度的宣传路径,走到了今天双向互动的时代。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形象本身,还是传播方式方法,中国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正如雷默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国家形象的塑造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在互动传播的另一端,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外国人,还是中国形象的研究者,雷默的独特观点,都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维度。

我们不能通过推销产品的方式来塑造中国形象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命题的?继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之后,您又提出了“淡色中国”的说法。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准确地理解您所说的“淡色中国”?它是“中国不确定论”或“中国复杂论”的又一个新版本么?

其实,差不多在提出“北京共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研究中

国国家形象这一命题了。因为我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实际上并不怎么理解中国，尤其是美国不理解中国。在我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应对这个挑战之前，我必须首先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中国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比如说“和平崛起”；如果人们能够理解中国，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通过一系列的调研，我发现，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的理解并不充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仅不理解中国，而且还不信任中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信任是国际事务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对于中国来说，获得更多的信任可能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您的书 *Brand China* 的中文版被译成了《淡色中国》，但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Brand China* 其实应该是“品牌中国”的意思。为什么您没有选择直译呢？

到底叫“淡色中国”，还是叫“品牌中国”？我的依据在于，我并不想仅仅讨论“中国品牌”问题，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中国究竟做了些什么，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国家。我喜欢“淡色”这个提法，不同的人可以从中读到不同的含义，这个词不是很强势，但是非常开放，同时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较深影响，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要想给别国留下良好印象，最强有力的办法就是保持开放姿态，而不是硬性推销。“淡色中国”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能通过推销产品的方式来塑造中国的形象。我并不觉得强买强卖的方式适合中国。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非常不一样，建立信任的方式也会非常不一样。

距离您当年写《淡色中国》至今又过去好几年了，您怎么评价最

近一段时期以来的中国国家形象推广？

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就中国形象而言，还是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印象还有着负面的成分；第二，是中国对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通常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非常不一样，比如，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国家非常可信，但是其他国家可能并不这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你不了解别人会对你的表现作出什么反应。

中国人对自身国家的认知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像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现象，还是在其他国家身上也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这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不一致的现象。在对美国进行研究时，我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说明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身上的特殊现象。

但是，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之间的差异，在中国身上特别明显。我们的调研也涉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形象问题；在每个国家几乎都存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殊异的情况下，这种殊异在中国身上似乎特别明显，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非常不同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形象一直变化并不奇怪

仿照您调查时的做法，假设让您用五个形容词来描述当下的中国，您会用哪些词？

我们在调研时，大致列出了40个形容词，让受访者从中作出选

择,这样的调查很难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访问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具体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并不是很合适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经常生活在中国。

一般而言,西方世界的人们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必须先设定好目标,然后必须保持行动和目标的一致。中国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它甚至存在很多相互对立的因素,存在一些冲突当然很正常,但是这也给人们理解中国带来了困难。举例来说,就信任度而言,我们会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高度信任感的国家,还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实际上,如果你根据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得到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一方面,在很多领域,中国是有很高信任度的,人们相互之间是互信的。反过来说,你不能想像在法制还不那么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互信,怎么能够连续增长30多年?但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不能相信他人,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这一点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矛盾,让人很难理解。

那么,假设让您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代表中国,您首先会想到哪些?龙,还是熊猫?

我不觉得有哪种形象是比较确切的。当人们谈到中国形象时,大家经常提到的龙和熊猫,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有问题的形象,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会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我想说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认同中国是充满活力的,但与此同时,我很惊讶地发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不管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还是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没有一点概念。

我的看法是,没有任何单一的形象能够代表中国,因为你知道中国既有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甘肃这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方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不可能找到单一的形象来说明。

不久前中国的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播放,您看了么?如果让您来策划,您还会放入什么元素?在您看来,美国老百姓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

我看过这部中国国家形象片。我不是导演,对于应该策划什么元素并没有非常确切的答案。但是,通过时代广场的展示是不可能展现出中国的全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活力。我们必须明白,有时候可能在电影院看一部类似《非诚勿扰》的电影,更能够使我们理解现代的中国。

美国老百姓只是想知道,中国会不会打破固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将是美国非常忠诚的朋友,不会触及美国的利益吗?我觉得这些内容很难在一部短片里面完全表达出来。

您曾经提出,中国应该设计一整套与其现状和未来相适应的观念、标识、品牌和说词来展示自己,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此次中国形象片的效果怎么样?

老实说,中国不是一个汉堡,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这类形象片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它能解决全部问题。

事实上,在国家形象问题上,我不认为存在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的形象也在持续变化。所以,我对此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评判。我认为,重要的并不在于我们要在一两年的短时间里就解决所有问题,就让全世

界都知道中国是什么、“淡色”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能够真正理解“淡色中国”里包含的不确定性,就已经很好了。

中国在全球许多地方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展示自身形象的标识或品牌?您对孔子学院的建设会提出哪些建议?

我不确定自己可以提出什么建议。建立孔子学院基本上是件好事。同时,孔子学院只能接触一部分人,人数可能并不多,而且,中国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他们接触中国,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可能也会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确是非常遥远的。我们知道,人们一般不会喜欢非常陌生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建立孔子学院,而是说,我们对孔子学院能够起的作用应当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衡量和预期。值得注意的倒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开始理解中国,并且开始学说中国话了。

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误解

与当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比,西方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否略显不够,并且还存在着巨大的分化?

我认为西方社会的人们缺少很多知识,他们对中国有非常多的不同看法,其中很多并不是基于事实之上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的确存有歧异,当然这也很正常。

我们的确看到了外部世界仍旧充满着对中国的不信任,比如,德国国防部长抄袭,媒体竟说他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法国最近出

版的两本书《中国的霸权企图》和《中国的傲慢》，也表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解显然太深。您对此怎么看？

出现这样的误解，原因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比较新的角色，人们对其并没有很多的了解，同时，其变化又非常迅速，人们理解起来也就很难。中国崛起的确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新的变化，自然也很容易引发一些负面看法。我认为短期内是不可能快速消除这些误解的。我们的处理方式包括向人们展示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时表明中国致力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等等。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由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变化，对世界认识今天的中国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在您看来，除了中国要更多地赢得西方世界的信任之外，外部世界对更好地理解中国应该做出哪些相应的调适？

是的，理解中国需要很长时间。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非常不一样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也非常不一样。长期来看，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难以说什么优劣之分，但是短期而言，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确实造成了一些障碍和误解。

外部世界应当持续地投资中国，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来。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各种政策都不能过于简单化，不应当仅仅聚焦于一些非常狭窄的利益和议题。

您在《淡色中国》一书中提到，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资本”，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您是怎么定义“声誉资本”这个概念的，它和“软实力”是一回事吗？一国又如何来积累自己的“声誉资本”呢？

我说的“声誉资本”，指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国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建立起来的信任感。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声誉只可能通过长时间受人信赖的表现来获得。相比之下，“软实力”则是一个深奥且带有欺骗性的概念。我并不相信真的有所谓的“软实力”存在。我知道很多人相信“软实力”的存在，但我不认为真有什么证据能表明它是存在的。考诸历史的话，我们很难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证明“软实力”真的发挥了作用，相反，倒是有很多例子表明所谓的“软实力”并没有能发挥用来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有很多相似性，但看看日本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中国做的事情，如果说真有“软实力”的话，这一切就不该发生了。

所以，“声誉资本”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它建立在“信任”这样的概念基础之上，内容涵盖了一个国家有多少信任度、有没有实践自己的承诺，等等。

随着全球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形象的传播手段和渠道越来越丰富多样。在您看来，除了国家形象宣传片、孔子学院等国家公关手段外，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还应该倚重哪些形象传播手段或渠道？

坦率说，国外公众接触中国的渠道并不多，尽管中国话题非常流行和受欢迎，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渠道仍旧是大众传媒。这就是现状。我们相信，大众传媒的报道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事实的。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国家形象是国家现实的一种反映，试图脱离现实去创造形象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在我看来，国家形象的基础仍旧是一国的实际行动，如果言行一致、值得信赖，就可以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杜赞奇

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

采访 | 田晓玲、祁涛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师从孔飞力，以研究中国近代史成名，推出过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杜赞奇被认为是继费正清、孔飞力等人之后美国汉学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着力研究社会发展、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与社会理论领域作出了学术贡献。

今天，亚洲经济总量已经占全世界的30%以上，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亚洲已经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

在近期的双边及多边互动过程中，亚洲各经济体的领导人常把目光聚焦到亚洲各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及彼此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上。伴随着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经济体的快速成长，亚洲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上扮演何种政治经济文化角色，日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连“亚洲身份”也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被反复加以讨论。但是，作为整体的亚洲毕竟没有能够像欧洲一样，找到合适的路径来切实推进自身的一体化进程，“亚洲身份”的内涵及其认同依然处在模糊状态。作为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概念，它需要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确定自身的定位，塑造自身的价值，从而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亚洲身份”需要人们从社会文化层面加以分析解读，许多具有亚洲背景的国际学者都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他们尝试从文化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尤其关注亚洲一体化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亚洲同西方的关系问题。

近些年，汉学家杜赞奇的视野就转向了对亚洲诸多问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尤其关注亚洲一体化以及亚洲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中的主导变化是亚洲的崛起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您对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有何判断？全球一体化进程有加速的可能吗？

我不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存在什么问题，当然，有些地方的确存在保护主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全球化的基调已经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来支配全球化进程，类似印度和巴西这样的人口大国，也有能力去塑造全球化了。

会有国家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撤退吗？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主导性的变化。我认为，主导性的变化应当是亚洲的崛起，当然还包括其他“金砖国家”，但主要是在亚洲。对于这些亚洲经济体而言，它们需要全球化的世界，因为其资源、财富和市场都需要在全球范围配置。对这种主导性的变化，西方国家能做的就是适应。我不认为西方国家会变得更加偏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这并不是主导性的变化。

您曾经谈到,现代普遍主义被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消解了。民族主义消解普遍主义尚可理解,而消费主义难道不是在传播一种普遍主义么?

消费主义还不是我所说的“超越的”普遍主义。我对“超越的”普遍主义更感兴趣,消费主义只是一种直接性的满足,而“超越的”普遍主义则需要从所有国家,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特殊见解。

若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这种“超越的”普遍主义是否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划分?

我的意思不是指国家政府将会消失,也不是指会出现一个全球政府。我是指会出现很多的主权共享,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会有不同的治理结构。

由于全球化的推动,资本在全球各地越来越烙上了文化的色彩,比如您所分析的硅谷案例。但是在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似乎发现,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印度的高科技企业,全球化似乎进一步强化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断裂。那么在当下,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与精英文化相抗衡呢?

我认为,今天,在政府组织之外,希望就在民间社会,有很多技术可以为民间社会有效使用。比如在印度,非政府组织能有效帮助有困难的人,他们组织了媒介网络,称做“声音网络”,这些人很多都不会写字,但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用手机打电话向NGO求助,NGO会去核实求助的真实性,然后把相关信息放到网上,让相应机构前去援助。这是科技能切实弥补穷人与精英之间鸿沟的一个案例。在我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工人阶级运动之后,我们便没有为了穷人的社会运动,我们没有“超越的”普遍主义,所以,我认为希望就在于人们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这些社会组织总存在于人口众多的社会之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整合社会中的穷人,那么,伴随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人就会被边缘化。

但是,民间社会有时候不也是被便捷使用高科技工具的精英把持,至少是被中产阶级把持,而非那些穷人?

有时候,穷人也可以利用这一点。科学技术在我看来不是完全中性的,有些科技可以给穷人带来好处。当然,如果你不识字,完全是文盲,那么也就很难去使用这些高科技工具了。但是仍旧有很多人积极参与到民间社会中去,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但他们同样积极参与帮助别人。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引导这些积极性,这是我期盼的“超越的”普遍主义的目标。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这种“超越的”普遍主义,那些民族主义、消费主义都有自身的局限,所以都不能实现超越和创造。

穷人的热情会不会被其他一些力量所左右?

对民间社会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给予穷人以能力,让他们有能力来激发出正确的志向。问题是先要有一群人受到激励来投入这件事情,然后才是给予他们以能力。

当下的现代性已经不单单是西方的现代性了

印度的知识分子普遍推崇甘地,是因为甘地的反殖民化姿态。

面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知识分子又该保持怎样的姿态?

我认为,今天印度最成功的政治团体,是那些能够支持伟大进程的人们,而不是被政治上的一些小恩小惠引诱的人们,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甘地的社会主义主张。以现代方式来整合“超越的”社会理想,是非常有趣的。在印度,确实有一些人真心为了社会的进程着想,而不是成天想着自己要这要那。

后殖民主义是近些年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印度学者对此非常关注。这是否同你们印度出身的国际背景有关系?

对,这种联系非常紧密。这样的背景对中国而言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印度、阿尔及利亚这样有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则会促成很多的思考。这是一种丧失自身文化之后的感受,而文化则意味着你的思考方式,决定着你的思考价值。我们曾经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二等的西方人,这就是我们要斗争的原因所在。在中国,你们一直保有自身的文化和语言,即使有些方面你们非常西化,但你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如此清晰地对待后殖民主义这一问题。我们一定程度上还丢失了自己的语言。

所以,像您这样的学者会不会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在印度民众中也普遍存在么?

某种程度上,我算是生活在矛盾之中。我的历史逻辑来源于后西方的现代性。现在现代性更加具有全球性了,西方不再能定义现代性了,现代性被其他非西方国家定义。这仍然受益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毕竟,我们都认同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观念。

上面所说的这种矛盾在印度民众中影响要小很多,我觉得它对

知识分子更有针对性。

有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仅仅停留在第三世界的经验层面上，并没有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有力的批判。对此，您怎么看？

问题在于，后殖民主义关涉的是身份问题，以及平等和发展之类的问题。当人们特别关注自身的身份问题时，自然就会远离资本主义制度这类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后代，我们接受平等的观念，需要平等的机会，这类观念在非西方社会或前现代社会是没有的。

后殖民主义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陷阱：如果你完全拒斥西方意识形态，那么你怎么去思考平等？因为平等，包括人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本身就是西方启蒙运动的观念。你可以说现代社会体系不公平，为什么富人那么富有，而穷人那么贫困？但是，每个人需要持有相同的思考起点：那就是每个人都要拥有公平的机会。这个起点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我的意思是，后殖民主义需要或多或少地接受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思维倾向就是：拒绝启蒙，仿佛启蒙运动完全错了。这种极端倾向不能接受。诚然，并不是说我们要全盘接受启蒙思想，因为启蒙和现代性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需要我们对它持有批判性态度，这种批判角度可以来自非西方世界。当下的现代性已经不单单是西方的现代性了，后殖民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方法，人们可以提出很多替代性方案。

应当推进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直接了解

您最近一直在从事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我们感兴趣的

是,您是从什么角度开展这种比较研究的?

这两个国家有很多截然不同的维度,我要力图推进的问题研究,可能是两国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看印度,以及印度看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性社会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西方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国家,我们所用的概念都是西方的,所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概念都来源于西方经验的一些概念。中印两国应当推进彼此之间的直接了解,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亚洲其他国家也应当如此。因此,我们开展了很多项旨在推进亚洲国家彼此之间了解的研究。

有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研究,许多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比如,梁漱溟先生就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社会属于三种不同文明类型,西方是外向侵略型的,中国是平衡型的,而印度则是追求内在型的。

我觉得这类比较可以不用再进行了,这是非常宏大的总体性结论。我们要对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关系类型、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加以比较。纵观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很少有什么是同外向或内向型的精神取向相关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国家、政府组织和社会等因素有关,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相对而言,更多的印度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了。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更多地在谈论中国文化的自觉性,印度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您看来,在强调文化自觉的同时,又该如何避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的基础仍然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在开始

建构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做相同的事,也就是创造现代化,构建制度、产业、教育以及人们的观念。民族主义是随着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观点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就是将自己的文化看做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拥有自己的领土,而确认领土所有权的依据在于独特的文化。这是民族主义开始兴起的原因。

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的全球性词汇,从这些全球性的词汇中,我们却很难再看出以往那些民族的特殊性了,一切新文化、新时尚、新音乐的产生都是如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之所以还会出现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对全球化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带来了全球化的抵抗,从而去努力保护自身文化独一无二的身份。在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面临的问题,也是如何在西方化过程中维护自己民族身份的问题。你要有自己的身份,你不能失去自己的身份。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说,人们总是会在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摇摆;但是我认为,这种摇摆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更大的经济问题或社会文化问题。我发展了他的一些理论,在我的一些书中,我提出,要有更多的机制、观念去认清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需要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性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针对现代性问题,亚洲各国需要重新思考重塑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应当认清,原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出现了很多问题。民族国家框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但它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现在很多富有国家掌握的资源,实际上都应该是全球所有的,但是,在全球资源流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制,导致水资源、石油资源等为个别国家拥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需要国际层面

上的协同行为,但是目前来看,所有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机制,这也是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维度。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各国政府,而是要认清,谁可以来治理,多少主权能够共享,如此等等。

您还在从事有关亚洲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研究这一问题的?亚洲一体化进程会比欧洲一体化相对更容易一些吗?

首先,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亚洲的一体化正在进行。我写过两篇文章,发表在2010年前后的《读书》杂志上,来说明亚洲经济正越来越相互依赖。这个问题为什么吸引我?首先,我来自亚洲,也一直在研究亚洲历史。在过去的200年中,亚洲由于与西方的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此之前,由于儒家文明的联系、经济上的往来等积极的资源,亚洲一体化已经有了其历史渊源。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亚洲一体化和互相依赖的存在,也要充分意识到其中充满着冲突。我们相互了解越多、交流越多,就越能够避免冲突的出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媒体上似乎并不十分友好,即便如此,两国仍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推进,应该认识到我们之间多么需要贸易往来,需要发挥历史潜能。如果让人们只是接受民族主义的立场,那是会出问题的。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

至于说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是否比欧洲更容易?其实,看看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亚洲一体化进程也非常不容易了。我不希望在欧洲发生的事情也在亚洲重演。我们需要不同层面的互动,包括领土方面、经济方面、技术文化方面甚至环境资源方面,所以,亚洲一体化进程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正因为如此,大家对

一体化进程的认识以及彼此之间的尊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汉学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费正清，其后就是您的导师孔飞力，第三代研究者则包括您和裴宜理等人在内。如今，您从美国搬到了新加坡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您不再专注于汉学研究了？

不是这样。我现在不再直接或单独聚焦于汉学研究，但是我仍旧在指导一些在芝加哥的学生做相关的中国学研究。当然，我的确找到了一个自己更感兴趣的新领域并投身其中。中国是亚洲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我仍旧对中国的发展很感兴趣。我在全球各地四处讲演，这些讲演不仅仅关涉中国问题，还涉及其他内容，比如说“超越性”、“普遍主义”等话题。中国学研究必须更加跨越国界，即使你研究的是中国的内部机制问题，你仍旧应该关注它与外部的关系，尽管有时这些内容并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确实存在。

黄仁伟

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无极化”

采访 | 杨逸淇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著有《美国西部土地制度的演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合著有《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国家主权新论》。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圣茹斯特 (Saint-Just) 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圣茹斯特只活了短暂的28岁，他没有看到之后的19、20世纪发生的巨变，更不可能预料到21世纪前10来年发生的变革。

已经过去的21世纪前10来年，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的历史还原法，我们大致可以记下这些词汇：恐怖主义与单边主义、金融杠杆化的狂飙突进与泡沫破裂、经济衰退与债务危机、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倒退、中东变局、金砖国家崛起、世界权力从主权国家向民间和社会媒体转移、财富两极分化与中产阶级的抗争、生态危机加重与环保运动的此起彼伏，以及“历史终结论”的时兴与自我修正、“软实力”概念喧嚣

过后“巧实力”概念的凸显……可以说，世界的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波谲云诡。

黄仁伟是“中国和平崛起”重大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早在2002年，他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展望未来，黄仁伟认为，今后10年，中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能力培养的过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个适应中国、心理调整的过程。经过10年的时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责、权、利”都会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黄仁伟认为，世界将来的走向是出现一批比多极化还要多的“极”，将是“无极化”。各个地区内有一个大、中、小的权力结构，不同地区之间结合成世界范围的大、中、小结构。世界依凭这样一个结构一步步走向稳定直至和谐。

我们可能高估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负面后果

未来10年，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崛起进程会否真正被扭转？

以10年为期，我们尚不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因为西方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已经有三四百年了，新兴国家真正的快速成长还是近20年的事情。单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20%，西方国家约占65%。即使是一半对一半，10年内也做不到。最主要的是，对新兴国家而言，国际体系的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就是所谓“软实力”的崛起，要比经济总量的赶超时间还要长。但是，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的影响力在上升，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从几个方面可以看清这个趋势。

首先,西方财富出现了负增长趋势,其自身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自身的消耗,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欧盟的债务等于其GDP的95%,美国的债务是其GDP的100%,日本的债务是其GDP的200%。从中长期来看,正面预测最多是债务增长放慢一些,坏的结果是债务增长大大快于经济总量的增长。

其次,很可能出现了一个“零增长”的西方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其增长都缺乏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方经济的“日本化”。在过去20年里,日本经济的特征就是“两个零”:零利率和零增长。如果未来5—10年西方经济也呈现这两个特征,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病”就会在整个西方蔓延开来。

第三,如果前两个问题得不到改善,那么整个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要出问题。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项保障是西方社会在“二战”后保持稳定的根本条件。

我认为,未来5—10年内,上述三方面的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未来10年,美国霸权会否终结? 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否促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所谓“守成大国”就是霸权国家的代名词,真正掌握世界主导权的大国就是霸权国家。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能守住并稳定保持世界霸权的国家只有两个:英国和美国。这两个霸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英国霸权的核心是其全球殖民体系。美国霸权的核心有两样,一是由盟国军事基地体系构成的军事霸权,一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而且军事霸权也是由美元霸权支撑的。

英国霸权力量在“一战”后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终结。

原因就在于“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导致英国殖民体系瓦解，英国霸权由此彻底告终。

同理可推，美国的霸权取决于它的盟国体系和美元体系能否保持。小布什的单边主义一度使美国的盟国体系发生动摇。现在美国推行“软实力”、“巧实力”，单边主义稍有收敛，盟国体系也稍微稳定。如果美国坚持搞军事单边主义，盟国就会逐渐脱离它；如果美国滥用美元的信用，无限制地量化宽松也会动摇美元体系。可见，动摇美国霸权的最大因素是美国自身的政策。

德国、日本都挑战过英国，前苏联挑战过美国，都没有成功。英国也好，美国也罢，霸权盛衰的原因在于自身的体系结构。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就能够解释所谓“守成国家”和“改变现状国家”之间的关系。所谓“新兴国家”的主要任务不是挑战美国，它们的主要力量不是改变现状，而是适应国际体系，在此过程中对国际体系进行修正。这个体系是否会出现真正的突变，取决于这个体系的主导者本身。当它不能维持时，体系自然就变了。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和取代它，这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如何避免犯历史性的错误。所谓历史性错误有两点，一是犯错误者自己意识不到正在铸错，一旦意识到已不可挽回，如前苏联解体、英国殖民体系崩溃；二是犯错误者往往力量大到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

未来10年，美国的“战略再平衡”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前一段时间，我们高估了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或者重返亚洲战略的负面后果。我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是“以进为退”

的一种策略,又是“以军事为外衣的经济战略”,或者称“披着安全外衣的市场战略”。这两条是被很多人所忽视的。

首先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要撤出中东,摆脱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负担,往亚洲走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由此带来了在亚洲范围内针对中国力量上升的平衡。可见,这首先不是针对中国的平衡,而是撤出中东的需要。其二,在整个西太平洋范围内,美国把亚洲国家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到第二线,在第一线增加亚洲国家内部的摩擦。其三,当亚洲国家在第一线内部摩擦增多的时候,它们的安全需求提高了,就会更加依赖美国的保护,美国就获得随时进入亚洲前沿的通道。其四,当亚洲国家绑在美国防御体系上的时候,美国就要把亚洲国家的市场也绑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上。美国抛出的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要求亚洲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全开放,但是美国在商品贸易上对亚洲国家实行壁垒政策。这明显是区域一体化中的美国单边主义。如果我们简单地从表面上看,就容易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视为新的冷战战略;而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就比较全面了。

现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也出现了负面效果。一是中东国家问题没解决,美国无法全身而退。以色列和欧盟也不愿美国全部转到东亚去。二是当第一线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激烈的时候,美国不可能真正来保护这些亚洲同伴。如果它在西太平洋卷入所有冲突,也违背美国的战略利益。三是TPP遇到了障碍,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亚洲国家加入都有很大的顾虑。奥巴马说过,一年就搞成TPP。现在两三年过去了,越往后越搞不成。所以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遇到了瓶颈。现在,即使在美国内部,美国战略界的很多有识之士批评希拉里把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搞过头了。我相信在奥巴马的新任期内,

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未来10年,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前景如何?

这是一个世界未来政治经济中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首先,欧盟曾经是区域一体化的典型模式。如果这个模式能够成功,将来国家形态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欧盟的结构性缺陷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充分暴露出来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开始超过欧盟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债务国家和一部分债权国家在利益上的裂痕非常大,欧盟的前景出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状态。

欧盟付不出重新回到主权国家的代价。如果走回头路,那结果就不是欧盟的崩溃,而是世界经济的崩溃。如果欧盟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发生几个大变化。一是各国真正把财政交出去,建立欧盟的中央财政。二是德国在欧盟真正起领导作用。究竟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会逐渐清晰起来。三是英国退出欧盟。只要英国待在欧盟里,欧盟就不可能真正一体化。英镑不是欧元,它的利益没有和欧盟真正融合在一起。英国不可能放弃英镑,这是当年殖民体系留给它的巨大财富遗产,英帝国用英镑的方式把殖民地财富集中在伦敦。这是英国人不会把英镑并到欧元中去的真正原因。因此,英国和欧盟是不可能真正合二为一的。如能做到以上这三条,欧盟就可以突破困境,成为一个更高水平上的财政一体化的欧盟,外交和军事一体化也就会跟上来。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在上升

未来10年,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反全球治理的势力会否有所消减?

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中东，中东不稳定的根源在巴勒斯坦。所以，中东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渊藪就不会消除。目前形成像本·拉登那么大的国际恐怖组织的条件在削弱。本·拉登的势力做大是同当年美军在阿富汗支持其抗击苏联有关的。同时也要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并没有被消灭，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派别在许多国家复活，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甚至掌握了权力。这使恐怖主义获得了某些温床、某种气候。因此，中东的恐怖主义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消除的。

此外，现在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恐怖主义正在出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美国、欧洲的枪击案越来越频繁，而且同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排外主义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看到中东的恐怖主义，还要看到恐怖主义在西方也会出现。随着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中的裂痕越来越大，绝望的人群中也会出现恐怖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是世界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取决于世界秩序的公正合理。这是很难实现的。

未来10年，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能否迈向更好的治理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很难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放眼整个中东，无论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还是视之为社会动乱，这一场社会变革远远没有完成。它是伊斯兰宗教和制度向现代化变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断裂，而不是一个非常有规则的进步。像地壳变动带来的后遗症一样，要长出新的生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断裂后的余震及新的断裂还会不断发生。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实际上远远没有完

成,包括已经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也包括美军占领过的伊拉克、阿富汗。这个过程会很长,几十年到一百年都是可能的。第二,这场社会变革又是大量的教派斗争和部族斗争的一种结果。教派斗争和部族斗争的特征就是恶性循环的报复。教派是跨越国家的,又会形成翻来覆去的地缘政治变动。第三,石油富国阿拉伯君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也隐藏着深刻危机。现在是世俗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了社会动乱,不能预测具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一波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动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幅下降,加上美国页岩气开采,南海、中亚等世界新石油产地的开发,中东石油在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阿拉伯产油国的财富可能难以维持原来那么高的水平。第五,本来以色列和中东石油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随着美国的石油利益逐渐变小,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下降。对此,以色列能做的只有两条:一是美国国内的犹太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扭住美国原有的中东政策不放。二是冒险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将美国卷入局部战争。最后,伊朗的核武器化不可避免,伊核武器是个火药桶。

总而言之,中东可以引起危机的因素远远超过东亚,危机的概率和力度都超过东亚地区。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蒙蔽,忘记了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

未来10年,全球治理体系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变化?

我的团队正在做一个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全球治理体系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国际体系”,主体是国家行为体。在此体系中,大国还是出发点,由大国干预小国、西方治理非西方。第二种是“世界体系”,主体是世界中的各种力量板块,如发达与不

发达、西方与东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中心与外围,等等。此体系仍然由国家组成,但不是由单独国家控制的体系。第三种是“全球体系”,它增加了一大批非国家行为体,涉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一起去应对这些共同利益和威胁的体系。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共同构成了全球体系。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全球体系”虽然刚刚萌芽,但是发展迅速。因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威胁打破了国家界限,所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在上升,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在下降。但是,也应该看到,“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还存在,国家行为体在那两个体系中起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所以,从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上升,而且这是个长远趋势。但是,与国家行为体相比,目前其作用还是很微弱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把趋势当现状,现实主义者总是把现状当趋势。这都是经常出现的误判。

未来10年,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会有哪些新特点?

我不认为中国会成为新的“战略旗手”。首先,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速度超出了自身的预料,也超出了世界的预料,中国和世界都很难适应这种迅速上升的速度,已经引来我们不应遇到的许多麻烦。今后10年,中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能力培养的过程;外部世界也需要有一个适应中国、心理调整的过程。经过10年的时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责、权、利”都会得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俄罗斯、印度、巴西实际上都是地区大国,都具有某种世界影响

力。但这种影响力还不能支撑其成为世界领袖国家。此外，还有一批地区大国，包括欧盟中的德国、法国、英国，在中东和非洲也有，还有的国家“软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很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

信息化时代，世界是平的，国家力量也在趋向扁平化。因此，我甚至认为世界将来的走向是出现一批比多极化还要多的“极”，将是“无极化”。各个地区内有一个大、中、小的权力结构，不同地区之间结合成世界范围的大、中、小结构。小的不弱，大的不强。“小国”像以色列、新加坡、荷兰很强。大国则不一定强。世界依凭这样一个结构一步步走向稳定直至和谐。

未来10年，女性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能否起更大的作用？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在越来越庞大的NGO群体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机构领导者还是项目官员，无论是作为职业选择还是做志愿者，女性都占据了大多数，女性的作用越来越超过男性。我认为，作为非国家行为体，NGO是一个过去没有过的新的权力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特别是现在文化和网络的作用上升的时候，女性的号召力、吸引力经常超过男性。而且，NGO越发达，“全球体系”越强大，女性的作用就越大。

“冰公主”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女性参政、执政已经成为国际政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在后现代化国家，像北欧五国都曾出现过女国家元首。在一些北欧国家，“政坛玫瑰”在议会中占有约40%的席位。美国虽然没有出现女总统，但是连续出了几位女国务卿。

女性的整体地位在上升。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女性的作用

依然很小。因为后现代化的国家不多,NGO的实际力量也不够强大,所以,女性在其中即使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整体权力结构里的比例还是很小。这是一种正在上升的新兴力量,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主导地位。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

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采访 | 夏晓阳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

Charlene Barshefsky

1996—2001年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专家和主要贸易政策制定者。她因参与中美就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而闻名，其出众的谈判技巧被哈佛商学院引为教学案例，哈佛法学院更是授予她“伟大谈判专家”的称号。如今，她是美国威凯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代理过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反倾销诉讼。她把相当多时间花在与中国市场相关的业务上，每年要来中国至少五六次。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有一段回顾中美入世谈判时的文字：“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他们四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那是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美谈判的关键之年，这一年，中美谈判日益频繁，其间也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中断。

同年11月，重启后的谈判进入最艰难的阶段。11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14日晚，谈判破裂；美国代表团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在中方的坚持下，谈判于15日凌晨3点继续进行，美方以巴尔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代表团态度非常强硬。围绕着汽车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过渡期条款、准入标准，甚至电影大片的引进数量等等，双方争执不下。

然而，转机也正是发生在这“漫长”的

一天。

时值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临时决定去谈判现场。总理坐镇谈判之后，使得谈判“柳暗花明”，在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刻，双方谈判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之后的谈判，不超过一小时。美方终于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

此役之后，经过多轮双边以及多边谈判，2001年12月11日，在卡塔尔的多哈，时任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的卡迈勒，敲响了标志中国进入WTO大门的那一槌。从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开始全面接轨，这既为全球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深入的重要里程碑。

当年中美入世谈判有哪些轶事珍闻？美国人又如何看待中国入世对世界和美国的意义？自由贸易是否走到了尽头？中国在WTO和全球经济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加入WTO为中外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加入WTO被很多人看做是中国的“二次开放”。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开放”对于中国的影响？

我非常赞同“二次开放”这种说法。我坚信，同时也曾多次同我的中国同事说过，任何协定必须是一个好的协议，这样的协议应该具有良好的商业效果，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表明，这个协议实现了其目标。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改革在加入WTO前就已开始，但加入WTO以后步伐更快了，因为它不仅巩固了业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扩大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使改革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

个层面,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史无前例的速度,为中国人,同时也为外来投资者创造了巨大市场机会,实现在10年前人们几乎不曾想过的经济现代化。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我个人对这一结果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历史上中国就曾经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仍充满各种挑战。

2008年以来,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成为世贸组织重大谈判的核心成员,而且也在小范围磋商中获得发言权。要在WTO中有所作为、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还需要做些什么?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值得庆贺的事。目前的问题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缺少对彼此目的和意图的了解。中国富有竞争性和进取性的经济上升引起了彼此间、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的猜疑,中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首先,中国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通过严肃认真的对话,明确彼此的目标和意图,建立互信。这对促进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要避免误解,防止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势力利用这种误解干扰彼此间正常的经贸合作。第三,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诸如气候变化、保护海上运输安全、反恐、对付有组织犯罪等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较晚。您能否为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或打官司给一些建议?

总的来说,美国是欢迎中国投资者的。但美国市场对许多中国

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市场,因此,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必须了解美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运作程序以及参与这个过程的各种政治角色。这些东西从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而需要深入研究和了解。在此基础上,首先必须了解美国的投资规则,摸清计划投资领域的基本情况,有些领域对外资是不开放的,中国是这样,美国也同样如此。其次是计划投资的领域是否属政治敏感领域;第三是投资规模,如果投资规模过大或太具进攻性,恐怕难以被接受。因此,我对有意来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给出的建议是:从小的做起,从简单的做起,在投资选择方面更具灵活性,并与合适的美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不可否认,美中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双方投资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当中国的国有企业来美投资或是投资敏感领域及涉及国家安全时,这个障碍就更为突出。克服这个障碍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素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在他的《中国 and 世贸组织》(*China and the WTO: Changing China, Changing World Trade*)一书中指出:“一个成功向相对富足和公开的社会过渡的中国既是对其他国家的鼓舞,也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您认为在西方经济正经历危机的时刻,中国依然能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吗?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是很重要的引擎。但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引擎,也无法成为唯一的引擎。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单靠一国力量是无法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的。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这些国家迟早会走出经济困境,因此,中国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与这些国家紧密合作,共同携手推动世界经

济的复苏和增长。

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2010年11月召开的会议上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呼吁谈判各方抓住2011年这个“窗口时间”,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达成协议。您怎么看谈判的前景?

我对多哈回合谈判有些悲观。很多年前,我就认为,这轮回合的谈判终结了,很难想像如何在150多个国家中展开的谈判能达成共识。WTO应该改变谈判方式,要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就诸如通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等某个具体领域展开谈判,这可以大大缩小参与国的数量,也许是10个,至多是20个,这些国家都对开放市场有意愿和兴趣,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大,此后再欢迎有兴趣的国家参与其中。这种方式更务实,见效快。

最终取得对双方都有利的成果，我们是成事者和创造者

1997年到2001年担任贸易代表期间,您总共签订了260份协议。您的谈判技巧被哈佛商学院引为教学案例,哈佛法学院授予您“伟大谈判专家”的称号。您在谈判桌上,通常会使用哪些策略和技巧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谈判者,必须首先做到知彼知己,即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手中有什么牌,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对方的目标以及对方手中可能打出的牌。我们都想得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但起码你得有一辆到达那里的车;在谈判桌上,你的最终目标就是得到那辆必不可少的车。在手段和目标之间,你必须全面考虑谈判桌的两端。其次,就是努力建立对方对你的信任和信心,国与国之间的互信,要做到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第三,必须做

好扎实的调研工作,使自己更充实和聪明。第四,一个优秀的谈判者应该是少说话,多聆听。我们都经历过谈判桌上的沉默,但沉默可能就孕育着成果,此时你要耐心且静静地观察所有细节,细心捕捉那些可能在瞬间产生的线索和机遇,例如,对方沉默可能是因为他不高兴,你就需要改变谈话方式和技巧。有时,沉默表示对方正在认真思考你提出的条件,你应该给对方足够的时间来想清楚。有时沉默就是沉默,因为工作了太长时间,大家都累了,也许改日再谈就能打破僵局。

在我的谈判经历中,我感到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不”,因为有时当对方说“不”时,也许并不意味着“不”。在谈判中你时常会听到对方说“这不可能”,但并不代表谈判失败了。你的工作就是努力发掘“可能性”。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您又如何评价当年中美“入世”谈判场上的中国团队?

我对中国谈判团队的表现十分钦佩。在谈判的每一个过程中,从朱镕基总理到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以及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石广生,他们都是杰出、智慧的谈判者,他们使出所有的谈判技巧,处处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场充满智慧和技能的谈判,随着时间推移,谈判日渐复杂,双方立场也日趋强硬,但都很务实。美中最终之所以能达成协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都认为要面对现实,因为没有什么完美的。在整个过程中,双方来回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最终取得了对双方都有利的成果。就此而言,我们是成事者,是创造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增进了了解,谈判对手也成了朋友。即使谈判进入很胶着的状态,我们还是保持着很好的个人关系,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代表的是各自政

府,而不是个人,我们肩上都担负着很大的国家责任。

回想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那些日子,您印象中最深刻的细节有哪些?

对我来说,与包括朱镕基总理在内的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本身就很难忘。我们在工作中结下的友谊令我难忘,龙永图先生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最难忘的那一刻就是告诉克林顿总统,我们已达成了最终协议。当时的情形是,我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一令人激动的消息通知总统,而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安静的地方就是女厕所,于是我的同事都跟我进了女厕所,我们在那里给总统打电话。具有戏剧性的是,当时克林顿正在土耳其访问,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的助手告诉我,总统正在洗澡。于是我让总统助手赶紧把总统叫出来,说我有好消息报告他。于是我听到了“砰、砰、砰”的敲门声,并听到助手在喊:“总统先生,是查伦,他们达成协议了!”总统很快出来接电话,我猜想他当时浑身一定都是湿的,但在电话的那端,他非常非常高兴。对他来说,这不仅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也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成就。

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重重考验。尤其是1999年5月谈判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轰炸一事而停止。当时您和克林顿总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时期。克林顿总统感到他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没有在当年(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与中方达成协议。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使美中关系一下子更复杂、更严峻,WTO谈判也因此陷入停滞。应该说,还是出于务实的精神,克林

顿决定主动致电中国政府,双方在充分沟通后,同意几个月后恢复谈判。我想是因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除了接触与谈判,没有第二条途径能缓和及化解双方的矛盾与分歧,继续保持僵局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利的,并有可能使两国国内的激进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使中美关系进入恶性循环。于是谈判又恢复了,并最终达成了协议。

如果当时没有达成协议,今天的历史恐怕将要重写

在您之前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费希尔曾说:“我们不愿意为了达成协议而去达成协议,除非是一项好的协议。”现在来看,您如何评价美国同中方达成的入世协议?

早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前,我心中就有一个目标,我曾对同事私下说过,推动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拥有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果将中国继续排斥在世界贸易体制外,对美国及世界来说都是损失。当我1993年加入克林顿政府后,就将此作为我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克林顿总统当时坚信,一个贫弱的中国无法让美国受益,也无法让世界受益,同时,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中国不仅对中国自身而言是一种悲哀,而且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是危险的。美国所需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这也是国际社会所希望的。这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指导原则。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使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的全球事务中找到了广泛合作机遇,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

分歧。我深信，如果当时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今天的历史恐怕将要重写。

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石。入世10年，随着贸易量的增长，中国也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目标，这种“成长的烦恼”未来是否会常态化？

美中两国经贸摩擦的增长是很正常的事。当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很少时，几乎不会有任何矛盾，而当贸易额达到今天的规模、甚至未来更大的规模时，没有摩擦反而是不正常的。美国不仅与中国有贸易摩擦，美国同欧洲国家、同日本等都存在贸易摩擦。商业的本质就是存在竞争和摩擦。随着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更多的竞争，都将使美中两国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概率，这不足为奇。关键是如何妥善解决这些摩擦，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人为夸大矛盾。WTO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解决这些摩擦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渠道。美中之间个别经贸争端不应影响双方整体的经济关系。中国有很好的遵守规则的记录，双方今后应通过WTO及双边争端谈判解决机制来协商解决矛盾。只要大家都尊重这个机制，经贸关系就可以健康发展。因此，我并不担心贸易摩擦的增加；我更担心的是相关的贸易政策，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充满疑虑，中国则担忧美国的政治运作程序，这恐怕是最难协调的问题。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经贸摩擦中的热点问题，尽管人民币在过去几年中升值幅度已达30%，但美国参议院不久前再次通过议案，强压人民币进一步快速升值。您认为这种做法能有助于缓

解美国目前面临的经贸问题吗？

货币汇率问题只是非常复杂的经贸问题的一个部分。就美国而言,美国人消费太多,储蓄太少,而中国人则是储蓄太多,过度依赖出口和外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刺激国内消费。因此,两国都需要对这种结构进行调整。中国必须逐步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进出口平衡,美国则需要更多地出口,改变过度消费,提高储蓄率。但这种变化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汇率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灵丹妙药”,可以包医百病。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常常被夸大,尽管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光靠压人民币升值是无济于事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多渠道、多方面来解决。中国政府应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但我不赞成压中国在汇率问题上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因此,美国参议院试图通过国内法案来向人民币施压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

傅高义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采访 | 杨逸淇



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著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等。

傅高义已80余岁高龄了。这位名满天下的汉学家孤身一人带着行囊又一次来到中国时，依然展现出了极大的魅力。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论坛与学术交流活动，主题都围绕着他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研究。

他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甫一问世，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的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

《邓小平时代》的前言中提及了300多个访问对象的名字；中文版804页，其中注释超过100页。这位哈佛老教授下的功夫，着实令人咋舌。

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在他眼中，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

大国的命运。在他看来,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邓小平把改革看做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

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这位严谨的学者还频频提出大胆的假设:“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推进民主”、“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解决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会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他会推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褒奖。

傅高义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为改善民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绩,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好的基础。十八大报告中有很多重要内容,关键是怎么让这些成为现实。傅高义相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团结一致,继续大胆改革。他同时建议,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应该更加重视法律,更加严厉地惩治腐败。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不必按照西方的做法

您的《邓小平时代》为西方读者了解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读。“中国的转型”是这一解读的关键词。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十年,中国是否依然处在转型之中?

是的。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团结一致,继续大胆地改革,但方向要很清楚。

首先,中国应该更重视法律,对待腐败问题应更严厉,法律要取得更高的地位。我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与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违反法律的算腐败。但是依我看,中国的腐败问题很复杂,不单单是违法不违法的问题。政府决策有时缺少透明度,有些接近高层圈子里的人,他们得到的机会比别人都好。因此,反腐败是非常难做的事。但是,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会推出更加严厉的反腐败措施。

第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应该加快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很多人提到民主就担心“乱”,但是,随着中国大多数人过上小康水平的的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的普及,推进民主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应该有很多聪明人到学校学习,更了解世界,增长才干。我想,要是邓小平还活着,他可能会说,先让社会安定下来,再提高人民的素质,逐渐推进民主。我还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不必按照西方的做法。东亚的历史表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并不像印度那样完全是美国标准下的民主国家。有时候需要将权力集中起来,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发展。比如,新加坡是一党执政,却是一个不错的模式。

您的书中强调个性对于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具有的重要意义,比如坚定、有条理、强势,等等。不过,在否定“文革”之后,中国迎来开明的政治大环境,这是否是更重要的一个大背景?

我想是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而且有时代的因素。威信、经验、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使他这么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

领导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政治领导人坚强的领导力是不是显得更为重要?

我想是这样。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很不容易。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历史这么长,如果领导人缺乏坚强的领导力、权力太分散的话,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就很难控制,中国就会乱。有人说,中国是权威主义国家。我认为,中央政府的确比较有权威。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时是不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畅,情况就会混乱。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正值“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全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乱,简单地依靠法治搞建设是行不通的。还有一层,我觉得当时很多干部怕这怕那,不敢动。“文革”中,人们学到了许多“经验”,最好是不做事。但是,邓小平敢想敢做,他也一直希望那些干部敢作敢为。当时的难处在于,如果对干部要求太严格的话,当时就没有人敢做事。因为需要人干事,所以,邓小平有些让步。在我个人看来,当时他的政策是对的。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完全是需要的,何况1980年代腐败还不算太严重。邓小平觉得最好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好的领导班子。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邓小平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官员们变得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但是后来,情况有所改变,现在的情况与19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要是邓小平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1980年代,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经济建设。但是,现在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不仅仅是看经济增长的绩效,还要看能否控制腐败。因此,邓小平会

大胆地为反腐败做一些事。

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中国地域广大，通过某一地的成功试点、然后在其他地方推广的试错方法，对于中国的改革很重要。您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一书就总结了广东的经验。中国改革进入下一个十年，试错法对中国改革依然重要吗？还是像许多人说的，中国的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想，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务实的、实事求是的人。邓小平将改革看做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邓小平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时，应该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后，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例如当时在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前来设立新企业，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标准，随后，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逐渐扩展。

我认为，如果说“设计”的话，就必须要有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邓小平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成功了就可以再走。

20世纪80年代，我在广东做过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退休以后说过的一句话：我是搞“经济特区”的，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那是很大胆的想法。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对的。政治改革必须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

就可以稳步前进。我觉得可以选择思想比较开放、基础比较好、比较了解改革的某一个地区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邓小平并不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他认为这需要时间,毕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任何新的做法或变革,或许都要先从部分试点起步。他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人,在您看来,改革深化与公平正义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有些人,包括我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抱怨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小。但是,我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为改善民生的确实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农业税被全部取消,9亿中国农民因此受益;再如,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已覆盖全国95%以上的人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得以继续,社会比较安定,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成绩都很了不起,也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好的基础。

当然,我也认为,现在的社会情况与十年前不同,特别是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依我看的话,即使改革有风险,现在也的确需要通过更多的改革来解决相关问题了。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这样说并非出于外国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如果中国改革取得成功,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样的话,美国也满意,而且也容易与中国交往。所以,我认为美国的立场与中国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社会安定、把腐败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不但对中国有好处,对外国也有好处。

30多年前，您写的《日本第一》(*Japanese As Number One*)畅销全球，“日本模式”风靡世界。然而，最近20年，日本陷入停滞。作为40年来密切观察过日本崛起的著名学者，在您看来，日本的教训对中国发展能带来什么警示？

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日本第一”的意思。我写那本书是在1979年，我当时没有说日本的经济水平最高，或者说日本会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第一”指的是，日本在很多方面做得确实非常好，是值得学习的。比方说，日本的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低，社会相当安定；日本把教育看做立国之本，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教师社会地位高；日本的质量管理也是世界闻名的。从1964年到现在，日本的高速铁路很少死过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啊。因此，那本书的全名是《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我当时呼吁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活力的美国向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学习。

日本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他们的问题在有些方面比中国更大。在美国，如果一个公司出现亏损，老板炒员工的“鱿鱼”是家常便饭。但在日本，不能这样做。由于实施终身雇佣制，在整个社会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化，很难迅速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所以，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公司收入下降、股票价格下跌、市场表现不好，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日本。1989年“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人其实非常认真地做了不少工作，政府也照顾工人和普通百姓。终身雇佣制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因此，社会还比较安定。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稳定问题也相当突出。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为稳定夯实基础，先把农村问题、医疗问题、腐败问

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解决得好一点,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

英国人佩里·安德森前段时间在《伦敦书评》评论说,您的《邓小平时代》与基辛格的《论中国》等书都是“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迎合“中国热”(Sinomania)的产物,对这样的批评,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地读过我的书,甚至根本就没有念过我的书,因此,他不理解我的书。所以,我不会理会他。他的评论,我觉得无所谓。我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当提及20世纪的伟人时,人们不一定立即会想到邓小平。我想改变这一偏见。

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有考虑到出版时机。原来计划5年能写完,结果写了10年。不过,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客观看待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我知道,很多学者、记者、评论家评论我的书,说的都是好话。但是,也有对中国存有偏见的西方人批评我的书。他们认为,我对邓小平批评不够,对中国政府批评不够。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研究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评论”;尽量客观地写出邓小平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这也是我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我想,用邓小平的话“实事求是”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我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下结论。

1970年代您在香港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1980年代您深入广东调查研究后写出了《先行一步》, 新千年里您的《邓小平时代》更是“十年磨一剑”。今后, 如果写作有关中国的书的话, 您还会有什么考虑?

我写《邓小平时代》用了10年时间。曾有人问我, 要是你再写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话, 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谁。我回答说,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写朱镕基。但是, 我恐怕没有精力这样去做了。我现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虑的是, 20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做日本研究时, 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 韩国也没有, 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几十年来, 我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它们又都面临着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的问题, 那么, 这其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打算做一两年的研究, 多了解这个过程, 去分析一下这个变化过程, 期望能写一本篇幅比较短的书。

有人评论说, 您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 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您觉得邓小平当年的外交活动对当今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有何启示?

中国已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国, 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更加自信。但我认为, “韬光养晦”仍然适合中国的和平发展, 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最近南海气氛紧张, 外国人有很多怀疑和担心。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要以行动来表明, 中国永远

不会做霸权主义的国家,如果获得别的国家理解的话,对改善中国自身的发展环境也是有利的。

其实,将您称为“汉学家”可能有失公正,因为您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据说您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您如何评价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根据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在美国,领导人(企业界、学界、政界)与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不一样。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拿中国说事,其实就是为了迎合选民。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负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而现在关系变了;二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历史上一一直乐观的美国人开始担忧自身的前景;三是,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人工作学习非常勤奋,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一直就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指责中国。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始终存有疑虑。现在,中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所以,需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中日两国搞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邓小平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日的领导人。他还与天皇见了面,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

假如美国需要就某个重大问题,比如10年计划,与日本或中国进行磋商,选择中国将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领导人不停地更换,什么大事也决定不了。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中国，“早熟的超级力量”及其国际角色

采访 | 田晓玲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Arvind Subramanian

印度裔经济学家，美国著名智库之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管，参与了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并且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到2030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GDP的近25%，而美国只占12%；中国的贸易额将会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人均GDP在2015年将达到1.7万美元。20年后，中国即使维持一个低得多的增长率，仍然可以获得主导世界的地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想与中国处理好关系，应该让中国习惯多边主义的存在，而不是感到困惑与不便。”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直译为《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一书。

写作该书之前，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现在，他似乎可以跻身全球范围内关注度最高的经济学家行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更是将其评为“2011年全世界最出色的100名思想家之一”。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在美国国内引发热议。《外交事务》杂志曾经专门就此组织关于中国的辩论(“The Great China Debate”),邀请作者和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围绕“中国能否主导全球经济”进行辩论。

具有跨语境文本分析价值的是,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被翻译到中文世界时,其原来夺人眼球的书名被“韬光养晦”地改成了《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这本书之所以倍受关注,基本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当下有关中国的讨论话题在全球的关注度甚高,如同当年美国也如此关注过日本那样,当中国的GDP总量紧随美国之后,人们自然会关心中国的未来会怎样、中国何时会超过美国了;其二,该书能在众多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论述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作者的经济学功底,其预测更多是基于经济数据而非个人的情感和猜想。正如著名学者、《历史的终结》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认为的那样,这本书不但“颠覆了传统智慧”,而且“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

我对中国的乐观预测是从历史比较中获得的

您在《黯然失色》中对中国作出非常乐观的预测,出版后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问题是,经济力量的对比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也同欧美的衰落或低增长相关联。您是否也这么认为?

当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时,事情的一方面肯定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当然,从定义上

而言，中国更加强大了，另一面就是欧美国家相对弱了。里面也有比较的因素存在的。

眼下，学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国前景的看法迥异，您本人非常乐观，也有人比较悲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所有预测都是一些主观判断吗？

关键在于大家各自所作的微观预测是否能够实现。很多人认为中国眼下的问题会让中国的整个增长减速。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短期的问题和长期的问题做出区分。有些人觉得中国可能会遭遇短期的问题，比如在金融领域出现危机。我的看法是：即使中国遭遇到类似的危机，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中国究竟能否从危机中复苏。我认为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其他有些人可能认为做不到。一些中期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的确会影响中国的增长速度，但是其影响不至于会那么大，以致中国不能实现6.5%的增长速度。

问题在于，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减缓，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中国可能赶不上发达国家？我不认为这样的经济减速会有那么大的幅度和影响力。

包括您在内，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10年甚至是更短时间内超过美国，这种局面似乎指日可待。这种观点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试图让西方世界重视中国的善意提醒，而不一定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本身？

究竟怎么看我的书对中国增长速度所做的假设？它真的太乐观了吗？我在书中给了一些其他理由来说明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不算过于乐观。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回到历史中，去看看那些同中国今天情况相似的国家，它们在随后的20年究竟是如何发展的。我发现类似的22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例外，不同于我对中国未来经济所作的预测。所以，从历史比较来看，我所推测的中国未来增长速度还是有很大可能会发生的。这其实也是很现实的预测。

近年来，有关中国问题的书非常多，其中不乏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作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谈论中国。您对这股“中国热”怎么看？您希望看过您书的中国读者会是怎样的反应？

中国是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我也读过不少这样的书。我也很希望知道中国读者对此的反应。我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我的书。读者也许会被它震惊，但是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思考这本书的意义，思考这本书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所具有的意义。我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传达的讯息就是：他们必须开始考虑中国的国际角色，当然，他们也应该关注国内问题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能的

有人提出，您书中的某些章节与1992年渲染日本统治美国的小说，也就是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有些类似。是不是这样？中国和日本会不会有类似的结局？

两本书之间可加以比较的地方就在于，它们都说有一个新的经济体超过美国、取代美国。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日本经济放缓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最富裕国家了。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大家以为在1985—1990年间，日本仍会以3.5%的速

度增长，而美国则会以1.5%的速度增长。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一旦一国成为富裕国家，就不再可能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了。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则是，它仍旧贫穷，更快的增长也就可期了。这才是两国之间很大的区别。

萨默斯离开白宫时，曾经对奥巴马总统说过一句类似意思的话，他说：1950、1960年代我们说苏联会超过我们，结果怎样？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又有人这么说日本，结果又怎样？现在，他们又开始谈论中国了。我想挑战这样的说法：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那我要说：五年前，当我说意大利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时，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不相信。但是看看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也常常会拿1950年代的情况同现在比，但是今天，美国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它变得非常脆弱了，不仅因为美国出现了高失业、低增长和财政困难，而且因为美国碰到了结构性的中产阶级难题。我在中国同人们交谈讨论时，中国人总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您提到中国仍旧处于贫穷阶段，所以经济增长仍然会很快。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的人均收入非常低，导致人们的购买力并不特别强，当外部市场也不那么给力的时候，这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这涉及再平衡和转型问题。从依赖外部市场到依赖国内需求，我认为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此而放缓。不过我仍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可能的，只要人们的收

人快速增加,中国在再平衡的过程中就会有足够的消费来支撑经济发展。

这么说来,正如您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依旧很低,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领导其他国家?

当中国成为超级力量的时候,会出现非常不一样的情况,同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也就是英国和“二战”以后的美国都不一样。英美两国成为超级力量时,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2030年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了,它仍旧是一个贫穷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到美国人的一半。所以,我将中国称为“早熟的超级力量”,这会给全球合作与冲突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

当然,尽管中国还很贫穷,但是中国太大了,所以,无论中国做什么,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中国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在内。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人。

这可能就是由大国的位置所决定的。诚然,当我们说“大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仅仅是指中国,还应包括您的祖国印度。

是的,从人口角度来说,中国和印度都非常大;但从经济规模而言,印度并没有中国那么大,而且,印度比中国还要贫穷很多,所以不能把它们看做是一码事。

眼下,大家也非常关注印度经济的发展,您又怎么评价印度经济?

印度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同中国相比,也许到2050年,两国会更

加接近。未来2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超过中国,并不是因为印度比中国做得更好,而是说,当一国变得富有以后,其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相对而言,中国会更早到达这个点。印度比中国更穷,但年轻人口更多。印度更加落后,贸易规模也更小,自身背负债务,而不像中国那样是债权人。

至于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会不一样?事实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这是因为两国历史、国情非常不一样,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此所作出的选择。我不能说孰是孰非,只能说事实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不把中国这样的强大力量包括在内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资金走向国门投资海外,比如在欧债危机期间,就有要求中国斥资来帮助欧债国家的呼声。在您看来,中国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更好地处理相关的全球事务?

重要的是中国的借钱方式。中国成为全球多边体系的一部分非常重要,中国如果能够更大程度上遵循借贷规则,那么每个人都会给予它以正面的评价,中国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投资者。

借钱给其他国家,或者为IMF等国际机构提供更多资金,中国自身其实也会得到很多回报,因为中国借此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出更大的声音。IMF刚成立时,为什么欧美国家有非常大的权利?因为它们出钱了。现在,世界变了,中国强大了。我们应该给予提供资金的国家以更多更大的权利,对待中国也不应该例外。这才是公平的。

您在讲演中提到，中国应当在诸多国际机制上带头做一些变革。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真的带头了，这会不会吓到世界？毕竟，世界还远没有做好应对中国主导的准备。

这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国有力量了，会怎样来使用它？如果中国能够创造出一些标准，其使用力量的方式能够使每个人都觉得好，就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来使用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中国需要掌握这种力量，同时，遵守多边标准，中国的行为方式会更好。

您的书开篇就描述了一个惊人的场景：2021年，美国总统赶往IMF总部，签署与担任该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商定的援助美国贷款协议。眼下，世界银行行长的换任工作已经完成，仍然由美国人推举的人选担任这一职位。您究竟怎么看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在已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内，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五国”又该如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2030报告》发布的时候，我曾经当着中国部长们的面说：现在你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中国应当主动推选出一位能够代表新兴市场的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来接任佐利克。当然，美国传统上就有这种推选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只有中国来支持一名候选者，才会有很大可能来挑战美国支持的候选者，否则，这一位置就会按照惯例仍旧由美国人来担任。

我对“金砖五国”这一称呼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多少共同点，事实上，它们没有什么共同点。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比中美之间的政治问题更加复杂、更加微妙。正因此，它们之间很少有足够的共识，也就没有办法为IMF

或世界银行推选出一个共同的候选领导者。很难找到一种方式来团结它们。

2011年以来，美国大力推行其重返亚太的政策，包括建立“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究竟是否出于美国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西方国家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更加关注安全，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但是，美国更加转向亚洲，其结果，就是美国看上去想要围堵中国，因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没有让中国参加。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这是因为，如果不把像中国这样的强大力量包括在内，那么这样的协议又有什么意义呢？

世界其他地方也应当赋予中国以更多的权利，而不是抑制中国，中国应当在国际组织的运转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反对美国那样的做法，原因是类似这样的协议并没有把世界最大的几个贸易国包含进来，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更糟糕的是，如果中国也说：我们也要建立一个协议，但是不允许美国参与进来，结果会怎样？中国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希望中国仍旧能够一如既往地遵守已有的国际体系。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依旧很落后，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他们的25%，中国更需要开放的市场。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自身利益出发，还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而言，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您曾经提到，世界各国在财政和货币领域推出了相似的应对政策，并且都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与保护主义措施。您认为这就

是伟大的共识所在。那么，如果我们逐渐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进入一个普遍的低速增长通道之中，这样的共识是否还需要？共识还会那么容易建立起来吗？

我们可以在危机中达成共识；一旦危机消除，再要达成共识就很难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开始分化，很难再一致同意什么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人们容易患难与共，但是很难有福共享。

这也就像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所说的那样：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G0的时代？

是的。我在书中也提到，我们究竟是G0+，还是G0-？G0+是因为大家在共同的危机中走到一起，一旦危机结束，就变成G0-了，人们忘记了在危机中的合作。全世界都是这样。当危机来临时，很容易就能做到推动改革；而当危机不再时，改革就变得很困难。

您提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其中包括一些主流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向。您自己也供职于美国著名智库，在您看来，智库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就像我在讲演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应当看到，现在美国知识阶层的风气和立场确实有些明显的变化。我的证据是，威廉姆森、克鲁格曼、斯宾塞、萨默斯等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派别，也非常国际化，并不属于任何小的利益集团。在过去5年中，他们都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当然，他们也不至于说我们就此要关闭市场；他们还不会走那么远，也许永远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们的这种表态，使保护主义看起来变得正当了。中国应当关

注这些问题,因为中国更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

至于智库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的回答是作用很大。有一句名言这样说道:“最后,是思想而不是巨大的利益,来造成美好与邪恶的差异。”所以,思想非常重要,智库、学界对于政策制定有非常大的作用。

林毅夫

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采访 | 季桂保



林毅夫

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著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等。

“我在世行两年间”，是2010年拟定的访问林毅夫的题目，当时，身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来沪参加学术论坛，其间原本答应了采访要求，后来因为其行程临时有变，便搁置下来。

后来，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推出了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再度为学界所关注。

在世界银行四年期间的工作感受，是许多人希望回国后的林毅夫回答的最主要问题；林毅夫谈论的所有话题，也几乎都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他还是那么谦逊，认为自己能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的机会；他

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了新期待，在他看来，“从全球经济板块大调整看，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理直气壮，尤其需要理论创新，否则仅能按人家的音乐跳舞，处处被动”。为此，他特别强调国际人才储备的重要。

依据林毅夫的分析，“国际经济板块的变化会加速，发达国家会陷入比较长时期的经济疲软，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潜力，避免自身体制的弊病，其经济权重会快速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他依然感叹“能够在国际舞台参与治理的人才在我国还是太少，国际治理的主导权现在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适应国际规则，然后逐步来改变它，是他认可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要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他坚持自己多年前形成的一个判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转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发生的经济现象是全球的大现象。世行工作四年，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在林毅夫身上显得更为强烈。

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

到世行工作后，很多人想了解您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从世行归来，您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等多部著作，《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副题就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所以，还是请您先说说您在世行四年的感受吧。

我到世行四年，首先一个感受，可谓“水涨船高”，因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做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9任，之前8任，包括

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应该就是对世行工作四年做的一个理论总结吧?

我到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和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

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像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理论创新因此显得非常紧迫。

《从西潮到东风》的书名背后，有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和分析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上“看走眼”，除了原有理论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够完备外，是否还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是在“瞎子摸象”。事实上，如果2003年后经济学界能透过相关现象找到更根本原因，也许可以化解或缓解全球金融危机了。

当然,舆论界的“鹦鹉学舌”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方法论上讲,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受西方原有主流理论浸染更深,因而“别开生面”更显其难?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长期有“西天取经”的想法不奇怪。现在来看,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必然趋势。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写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提出,中国学者用规范的方法对本土问题深入研究,将来的成果必然是国际化的,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可能会转到中国来,经济学大师未来可能有很多来自中国,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或者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矢志致力于方法论和理论创新,是否成了众多

学者的共识？

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这一进程可能会快，也可能会慢，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加以倡导和推动。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要运用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但是对中国现象了解的人，其研究不见得符合国际普遍接受的研究规范，而符合国际规范的学者，因为评价体系的关系，往往更多地为了升等和晋级，倾向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此作为激励，其中更多是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并比拼研究技巧。可以说，目前的激励结构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需要更多的人来倡导研究本土问题，并且采取与本土问题的研究相匹配的方法，如此，才可能使经济学研究中心更早转移到中国来。无论如何，这种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问题现在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的金矿，为此，既需要学界的倡导，也需要培养相应能力。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作出一两代人的努力。

强调结构内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与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明确意识而为经济学界关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

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做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认为结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在18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也非常缓慢,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1400年;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70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只需要35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一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其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也不同,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都不一样。因此,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就不同,相应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同实体经济的特质相匹配,超前或落后都不好。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以及政府的作用，这样的见解肯定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有关。

理论总是来自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关于政府和市场，1993年世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在总结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时，认为经验有两条，一是出口导向，一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干预，这里，既有市场又有政府。2008年，以迈克尔·斯宾塞为首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发布的经济增长报告，总结了“二战”后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取得年均7%以上增长的全球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五点：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以市场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个报告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

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边界范围?如何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过多这两个极端?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15、16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

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新马歇尔计划”为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逐渐达成的共识。为此，您的新著提出了以超主权的完全信用货币“纸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新意何在？

“纸黄金”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的。以单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有内在必然的矛盾，也就是一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经济能支撑巨大的外贸逆差，在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也是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长远看，如果仍然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永远没法解决。

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处于上升势头，总量占全球经济的50%以上，因此，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方便又稳定。应当看到，多元储备货币的国家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在国际市场间大量流动，导致储备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给储备货币国带来大量问题。这样，大家都是受害者。为克服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冲突，推出“纸黄金”这一构想可谓适逢其时。

为振兴全球经济，您特别提出“新马歇尔计划”，也就是大规模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样的构想如何能够在各主权国家得到普遍认同？

各国经济发展固然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相对更加严重。大家最关注的是欧债危机。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债务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短期援助计划都只是止痛药而已。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是收缩性的,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短期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传统上,一旦出现危机,总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此抵消因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经济收缩。但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升竞争力。美欧目前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应对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就是给发达国家提供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货币储备权和印钞权的现实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其通过大量印钞购买政府国债以刺激消费需求,还不如通过印钞来投入全球基础设施以增加就业。与前者相比,后一种投资长远来看更有利。

问题在于,“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主体又该寄托在谁的身上?

首先,G20国家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应充当这一计划的实施主体,包括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其主要功

能就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其项目选择、设计和执行的能力非常强，以这些国际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可以使“新马歇尔计划”顺利推行。

全球步调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复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国失业率高导致的社会抗议压力以及政党政治选举的实情，许多货币或财政政策可能因此出现变形。这样的情形是否更使人担忧？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才更需要我们提出新的倡议。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更要主动倡议，以争取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

胡永泰

追赶之后才可能有制度创新

采访 | 田晓玲



胡永泰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长期研究东亚经济、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等问题，2002—200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的特殊顾问。

过往经验证明，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往往被看做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到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按照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4 628美元，超过了4 000美元这一国际公认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标准。2011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就专门对此作出了提醒，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给出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于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说道：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

富裕国家竞争。这当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至今仍停留在人均GDP 3 000—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一方面是言之凿凿，“中等收入陷阱”似乎近在眼前，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增长的陷阱之中；而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它认定的跌入“陷阱”的国家多有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等问题，目前来看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也非常普遍，更不用说那些低收入国家了。如此一来，不仅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看来也是一个难题，再加上低收入国家一直存在的难以摆脱贫穷状态的“低收入陷阱”，“陷阱”随处都有，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说是一种特定现象了。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还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又该如何自处？

追赶不是为了吃更多、穿更好，而是要解决社会的很多病痛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是2006年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到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统计角度来定义的，另一种则是动态定义。前者是指达到一定收入程度（比如人均GDP 4 000美元）之后，就会面临“陷阱”，从而无法继续增长，所以它是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后者所说的“陷阱”是指不能以快

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因此永远不可能赶上这些发达国家。我们知道,要想赶超发达国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增长率就必须超过它们,否则是追不上来的。

这两种解释,如果用第一种,那么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但如果用动态定义,那么这就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问题。比如拉丁美洲,它们的GDP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们仍旧追赶不上美国,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增长速度没法超过美国,所以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不会发生变化,这就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我们来看韩国,它就在不断靠近美国。通俗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你没有能力靠近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如果你的增长曲线更加陡峭,那么你就可能追上它;如果你的增长曲线和它一样或者比它更平缓,那么你就永远也追赶不上,尽管这时你的收入也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进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进步,而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追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能保持比最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就会陷入动态定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发展进程究竟应该怎么看?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增长的,也有进步,但是增长的速度非常慢,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处在“低等收入陷阱”中。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把国家带出了“低等收入陷阱”。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像韩国那样,脱离“低等收入陷阱”以后,还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将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多半的国家进入这一阶段后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

您标示出了两种增长路径，一种是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还有一种是高增长之后速度放缓。问题是，老百姓在前一种状况下的生活一定比后一种状况更幸福吗？

前一种路径是可以追赶上最先进的国家，后一种状况则可能永远追赶不上。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为什么要追赶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吃得更多，而是因为如果追赶不上，你就没有能力购买最先进的东西，比如药品。最先进的药品可以从哪里来？来自巨大的投资做科研，这里就有很高的成本，药费很贵也就自然而然。如果贫穷的话，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药物治疗。

所以，追赶发达国家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是说要解决社会的很多病痛。医疗设备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社会保险，只有富裕了，才能建立起更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让最低收入者可以有机会进步。所以我反复强调，追赶不是为了吃更多，或者像美国人那样吃，而是说，我们通过追赶可以获得与他们基本同样的福利。快乐和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吃更多，或者住更大的房子，而是说，一旦自己的父母生病，你可以有更好的药物来为他们提供治疗；一旦你的孩子生病，你可以有最先进的手术来解决问题，你难道不会因此而更快乐吗？富裕了，可以拯救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比如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等，似乎也同样发生在发达国家。如果说这些问题会持续存在，那么增长还那么有意义吗？

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等问题，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就是看这些问题的程度。我们可不可以说

美国贪污腐败的程度比非洲更严重呢？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些问题都不发生，都是0，但是从0到100还有很多不同的程度。所以，这些问题基本上会持续存在，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就可以限制这些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技术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类似中东石油出口国家，其人均GDP都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我们能否认为它们就是发达国家了呢？

这要从两个问题来看，除了人均GDP的绝对值，还要看它的发展方向，要是它的发展趋向是从10 000到8 000，那么它基本上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其实是一个矛盾，因为“陷阱”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摆脱那个状态。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都很慢，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增长是通过技术上的突破来实现的，能够作为它们经济发展动力的都是技术创新，它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非常慢的，因为技术突破以后固然会带来高速增长，但是此后呢，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技术突破了。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靠的是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搬过来，以此作为增长动力，技术转移越快，就越能够快速地上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大致有三种方法：我派人到你那里上学，学会你那一套，再搬到我这里来，这是一种比较慢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我让你到我这里投资，同时把你的技术带过来，这叫做“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

投资)；第三种方法，就是我让你搬到我这里常住，你就成为我这里的人了。后两种方法，技术转移都很快。但是多半情况下，要让发达国家的人才到中等收入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来居住是很难的，更可行的办法就是FDI。中国为什么追赶得那么快呢？就是因为很多技术随着FDI一起转移到中国来了，而不是因为美国最先进的工程师搬到中国来住了。

如果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两次技术突破之间，会不会对发达国家自身，以及那些等待技术转移的后发国家都产生巨大影响呢？

我们不知道发达国家是否会长期处于眼前的低增长之中，或者长期处于两次技术突破之间。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最好的追赶，就是当发达国家的技术突破带来高速增长时，你也跟着高速增长。目前来看，追赶国家中只有日本做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和发达国家不断趋同。中国要做的，就是学习其他国家是如何学习的。经济增长到最后，技术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我这里说的技术，还包括硬件和市场环境，如果还是计划经济，即使有技术也不会带来财富。

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创新，真的那么困难吗？

很多时候，创新是如何出现的呢？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有比较多的创新出现。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同北美相比还是比较低，这是中国还不能实现创新的主要原因。所以现阶段，需要让更多的人进入高校接受教育，政府应当对此加大投资，以期实现包容性增长，不仅要投资于大学，也要投资小学，改善中学教育。如果我们相信智力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爱因斯坦或者比尔·盖茨出生在类似中国农村的环境中，并且没

有获得好的初等教育，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成为爱因斯坦或比尔·盖茨。一个比尔·盖茨会创造出一百万个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在智力随机分布的情况下，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爱因斯坦或者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哪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身于农民家庭，所以你不相信智力随机分布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在分析拉丁美洲的案例时，往往把它们那里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归因于过度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贫民窟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出现贫民窟是因为政府没有做好城市化工作，政府没有好的政策来规范城市化，而不是因为城市化本身太快或过度化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太慢。中国最好的农村小学，都难以同很多最差的城市小学相比。中国目前有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但他们是农民工，为什么不能成为城市公民呢？这不正常，根本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怎么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呢？它们都是先住后买。当然中国大陆人口多，那就推行大规模的先住后买。土地是政府所有，成本就在建筑上。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进城买房，就有人借钱给他们，等他们找到工作再还钱。但中国农民因为没有抵押，很难借到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建设低成本住房，让他们先住后买。

也就是说，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医疗、教育，政府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政府应该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让它们能够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要做很多事情

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分工中，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往往受益更多，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相对较少。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高收入国家一旦有了新的技术发明，旧有的技术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这种转移不仅仅是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很多情况下是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将生产外包给低收入国家。技术上除了最先进的部分，也有中等技术和低等技术。中国大陆的鞋子加工工厂大多是台湾地区的人和韩国人开的，而不是美国人开的。这就是技术不同分布的写照。

从历史上看，只有三个国家和地区避免了这种“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它们分别是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而多半的拉丁美洲国家都经历了经济放缓的进程。所以我说统计方面的定义是不对的，在动态的定义下谈论所谓的“陷阱”才有意义。一般的情况就是：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一开始发展迅速，后来则逐步放缓，还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则是一直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它们都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

您曾特别注意到了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目前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是“未富先老”。这样的问题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巨大制约吗？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老龄化？其实都是一些可以改变的因素。30年前50岁的人的身体状况肯定要比现在50

岁的人差很多,现在人们身体更好了,工作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大幅下降,就此而言,应该提高退休年龄。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很多问题就会改变,也就没有那么多老龄化人口了。

中国眼前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持续,比如投资的效率低,重复建设、产量过剩问题严重等。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如果有了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所谓重复建设和过剩的产能就会自动流转内地去,目前它们还没有完全流转内地去,是因为那里的人力资本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怎样才能达到更高的生产力?一是要有新的机器,二是要有更多的培训。所以,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能只是说要转移产业和过剩的产能,还要看当地有没有条件能够转入这些产业和过剩的产能,关键还是要看当地有没有高科技的人才。

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路径,和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到高收入国家的路径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的确,两者是不一样的路径,因为它们各自的动力不一样,就像开一部拖拉机和开一架飞机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到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仍旧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还是一个可以有后发优势、能够学习他国经验的过程呢?

看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什么日本可以追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关键是日本能够看到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最好,哪一个国家的军事最

好,就去主动学习。所谓制度创新,是要你在经济追赶上最发达国家之后才可以去做的事情。你如果贫穷的话,又谈何创新呢?

最后,我们想问的是:您怎么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乐观的人说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就能超过美国,而悲观的人则说中国可能会“硬着陆”。

我当然希望中国能够一直高速增长下去。如果能够很成功地解决硬件、软件以及能源供应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就能够持续实现这样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希望能够解决。但希望和事实是两码事。毕竟,我们看到南美一些国家就永远也解决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要想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张 军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动车组”时代

采访 | 杨逸洪



张 军

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也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演讲嘉宾，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参与过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欧盟等机构的研究与咨询项目。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体制其实是有机体的，如果让坏机制不断膨胀的话，它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侵蚀正常机体的发展。这提醒一国政府，要使经济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不断地去清扫体内的“垃圾”。如果不能不断地去改革体制、革除利益集团的存在，经济的后续发展就非常困难。

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同样也拓展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张军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关心的是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今天，大家更关心怎么更好地维持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中基础性的制度要素，如知识产权保护。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类似“动车组”的变化，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一样将成为经济增长引擎，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或增长极会变成“多点给力”、

“多极支撑”的局面。他相信，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而城镇化也将解决中国经济失公的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多点给力”、“多极支撑”

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经济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有的强调基建投资，有的强调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有的看好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您的观点如何？

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关注的是产业，探讨什么产业会成为下一轮经济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思路。我们暂且把产业放一边，先看地区。中国92%—93%的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85%的外资落户在沿海地区，所以说，过去20年，沿海地区已经变成整个中国经济列车的“火车头”。但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总体上单一增长、靠沿海地区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出口导向支撑经济超常增长的格局发生了阶段性转化。换句话说，沿海经过了20多年的超常发展之后，今天进入到产业升级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幅员广大，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就可以发现：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或增长极会变成“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局面。这有点像“动车组”。

“动车组”这个比喻很新鲜，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

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然而，与只靠一个车头

拉动所有车厢的传统火车不同，“动车组”的动力是分散化的，动力系统不仅仅是在车头上，中部、尾部都有动力系统。火车运行时，所有车厢都给力。这种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的动力结构，使动车跑得又快又稳。我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到今天，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但没有衰减，而且它的动力结构已经并继续在发生类似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进入“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动车组时代”。

英国《经济学人》曾把中国地方GDP与世界国家作对比。比如，上海的GDP和芬兰差不多，而宁夏的GDP则相当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对比为中国各地在评估自身经济水平和制定发展目标时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参考标准。您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

我一直讲，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一列火车的话，过去20多年沿海地区作为“火车头”，拉起了整列火车。现在看起来，增长的动力已经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不可能继续领跑，客观上要求产业资本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10年，我国中西部大幅度的、跨越式的增长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格局里面，我们再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很明显，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是一个“雁阵式”的梯度结构。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基本上就是20年。沿海地区不可能再去做中低端的制造业，所以大量的加工出口产业要么到境外去，要么往中西部地区走。在过去5年里，大量的产业开始往中西部转移。我想，随着进一步开放，沿海地区会有更多高端的产业资本落户，会有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崛起。中西部地区将以发展中低端的制造业带动当地经济。为了

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这篇大文章，中西部地区要把基础设施准备好，同时要提高政府效率。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多年后，会面临如何向低速增长模式平稳过渡的问题。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没有应对好，出现了增速“跳水”。日本在1972、1973年经济增速陡然从9.6%下降至4%，从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平稳转型？

中国跟“东亚四小龙”不一样，跟日本不一样。中国市场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是邓小平在1985年反复强调的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逐步带动中部、西部发展，当时经济学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梯度发展战略”。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寻找“多点支撑”的发展动力。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一位数，但是中西部地区还是两位数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8%的增长，其他国家都跌到5%以下。中国经济遭受的打击之所以这么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不怎么受外部震荡的影响，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

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16 年赶上美国

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甚至美国的学者或研究机构，都开始谈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的话题。根据您的研究，哪种预测方法比较科学？哪个研究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如果我们要做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的话，我

认为,在所有的办法中,用“购买力平价法”是最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使大家都用购买力平价法来研究,并不等于说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价格水平的估计不同。使用“购买力平价法”都要用到一个价格指数。就是说,必须对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信息采集。这是比较困难的事。

现在大家用的是美国宾州大学一个叫“世界表格”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通过对中国十几个城市的物价信息抽样调查,估算出中国的物价水平。有的研究者会认为,它只调查了大城市及其郊区,没有调查偏远的农村。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实际物价水平没有它估计的那么高。如果把价格水平调下来了,那么GDP总量就上去了。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曾发表一项研究结果,即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衡量,中国经济已于2010年超越美国。他认为宾州大学的“世界表格”的数据高估了中国的价格水平,所以,他把价格往下调了20%,于是GDP就增加了20%。而更多的机构则预测,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跟美国相当。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GDP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为什么会成为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有学者认为应当提高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您怎么看?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创造附加值,GDP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附加值。它是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发明的核算一个国家千差万别经济活动总量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GDP的核心就是去核算各种经济活动创造的附加值,跟实体经济占多大比例,或者金融贸易服务业

占多大比例没有关系。美国是一个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但是它可以用GDP的方法来核算经济总量。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占比高的国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GDP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跟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水平、识字率、期望寿命等这些人类发展指标高度正相关。这说明使用GDP基本上是寻找到了正面地度量一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正确方法。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双十一”网购等现象又显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超乎想像,同时也说明中国内需市场还有很大空间可挖。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消费需求?中国经济能否从过度投资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

我强调一下,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讲,只有投资是增长的源泉,消费不是源泉。第二,投资和消费不是对立的。我们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建高速公路、造地铁,这些是投资,同时又是消费。因为这些投资完成之后就提供了服务,全社会都在消费这个服务、购买这个服务,等于大家在消费公共产品。所以,投资跟消费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投资下去就创造就业,创造就业就创造收入,创造了收入才能有消费的增长。我觉得流行的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完全是错的,不但逻辑不通,而且它把消费跟投资对立了起来,好像要压投资,才能扩消费,这就会完全误解整个经济增长的逻辑。

“中国是消费不足的国家”的观点也不正确。什么叫“不足”?怎样才算“足”呢?评估消费跟投资,最重要的是要看:目前我们这么多投资这么多消费,经济是不是在健康地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本

身增长很好,过去20年增长10%以上,这说明消费跟投资吻合得很好,消费跟投资是相互促进的。有投资可以促进消费,有了消费、有了市场又可以促进投资,两者是孪生的。

与流行的关于中国正在尽享“改革红利”的说法不同,您指出,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的成本条件,实现新的增长?

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变化其实不是全局性的。比如沿海在2004—2005年的时候首次出现“招工难”的现象。可是中西部地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相反,沿海地区“招工难”,恰恰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始起飞了,很多劳动力不需要到沿海来了,可以就地找到就业机会。所以,成本条件的变化在各个地区之间是有落差的,而正是这种落差使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为我们寻找“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变环境。

城镇化要解决的就是经济失公的问题

您在与朱天教授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而是失公。失公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失公问题呢?

中国经济的失公不仅表现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还表现在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比如,现在城市里面差不多已经有3亿农村人(不算家属),可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享受基础教育和医保的平等权利;他们缴了很多社保的钱,但一

旦离开，却带不走；而且，农民离开农村后，他们的土地带不走，产权又不是他们的，所以，这块土地对他们就没有价值了，不能变成流动人口的财富。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公问题。

我们的改革通常叫“增量改革”。不像俄罗斯那样推倒重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原来的体制里面靠增量的方法来实现的。失公的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今天，这些问题必须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城镇化要解决的就是失公的问题。政府会制定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扭转失公的现象。扭转失公现象不仅仅是解决失公一个问题，其总体上也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说社保基金缺口大，因为用的人多，缴的人少。老龄化严重以后，用的人更多，缴的人更少。上海现在有900多万来沪常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缴纳养老基金、社保金，他们其实为上海的社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相应的待遇。解决失公问题，能让这些劳动力更好地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贡献。

大约10年前，您与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有一场关于“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的对话，其中提到了“不要使进一步的经济陷入一个腐败化的格局”的担忧。在您看来，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或者如何打破“路径依赖”，摧毁在经济领域里形成的牢固的既得利益格局？

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政治的结构

不一定跟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其中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最近几年大家普遍感到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就暴露了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放松了对制度层面的改革。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制度其实是有机的,如果让坏机制不断膨胀的话,它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侵蚀正常机体的发展。这提醒一国政府,要使经济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不断地去清扫体内的“垃圾”,不要让其沉积下来。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同时也会滋生很多寻租、设租行为,腐败就会猖獗。如果不能不断地去改革体制、革除利益集团的存在,经济的后续发展就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案例。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您觉得当前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如何才能抓住历史契机,拓展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

那时大家关心制度经济学,跟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关。由于把这样一种经济转型理解为两种制度的互动,所以,大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以及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而今天,计划体制的残余已经很少,尽管还存在;市场体制的架构已经形成,尽管还不完善。因此,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市场经济体制更完善,怎么更好地维持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中基础性的制度要素。

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市场经济架构,但是架构里面有很多缺损的地方。比如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比如败德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正是今天制度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面临经

济结构转型,沿海地区必须转化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人力资本及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这就需要有很好的制度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造就会很少,大家就不愿意把精力放到创新方面。所以,我觉得从制度经济学含义上讲,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力资本的保护,对企业家的创业行为的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

蔡 昉

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采访 | 任思蕴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和1989年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经济学会博尔德经济学院、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地做访问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控制人口总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有效降低了本国人口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相伴而生，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人口经济学家，蔡昉十分看重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得早，“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短缺时点早在2004年前后就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得既早且快，中国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他由此警示，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

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年龄制度

当下对中国经济前景有各种预测，但很多预测基本没有考虑到人口因素，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知名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的《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之下》一书，在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乐观预测时，就基本没有考虑人口因素。我们知道，您多年来一直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警示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说一下您所说的“未富先老”？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中国却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比重平均5.3%。而中国高达8.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老得多。因此，未富先老就是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得比较早，人口红利消失得既早且快。在过去30余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很快将上升，人口红利这一增长源泉就要耗尽。很显然，如果不能找到替代性的增长源泉，其可持续性就受到抑制。早一点认识到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有利于我们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挖掘新的增长源泉。

人口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很大程度上同比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有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了？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生育率下降的结果。因此,认识目前的实际生育水平,是判断人口变化趋势乃至经济发展阶段的必要前提。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年的人口红利期。中央在2000年已经确认,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许多学者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已经多年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这个生育率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1.6的平均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处于稳态的替代水平,我国则把均衡型人口所要求的生育率定在1.8水平上,即便如此,我们也处在相当低的生育水平上了。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撰文指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两个最大隐忧,将来不得不依靠移民来补足人口数量,否则新加坡就会面临劳动人口数量萎缩、经济停滞的局面。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严峻挑战。李光耀提出了包括补贴生育者在内的多项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措施。面对相似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做?

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高达9.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大,远未达到新加坡那样的劳动力数量制约阶段。此外,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创造将来延缓

退休的条件,都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虽然将来会表现出来,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例如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包括通过户籍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我们还可以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然,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调整的。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终究是不能逆转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能够靠鼓励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解决“未富”的问题,以应对“先老”的问题。

那么,延迟退休年龄,是延缓老龄化进程、推迟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的有效措施吗? *

长期来看,延缓退休确是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途径,也有利于缓解养老金不足问题。发达国家大都是这样做的。例如,有大约半数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已经或计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2010年OECD国家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2.9岁,女性为61.8岁。然而,我国国情有所不同。

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3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到60岁

* 延迟退休年龄,在2012年末被热议。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只有6.1年。临近退休年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如果这时不能退休,就意味着面临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可见,至少就我国目前而言,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有效办法。应该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发展教育和培训,建设劳动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推进。

解决未来储蓄率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可以保持8%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您怎么看这样的预测?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既非不可能,也不是不讲条件即可达到。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生产要素供给充分满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微观激励机制改善带来技术效率提高;通过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进步。因此,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享受了极高的潜在增长率,并实现了大体相同的实际增长率。

随着二元经济特征逐渐减少,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新古典增长条件的约束,即出现劳动力短缺及其导致的资本报酬递减,资源重新配置窗口缩小,未来增长既受到投入要素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潜力也会减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在此条件下,政策面临诸多选择。追求一种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必然要采取扭曲性政策手段,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加剧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然而,潜在增长率并非不可以改变。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可以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等方面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更高的实际增长率。

您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短缺的时点，在2004年前后就在中国出现了。这一拐点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重新配置城乡劳动力的进程随之结束了？

“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不过，急风暴雨式的重新配置过程的确即将结束。提高生产率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以及优胜劣汰的方式，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进行。这就是常规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一个超越了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要学会认识和挖掘新的生产率源泉。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在2013年结束，即2013年就会出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国际比较看，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八九年之后就迎来了人口红利转折点，是不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从“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日本经历1960年到1990年30年的时间，韩国经历1972年到2013年40余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9年。这给我们的调整时间非常短促，的确带来更大的挑战，急迫地要求我们认识到发生的变化，形成共识，而不要再停留在名词之争上面。就是要研究如何消除那些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障碍。具体包括诸如怎样才能通过推进改革，真正启动消费需求、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实现优胜劣汰。

除了“支撑比”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未来其实还潜藏着“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则推动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老年人为应对老龄化的风险而加快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真的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么？

我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则是无限的。

从研究的角度看，“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如人力资本等因素的作用，是被经济史所检验过的，而促使财产积累实现储蓄率的提高，作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部分，还只是有待检验的理论。解决未来储蓄率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从理论上说，某些体制必然比另一些体制更有利于提高储蓄率，比如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相比就是如此。因此，在选择模式、权衡优劣利弊时，把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因素考虑进去终究是有益的。

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以提高人力资本

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定论：世界上未富先老的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在讨论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问您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您看来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虚假命题？

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进行研究和提供更多正反两面证据，才可能判别是否虚假命题。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过早作出伪命题的判断，不利于健康的讨论。

当我说还没有未富先老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先例时，其实我强调的是迄今尚未见过中国这么突出的未富先老现象，所以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是否一定要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语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避免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停滞。把这个意图放在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中，来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力，不是很有意义吗？

如果说人口红利消失了，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市场经济未来要创造怎样的制度红利来保持发展可持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创造人才红利，是切实可行的一条途径么？

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及其生产率，所以潜在增长率会下降。然而，通过改革可以挖掘各种生产要素供给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从而改变潜在增长率。改善人力资本既增加要素供给，也是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条件，因此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是增加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目前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很高，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需要把教育普及向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延伸。

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产生了教育激励不足的问题。目前,在学前教育 and 高中阶段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两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矫正市场失灵。因此,我主张把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关键是政府埋单。

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来看,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乃至低人口抚养比等因素的贡献率都在降低,因此,您在多个场合特别提到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这个“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率的配置和技术进步,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过去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半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在挖掘这种效率的同时,更多的效率需要从产业内和行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技术进步来获得。这迫切要求通过改革消除应用技术的制度障碍,并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使高效率企业在经济中占更大的比重。

政府有必要熟悉“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以及学习如何才能促进其不断改善。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场论战,促使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了这个指标对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设立下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对于其成功的经济发展不无裨益。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M4ODAxOD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880184.zip",
  "filesize": 47557681,
  "md5": "ebedb04763d903b5740ddc4e48928196",
  "header_md5": "71af55c653180ea157a766e8d98dc919",
  "sha1": "215989ca4e4fc0390dc54b14578313cd3179cc47",
  "sha256": "5b65dcf39689f570078ffdc61f2e44504b5a1901f9dfb45273cbfda6f48d21ac",
  "crc32": 407090294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8672871,
  "pdg_dir_name": "13880184_335",
  "pdg_main_pages_found": 335,
  "pdg_main_pages_max": 335,
  "total_pages": 342,
  "total_pixels": 114463192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